

台灣新社會智庫 2013.10.01 出版

新社會政策香港專刊

New Society

For Taiwan

專題叢刊II

新社會

ISSN 20754582



9 772075 458000

特價100元

覺醒—台灣、香港的公民力量



新社會

CONTENT

序言

覺醒—台灣、香港的公民力量	5
黃怡安	6

導言

張鐵志 台港連結的新起點	7
--------------	---

拆遷

黃怡安 反迫遷運動：發展的另種想像—家屋、情感與生活方式	10
陳誠彥 空白的社區，空白的歷史	12

勞工

黃佳玉 青年參與台灣勞工運動圖像	14
陳璟茵 碼頭罷工—全港工人對不公義的醒悟	21

洗腦

黃守達 反媒體壟斷運動	25
張秀賢 國民教育與共民教育	32
黃在琳 我在香港 我反對國民教育	34

陸客

譚樂基 陸客湧港顯矛盾 族群矛盾漸激化 階級矛盾是根源	40
施彥廷 量變到質變 中國觀光客的雙面刃	44

選舉

陳柏亨 香港人看普選	47
顏蔚慈 以商圍政繼續進行，上次九二共識，下次呢？	50

捐款

周雪凝 香港對中國的不樂之捐	55
黃守達 捐款是同理心還是民族情感呢？	57

統戰

施彥廷 兩岸青年交流 踏入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境	60
胖胖 更加「瞭解」祖國的學生參訪團	64

房價

Sean Huang 貨幣寬鬆—投資客與高房價	69
唐耀強 地產霸權的誘惑和解惑	72

教育

顏子傑 港大罷免赤化會長，臺灣學生自治何須畏懼「陸生來臺」？	75
尤思聰 內地生在香港：文化融合	78
梁麗幗 內地生在香港校園	81

戀殖

吳靄人 台灣的日本情節	83
羅永生 香港主權移交後的「戀殖」現象	87

本土

白蓮達 從「夾縫」看本土意識	93
陳中學 本土意識、政治轉型與菁英鬥爭	99

總結

成名 從「反國教運動」看香港的危與機	105
周威佑 雙城記—台灣與香港共同的困境與希望	109

發行人 ■ 鄭文傑

社務顧問 ■ 林濁水

編輯顧問 ■ 田秋堇 洪奇昌
邱太三 陳文政
賴清德 利錦祥
段宜康 張立明

總編輯 ■ 鄭文傑

專題總召集人、編輯 ■ 黃怡安

香港召集人 ■ 蕭超杰

校稿 ■ 郭俊廷

封面設計 ■ 彩影廣告

發行所 ■ 台灣新社會智庫

網址 ■ www.taiwansig.tw

電話 ■ (02)23564008

傳真 ■ (02)23564018

社址 ■ 北市濟南路一段7巷1號3F

作者簡介

黃怡安

1988年生，台北人。台大生傳系畢業，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研究興趣為性別社會學、社會運動、政治社會學等。

張鐵志

台灣人，現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於中港台三地主要媒體撰寫專欄，關注焦點從政治經濟、社會運動到文化與搖滾，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U2的抵抗之聲》。曾於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攻讀博士，並從大學時期開始參與社會運動，近年來更關注香港與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

陳誠彥

別名肥仔，大學生，唸歷史，自小在香港新界上水區生活，亦是鄉土學社年輕實習農夫，最愛飲飲食食，難得是愈下田就愈增磅。

黃佳玉

1991年生，台北人。北大社會系畢業，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主要關心勞工與性別議題。研究興趣為女性主義、社會運動、組織研究。

陳璟茵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政治學及法學）學生，擔任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新聞編輯。中學時期參與辯論及國際關係研習，開始關心社會，燃起對政治及人文的興趣。在碼頭工潮中直接與工人階級建立友誼，學習很多，對具公平傾向的社會秩序亦帶有憧憬。

黃守達

台大法研所，基礎法學組。1988年出生，恰巧投入了台大學生自治以及異議性社團的復興，也恰巧參與了台灣農村陣線與台大工會的成立。偶爾在社會運動的議題現場跑跑龍套，興趣是儒學、地方治理、法律史。

張秀賢

香港通識教育及時事評論專欄作者，現就讀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二年級，學民思潮成員，編作有《90後，是咁的！》。

黃在琳

中學時修讀歷史及英語文學，對人民學科從此產生了濃厚興趣。在不同的歷史片段和文學作品中看見了民生永遠離不開政治，於是在關懷社會的同時又騰出力一份心力留意政府、留意香港時事和政治。現於香港大學文學院就讀二年級，主修比較文學及社會學。曾為學民思潮義工，現為香港大學學生會2013年度幹事會外務秘書。

譚樂基

香港城市大學 公共政策學系 三年級生，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成員，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成員，生於香港，土生土長經歷殖民地的童年及被回歸中國的日子。

施彥廷

1988年生，台中人。台大社會系畢業，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研究興趣為地方政治、選舉研究、台灣民主化。

陳柏亨

2013年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院，活躍於不同基層及學生組織，曾擔任城大學生關社組核心成員和香港社會工作學生聯會副會長，組織學生參與校政議題及社會運動，現於殘疾人士自助組織任職社工，參與殘疾人士相關政策之倡議工作。

顏蔚慈

笑點極低、哭點更低的非典型魔羯座女子。依舊在探尋自我的路上掙扎，仍然在找尋正義與理念的意義。目前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贊成性工作除罪化。最愛看電影。

周雪凝

在香港修讀社會學，副業學生，正職游手好閒。一點點喜歡看書，對地球上發生的事情都感興趣。

胖胖

就讀於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因緣際會曾於左派機構打工，後來接觸左翼思潮，漸漸明瞭到政經不平等的起因，並開始介入社會，熱衷於勞工相關議題，深信經濟享有更大的平等，政治平等才能實踐，現為左翼廿一成員。

Sean Huang

1982年生，大學主修管理輔修政治，研究所投入心理，具有管理、社科與理學三個學院的知識背景。行文以理性定錨，力圖洞視世界本質。

唐耀強

居於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三年級學生，在學期間參加與勞工和房屋議題相關的社會運動，是民間團體「左翼21」及「青年拒當樓奴運動」成員。

顏子傑

目前為國會助理，澎湖人，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曾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青少年諮詢小組教育品質與校園自治議題組組長。長期關心校園自治、兩岸青年交流、政府透明化、離島永續發展等公共政策。

尤思聰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四年級生，曾任中大學生會，現職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亦是左翼21成員。認為人要參與公共生活，發現他者與自身的殊別，進而體認到殊別個體的共同命運—為了人類的解放而奮鬥。

梁麗幗

於香港大學就讀社會科學學士（政治學及法學）二年級，於校內社會科學學會擔任幹事。崇尚自由民主，希望透過各種媒介與人交流，增長見聞。

吳叡人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專長為比較政治（比較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族群政治）、政治理論（民主理論、民族主義、後殖民主義、西洋政治思想史）、亞洲民族主義研究、台灣政治史、台灣政治思想史、日本近現代政治史、日本近現代政治思想史。

許容禎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士，國立台灣大學哲學學士。

羅永生

現任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文化及政治評論人。研究專長為（後）殖民主義文化政治、香港文化構成、香港電影、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著作包括《殖民無間道》、《誰的城市》、《宗教右派》等書。

白蓮達

原名關恩穎，香港詩人，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翻譯及傳譯系及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科。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小說獎，後多創作新詩，近年嘗試寫驚悚時事文章。作品散見於《香港文學》、《秋螢詩刊》（復活號）、《詩++》及《聲韻詩刊》等。時事文章則見於香港《蘋果日報》及台灣《自由時報》。獲《香港新詩資料彙編（2000-2009）》（關夢南編）選為二千年代詩人。2012年4月出版詩集《中女情懷總是詩》。

陳中寧

作者目前就讀於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主要研究領域為國會與人權。常關注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以及中國、香港的政治、社會情勢。

成名

研究興趣包括 政治文化，民間社會，比較民主發展，及香港政治。他從牛津大學社會學系獲取哲學博士學位，已出版四本書和超過30篇文章。他的學術著作，包括 *Journal of Politics*, *Journal of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 和 *Government & Opposition*. 他一直積極對香港政治發表評論，曾接受 BBC, CNN, 彭博社, “金融時報”, “紐約時報”, 和 “華爾街日報” 訪問。他曾被授予富布賴特獎學金 (Fulbright Scholarship), 在2007年前往加州大學聖地亞哥 作訪問學者。

周威佑

現為台北市議員，台大法律系法學組畢業，曾任台大李文忠事件學生抗爭六人小組、台灣農權總會執行幹事、台灣勞工陣線法律事務部主任、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執委、新國會聯合研究室副主任、第三屆國大代表、凍省廢國大修憲民進黨談判代表、段宜康競選總幹事、黃昭輝競選台東縣長執行總幹事、彭紹瑾競選桃園縣長副總幹事、新潮流副總幹事、第九、十屆中正萬華區台北市議員。

序言

覺醒—台灣、香港的公民力量

前言

2012年台灣新社會智庫彙整多年與香港學者、政治人物評論香港發展的稿件，加上新邀約的學者，針對中國統治香港手法，從移交前的中英談判，到移交後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媒體等各方面，完成台灣香港化專題，並舉辦新書發表會，獲得廣泛關注，也是國內首見對於香港問題的有系統分析。

今年我們再度規劃一系列台灣議題，與上次不同的是，台灣香港化，主要是香港方面的專家學者剖析中國治理香港的手段，但這次我們嘗試規劃幾個主題，讓台港兩地年輕世代針對相同主題，進行對話，分享談論各自的運動經驗；再者，我們並不只邀請兩地學者作為撰稿，而是設定由兩地的年輕學子擔綱起作為主要撰稿人的角色。

之所以會讓學生擔任此專題主角，也是近年兩地的社會運動有了新的活力。在台灣，學生參與社會議題雖然已經有很長的傳統，但曾消沈過一段時間，這幾年則又開始重現蓬勃發展，在各類社會議題上，都可以看到學生基進參與的身影；同樣的香港的學生在參與社會

與政治議題上，這幾年的活躍更令人印象深刻。因此讓學生分享他們對於當前自己土地的關懷與不同的參與經驗，也是增加雙方的跨界交流契機。

雖然台港兩地各自面臨不同的發展問題，但是如果把這些問題放在更大的脈絡之下，其實台港都面臨兩個重大因素的影響甚至支配：一個是全球化所產生的財富分配惡化與階級對立；另一個就是中國崛起。在這兩個因素影響下，兩地面臨的挑戰，有著許多的相同點，台灣的年輕人又是如何評價自己的政府應對這些問題？他們又有什麼樣的主張？透過這一系列的紙上對談，增加兩地青年對於彼此的瞭解。■

序言

黃怡安

《2013台灣、香港、中國化》專刊總召集人

本刊作者們多出生於台灣解嚴（一九八七年）前後的台灣和香港，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中成長。台灣作為一個新興的民主國家，面對的挑戰並不少，但大抵來說，民主、自由對台灣人來說，已是習以為常的社會共識，在二十餘年的民主化過程當中，公民意識以及台灣認同，也逐漸成長。在年輕的民主制度中，台灣人慢慢學著如何成為一個「公民」，一個「台灣的公民」。

然而，民主畢竟並非一蹴可幾，僅是政治制度改革尚不能穩固民主社會的基石，在許多類型的社會及政治改革聲浪、抗爭事件當中，可以窺見這脆弱的民主，仍待不同位置上的「公民」共同捍衛，才能持續保有民主的動能。在這些社會運動、抗爭事件，甚至是選舉中，也隱約看見中國的影響，如帶有政治意圖的「以商逼政」或者透過收購媒體，進行政治宣傳和洗腦；與此同時，台港與中國的交往，亦在社會各種層面展開，如大量的中國觀光團來台、頻繁的兩岸交流學生團等等。凡此種種，讓台灣與香港在許多歧異的政治社會條件之中，因為中國的影響而成為可資比較的兩個社會。

本刊的篇章是關於台港年輕世代在中國影響下，如何看待、想像自己所身處的社會，透過台港兩個社會的觀察、社會運動的參與和記敘，從自身所處的位置反思並探問台灣／香港公民社會的可能。

本刊的完成，特別感謝來自台港的同學們協力撰寫對於社會運動以及各種（中國影響下）社會現象的評述，也感謝所有篇章中的受訪者、運動參與者們，讓我們在置身田野、進行訪談的過程當中，悉心聆聽不被聽見的聲音，感受不同身分、位置的生命經驗，或者察覺隱藏在美好的世界背後，不被看見的權力運作。也藉這些珍貴的分享，想像社會議題與自身位置的關聯，甚至重新思考實踐的方向。■

台灣和香港兩個島嶼之間的命運越來越彼此相聯繫。

1945年，台灣從日本被交還給「祖國」，但在這主權轉換的過程中，人們沒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只是顆被強權拋在手中的球。這個不滿與矛盾首先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爆發，而後人民仆仆後繼追求發出做為一個完整的、可以自我決定命運的政治共同體的聲音，卻始終被威權體制無情鎮壓。直到七零年代，民眾力量日益增強，到九零年代中期，逐漸完成形式民主和政治主體性的建構。

在香港，1997年同樣是被一個殖民母國交回到祖國。過去的香港，在長期殖民體制下未能發展出一個自主於殖民體制的公民社會，一個能體現政治主體性的本土運動。雖然在八零年代，香港就出現民主運動，但欠缺深刻的群眾基礎，人民也沒有機會被召喚成為「公民」。89年聲援六四固然是一次集體政治意志的巨大展現，但並沒有改變香港人政治主體意識的薄弱。97年回歸，則如學者羅永生說，只是所謂的「被動回歸」，人民沒有機會表達他們的聲音與政治欲望。

直到2003年，五十萬港人上街要求撤回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成為香港回歸後，第一次人民意志與北京意志的直接碰撞。結果，港人第一次發現/展現「人民的力量」，並自此逐漸浮現出上述所說欠缺的公民社會和政治主體。

此刻，台灣與香港都處於一個新的歷史時刻。

經過二十多年的民主化，台灣赫然發現掌握這個國家的政治權力依然傲慢，資本權力越來越龐大，發展主義的意識型態也依然肆虐著這塊土地。而台灣和中國的關係進入一個全新階段：既必須和中國的政府與人民建立更合理的對話和互動關係，也必須阻止北京透過台灣資本家和政治人物（及兩者的結盟）對台灣自主性和民主的不當影響。

在香港，過去十年的新民主運動以及新建立的政治主體性，不只是政治層次上的，而是根植於草根的與社區的。從次年保衛灣仔利東街來抵抗政府重建計畫起，到06、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09年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香港出現一波波的新的社會運動，涉及文化保育、公共空間、集體記憶、都

市規劃等行動，因為他們所要爭取的是讓人民的聲音、民間的參與，來書寫城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而不是政府和財團的霸權力量。另一方面，他們也反思過去主導香港的發展主義或者「中環價值」，重新面對人和土地的關係，並開展後物質主義的價值。這些行動緊緊聯繫著一個新概念：「本土」—從那時至今「本土」又產生多重歧義。

對政治普選的呼聲也不斷增強，尤其在反高鐵一役中，高鐵撥款獲得大量「功能組別」議員的支持，讓反對者清楚認識，爭取普選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實涉及具體經濟與社會資源的分配，而不只是抽象的民主政治。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更成為今年關鍵的政治詞彙。

但是另一方面，回歸後的新矛盾以及殖民時期累積下來的舊矛盾，從政治到經濟到社會文化，都一一爆發。中港矛盾在近幾年如幽靈般糾纏著香港每個細胞：北京對香港政治、經濟、媒體、教育等各領域的控制與滲透日益增強，陸客自由行、雙非孕婦到搶購奶粉對港人生活造成的種種衝擊，都讓許多香港人擔心香港正在死亡—不論是他們熟悉而珍惜的生活方式，或是他們信仰的核心價值如自由、法治。

在台港兩地當前的公民運動中，從八十後到九十後青年特別展

現出新的能量和想像力：不論是台灣的環境、土地、反都更議題到反媒體壟斷，香港的反高鐵、追求土地正義、今年的聲援碼頭工人罷工，乃至新一波普選運動，都看到青年人作為變革的先鋒。同時，主流政黨也都在新的社會力量崛起過程中被邊緣化，被年輕人所不信任。

因此，台港兩地有太多值得彼此學習：同樣面臨新自由主義下的資本霸權，同樣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和青年貧窮化，同樣面對北京霸權的威脅—台灣可以更了解北京如何從過去到現在滲透香港的政治、企業和媒體等機制在內部擴大影響力，或者認識到把陸客自由行當做經濟的萬靈丹會造成如何嚴重的負面後果。相反的，香港可以從台灣二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以及本土化運動的進步與不足之處，得到許多啟示，不論是社會運動與政黨的關係，或者如何建立一個開放而能維持多元的本土認同。而在社會運動的創意、組織和動員能力上，部分台灣人和香港朋友都以為台灣社運比香港強；但這是一個迷思：關鍵不是比較強弱，而是兩邊都有許多可以讓彼此參考、學習。

最後，這本由台港兩地年輕人共同撰寫的書十分難得，既可以看到新世代如何理解各自社會當下所面臨的矛盾與出路，也可以透過彼此對照，找到連結與合作的契機。

畢竟，面對強大的敵人，我們
只能團結！■

拆遷

反迫遷運動： 發展的另種想像—— 家屋、情感與生活方式

黃怡安
台灣大學社會所

當住屋被視作商品而存在時，少數不受監督的人容易掌有權力決定誰可以使用／居住在特定的空間，透過控制市場以及「公共利益」的論述，坐收最後的利益。

近年來，台灣的土地開發引發了不少社會運動與抗爭，包括農地土地徵收、新市鎮開發、市地重劃、國土活化計畫、都市更新等土地發展相關的爭議與社會運動引發了遍地烽火，如2010年及2013年的苗栗大埔徵地事件、2012年3月28日士林王家兩戶強拆案、2013年的華光社區抗爭等等。¹偌大的公權力「依法行政」強制拆除建物或農地，拆遷現場屢屢上演警察驅離靜坐群眾而引發的肢體衝突；推土機前，居民與運動群眾的肉身擋拆，聲援者（其中許多是學生）甚至將自己用鐵鍊與房屋綁在一起。新聞畫面盡是學生受警察扯拉的傷口、居民的眼淚，以及最後的斷垣殘壁。

在這座擁擠的小島上，政府和建商訴諸城鄉發展及建設的願景，但是，美觀、增值或許不是所有人民對土地規劃與利用的渴求。這些

反迫遷運動中的「釘子戶」們堅持不懈的抗爭，便是共同陳述著另一套對於土地以及發展的想像：家是供予人們安穩的居住生活，以及提供社區網絡中支持與情感的來源，而不單是追逐利益最大化、用以謀利的貨品。簡單地來說，房子和土地，對這些人來說是「家屋」、「住屋」是不願放棄的生活方式。

運動組織者在運動過程中和居民、在地社區組織工作的長久相處之下，也反思了不同層次的「居住」意義。如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台大天文所高若有所說：「當『擁有自己的空間』的權利被當成可對價交換的資本時，這種金融化將人的基本生存條件被操弄、販賣，使人不知何處可去，失去自我的認同、童年的記憶。」在參與反迫遷運動的抗爭過程中，使人不斷地思考人和都市的關係、和家屋的關係。當住屋被視作商品而存

1. 更多開發案、土地徵收案，未升高衝突程度或者離台北距離較遠，以致於缺乏主流媒體大篇幅的報導，如捷運林口A7站土地徵收、桃園東門市場拆遷，卡地布部落遷葬、新店十四張、三鶯部落拆遷；淡海新市鎮、彰化二林相思寮的土地徵收等等。必須說明的是，這些以「反迫遷」總括的社會運動或抗爭事件，內部歧異性相當大，有些是土地農地徵收，有些是都市改造及不當開發造成人民流離失所，另一部分是原住民部落遷葬爭議（如卡地布部落），更涉及漢人對原住民傳統文化的長期忽視。

在時，少數不受監督的人容易掌有權力決定誰可以使用／居住在特定的空間，透過控制市場以及「公共利益」的論述，坐收最後的利益。但如果我們將房屋、祖厝、土地視為自身認同、情感以及記憶的重要部分時，土地發展的方向與決策便會因此不同。如參與大埔、樂生療養院抗爭的台大哲學系洪崇晏所說的「社區共同生活的情感及記憶，彼此互通有無、守望相助的關係網絡，是無法輕易以金錢取代的。」有些同意徵收的小地主，仍然常常回到原地走動，看看以前家附近的田，也看看鄰居，這些看似多餘的舉動，也許正是因為，房屋不只是「人住在那裡」，隨之而生的，是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空間、與土地的獨特歸屬。

然而，因為家的意義及人與土地的情感等抽象的價值觀難以與主流的「發展」論述對抗，不易被大眾接受，反迫遷運動常遭受「不過是吵著要糖（錢）」的批評，使得居住權作為基本人權²的討論招致阻礙。對此，參與華光社區案的台大政治所傅鈺如認為，運動不僅僅是為向政府爭取提供安置計畫或社

會福利體系的介入而已，「運動的推進核心應該是制度改革，如都市更新條例、土地徵收條例中居住權相關條文的修法工作」，以華光一案為例，某些論述聚焦於居民的得利，但這就會相對地隱匿司法手段的強制性、忽視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權力不對等以及公法遁入私法的種種結構性問題，更忽視了都市更新與土地開發如何排除經濟弱勢，開發後水漲船高的房價，將付不起天價房貸的受薪階級推到城市外圍，使得初入都市工作的年輕人，面臨更大的住房壓力。

失當的土地發展引發的一連串反迫遷運動，組織者和參與者中，不乏年輕的面孔。當都市更新和開發排除了多數人的參與，也同時侵吞了青年未來的居住權益。基於素樸的正義感與同理心，這些年輕的學生在一波波抗爭、運動中協助社區組織、論述以及動員，賦予「發展」更多元的意義，共同拓寬了台灣社會對於土地的想像：城市、社區的認同與歸屬感，來自它能尊重居民歧異的生活型態與安全，讓發展與居住生活安穩地並進並行。■

2.台灣政府於2009年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已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一體適用於中央及地方的法律。根據經社文公約第十一條，保障「適足住房權」(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用以解釋該條的第四號一般性意見提及：「適足住房權」涵納對象適用於每個人，自然也包括未擁有住屋所有權者，如華光、紹興社區居民。此外，也包括免遭強迫驅逐、騷擾及其他威脅的權利。第七項也強調不應將住屋僅視為商品，而是安全、和平、尊嚴地居住特定地點的權利。住屋權涉及人身固有尊嚴，必須確保不論其收入及經濟來源都享有這樣的權利，也就是說，無論是否為經濟弱勢，皆應在受保障的範圍當中。

拆遷

空白的社區，空白的歷史

陳誠彥

鄉土學社/香港樹仁大學

在地圖上是找不到新界東北的。在GOOGLE MAP上尋找馬屎埔、打鼓嶺時，只能在地圖看到一片空白的區域。曾經有一位朋友跟我說，政府規劃時，就是在地圖上畫圈，來決定這個地方的用途。我經常在想，政府把這些地方納入規劃時，是不是因為這個地方在地圖上看是一片空白，如一張白畫紙般，可以畫他們的理想世界。

「新界東北」這四個字最近在香港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字，但對我而言是一個很陌生的字。我是在新界長大，生活的。從來，新界是「新界東」與「新界西」這兩個地域組成的，新界原本是沒有新界東北這個區的。新界東北這個名字，是香港政府把古洞北、粉嶺北和坪輦／打鼓嶺的農地劃出後，將這幾個區域統稱為新界東北。因此，當我一開始看到「新界東北」這個名字時，我覺得很陌生，完全不清楚新界東北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在地圖上是找不到新界東北的。在GOOGLE MAP上尋找馬屎埔，打鼓嶺時，只能在地圖看到一片空白的區域。曾經有一位朋友跟我說，政府規劃時，就是在地圖上劃圈，來決定這個地方的用途。我經常在想，政府把這些地方納入規劃時，是不是因為這個地方在地圖上看是一片空白，如一張白畫紙般，可以畫他們的理想世界。

但是，現實是否真的這樣？馬屎埔、打鼓嶺這些地方是否真的是一片空白，沒有人居住？是否真的是以「機關槍掃，都死唔到十幾人」的一片荒蕪之地？

古洞、粉嶺北這些地方並非無人之境。這裡有著不同的村落，社區。如粉嶺北的其中一條村馬屎埔村，便是香港僅存小數仍然以農耕為生的村落。古洞更是一個很完善的社區。古洞裡有不同的建築群。有醬油廠，木廠，酒廠，豆品廠組成的工廠區、農田及住宅區，加上傳統的鄉村茶樓，鄉村學校，本來已經是一個有完整網絡的社區。這些地方是有人生活的。每一家，每一戶都有著自己的歷史。

他們很多都是1949年逃亡到香港的，向原居民租借土地，在那些地方耕種，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讀香港的歷史時，從來只知道香港從漁村走向工業化，再由工業化走向國際金融中心。歷史與我們的生

活是割裂的。我從不能從歷史中尋找到自己的根。

但是，我從馬屎埔村、古洞這些地方尋找到根的感覺，我在這些地方明白到香港的農村生活是什麼的一回事，明白到「我」是從何而來的。歷史與生活不再割裂。農村生活完全呈現了我們香港過往的面貌，填補了香港歷史的空白，讓我們知道社區的歷史。農村、社區就是活著的歷史，我們可以觸摸到，可以經驗到。相比於文字，影像更加有力。但在香港，社區已消失得七七八八。以上這些地方，是僅存的社區。調景嶺消失了，衙前圍亦消失了，菜園村也消失了。如果再消失更多的社區、農村。後世便不會再有地方尋找自己的歷史，「我」是從那裡來，尋找自己的根。

在香港，這一群生活在這裡很多年的非原居民，從來都是被壓迫的一群。他們得不到政府的保障，從來只是淪為發展的犧牲品。政府發展的時候，必先從他們下手。我老師曾說，香港的「原居民」與台灣的「原住民」，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分別卻很大。他說台灣阿美族人面對迫遷，不斷與政府周旋。即使最後不能保衛家園，但仍然迫使政府廣植他們的家族樹－麵包樹，才肯搬到政府的樓房。相反，新界原居民說出只要政府賠償足夠，更可把祠堂都售賣出去。

現在新界還有多少原居民是留在原居地？還有多少原居民視土地為母親，守護土地，而非把土地視為商品，賤賣出去？土地商品化，令我們的歷史，生活，文化從此亦變得不紮實。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或許會令我們年輕一代日後能成功置業，但肯定的是，土地被鐵絲網圍著的那一刻，我們的歷史，文化亦隨之而長埋於黃土之中。

這樣的發展，絕對不是我想要的。我不希望我將來住的地方，是拆掉了別人的家園，破壞了別人的生活而方式而成的。更不希望住的地方是沒有人情，沒有歷史的社區，只有冷冰冰的高樓大廈和沒有人情的大型商場。所以，我們都應該問問自己，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政府的政策經常偏袒財團、圖利資方，忽視勞動者辛勤付出與基本權利。現行勞動相關法令的研擬與實務運作上仍存在許多血汗勞動與壓迫，更是直接衝擊到青年就業環境，造成貧富差距日漸擴大、就業不穩定以及青年貧窮化等問題。

哪會哪會走來抗爭這條路
不是我吃飽閒閒 望你來諒解
哪會哪會走來抗爭這條路
遇到惡質頭家 款錢做他走
因為政府沒甲阮照顧
逼咱走到抗爭這一條路
不願承認打拼認真做頭路
換來悽慘身軀沒半元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這條路〉

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下，勞工相關法令的規定仍不甚完備，工會運動也因過去戒嚴時期刻意操作而弱化。然而經濟環境漸趨惡劣，台灣勞動環境每況愈下。特別是近幾年起較大的爭議，如華隆工會百日罷工、全國關廠工人臥軌抗議等，皆是由於法令不完備導致工人權益受損的重大事件。過程中，可發現青年學子積極投入，支持勞工運動。除此之外，近幾年來也開始出現關懷青年勞動現況的團體，對於青年在非典型勞動、就業環境有許多批判與抗爭。本文訪談四位積極參與

勞工運動者，並配合自身參與華隆罷工的經驗，分享並了解這些青年人參與勞工運動的原因與心得。

惡意關廠，工人抗爭

去年年初，華隆紡織由於資方惡意倒閉，將原本機具、員工轉移至新的空頭公司紡安，同時以倒閉之名，不願支付未轉移之員工資遣費與退休金。華隆工會於六月底決議推倒工廠大門，並於門外宣布無限期罷工。由六月到九月，經歷幾波抗爭，並由苗栗徒步苦行至台北總統府前陳情，引發社會關注。終於在九月份，苗栗縣政府答應代位求償，給付工人六成退休金與八成資遣費。此波百日抗爭可謂典型的工會運動，由相關勞動組織出面組織工會，提供勞動教育與抗爭策略；學生在其中為輔助角色，協助舉辦活動如：守夜排班顧工廠、罷工音樂會等。

華隆工會雖然領到資遣與退休費用，但卻也並非全額領回。

事實上這樣的案例層出不窮。這幾次起工人抗爭，多是因為資方惡意關廠，以至於工人無法取得應有的資遣與退休金。即便勞團已多次提出訴求，但攸關勞工權利、資遣費與退休金納入墊償範圍的《勞動基準法》第28條，¹至今未有具體修法進度。在十六年前與華隆同樣因為惡意關廠，在抗爭後政府肯認代位墊償的全國關廠工人，更是這條法令下的受害者。政府過去雖承諾給付的費用是代替資方償還，但十六年後的今天，卻向關廠工人連本帶利索取當年的退休金與資遣費。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最早來自於1996年全國各地爆發惡性關廠風潮，包括聯福製衣、福昌紡織電子、東菱電子、太中工業、東洋針織、路明電子等自救會，發動激烈抗爭，例如臥軌、絕食等，要求勞委會「代位求償」，先將資遣費、退休金發給工人，再由政府轉向資本家追討。勞委會於1997年7月推出「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以貸款形式發給了「代位求償」的金額。但在16年後，勞委會卻編列預算控告工人，要求工人償還「貸款」。於是各自救會重新運作，同時也加入1998年擋大專聯考考生抗議的耀元電子自救會，以及苗栗地區的興利紙業自救會，一併串連抗議勞委會的惡劣討債行動。

關廠工人抗爭的主體是一群任勞任怨的工人，他們是社會中沉默而尋常的第一代台灣勞動者，創造經濟奇蹟、卻不被記得。許多工人們沒有機會好好接受教育，為了能投入生產線學習，小學畢業便進入工廠。面對繁複的法院函件，她們並不識字，遑論在無人解釋的狀況下讀懂法規與程序。

『在桃園產業總工會擔任秘書的黃士庭表示，關廠工人近一年的抗議，最早是由於許多十六年前曾受到桃產總協理長毛振飛協助的工人，近日又收到政府文件，於是便到辦公室求助，工會才發現政府竟然編列預算，要求委任的律師團採用各種策略以要求過去接受代位求償的工人繳還費用，不惜連同家屬一併告上法院。許多工人當時已是退休年齡，經過十六年，現在早已是七、八十歲的阿公阿嬤。但在這一年的抗爭中，黃士庭發現關廠工人們仍然願意為自己的權益奮鬥，替自己的生命負責，非常令人感動。

在TIWA²兼職的張書書³同樣參與全國關廠工人抗爭。在近百場的抗議中，張書書強烈地感受到這個社會對於階級的固著性，以及對於自身的意識的無知和冷漠。工人階級在台灣受漠視，能夠與政府和

1.《勞基法》第28條為「（工資優先權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雇主因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六個月部分，有最優先受清償之權。」全國關廠工人連線2012年訴求修改「勞基法第28條」，將資遣費、退休金納入墊償範圍，而勞委會主委潘世偉在5月6日承諾3個月內提修法草案，但至今已4個月，行政部門提不出草案。

財團對抗的力量小，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之下，只能以非常草根、基層的是去組織和「教育」工人，讓他們明白自身的處境和應該爭取的權益。諷刺的是，大部份的台灣工人被規訓的太好了，極度安份守己，卻反而常常最後落得什麼都沒有。』

『黃士庭擔任桃產總秘書工作已兩年，最初在社團學長的介紹下進入工會，現在在桃產總會員工會之一的南亞電路工會擔任工會秘書。他坦言，工會並不總是在戰鬥，更多是處理好日常與行政事務的累積，才能讓工人對工會有信賴感。然而，工會存在的意義並不是替工人解決所有大小事務，而是工人們團結起來，負起責任去爭取自己權益。面臨龐雜的事務與高度壓力，薪資也不見得高於其他行業，因此願意投入勞工運動的青年少之又少。談論到對參與勞工運動的想法，黃士庭認為，投入勞工運動對自己而言不是去創造一個烏托邦，而是去挖掘更多精彩的人事物，並不斷面對與挑戰自我。』過程中，組織者最重要的任務是讓勞工產生能動性和階級意識，明白自己

的力量可以反轉現狀。由於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情形特殊，此事件橫跨的時間長達十六年，有些工人是「被組織過的」，類似工人中的頭人，他們能清楚明白組織者所做的運動決策、策略，以及政治訴求，藉由自身介於工人和組織者之間的角色，強化組織者對工人的「作用」和信賴。從這些「工人頭人」之中，張書書看見身為工人的驕傲和尊嚴，反轉過往對工人被動的印象，對於自己做為「尚未成為的組織者」，是很重要也深刻的一課。

然而，自2012年8月要求勞委會撤告並修法以來，全國關廠工人曾在勞委會前撒冥紙、丟雞蛋，甚至絕食、臥軌、苦行，皆未能得到勞委會正面回應。臥軌事件雖使社會大眾對於關廠工人的處境有所了解，但政府仍遲遲不作爲。未來，將可能採取更激烈的手段。

非典勞動，校園工會

除了上述典型的勞工運動，隨著產業的轉變與勞動環境的變化，也有一批年輕的工運組織者從事與青年勞動相關的運動，關懷台灣青年現今勞動環境。

2.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成立於1999年10月30日，是為全國第一個以外籍勞動者為服務對象的本地民間組織，關懷對象遍及外籍勞工與外籍新娘。協會組成成員來自勞工團體、組織工作者以及工會幹部，除了發展本地勞動者與外籍勞工的勞動經驗交流之外，也積極倡議外籍勞工權益，發展外籍勞工自治組織，近年來分別協助台灣印尼外勞協會（TIMWA）與菲律賓勞工協會（KASAPI）成立；同時有鑒於台灣社會充斥的種族隔閡意識形態，積極辦理文化活動，成立外勞樂團，轉化台灣社會對於外籍勞動者的認識，進而實踐尊重包容、公平的社會公義。資料來源：<http://www.tiwa.org.tw/index.php?itemid=1&catid=1>

3.由於訪談者本人要求，已經過匿名處理。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成立於 2005 年，最初取名的意義便是在於要求所有的打工環境能符合最低薪資九十五元，並致力於推展青年勞工運動，其成員包括青年社會運動者、研究生、和大學生，不僅關心非典型勞動，如校園內的派遣清潔工，也開放線上申訴系統讓青年打工族可以投訴惡質店家。在知名連鎖店 85 度 C 的案件中，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接獲許多來自 85 度 C 的打工族申訴，不僅未保勞健保，給付的薪資亦未達基本工資。於是青年勞動九五聯盟進行 85 度 C 直營店與加盟店勞動調查，錄音存證，並召開記者會，施加媒體壓力，最後順利讓直營店願意承諾遵守基本工資的規範。⁴清大社研所的張道琪曾經參與過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她認為參與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最大的收穫是能夠從主流看待青年勞動者的觀點昇華到結構性的觀察。過去將青年貧窮視為個人責任，但透過在參與的過程中發現，社會上許多不平等與社會結構息息相關，權力運作十分複雜，並不是個人能力可以簡單歸因。

張道琪在大四時也面臨升學與工作的兩難。她常自問：「勞動之於我到底是什麼？我該如何讓自己不要在未來投入職場後，脫離改革的行列？到底自己期許自己該以什麼姿態生活？」後來，張道琪選擇繼續升學，進入清大社會學研究

所，並參選清華大學研究生協會會長，期待能組織校內同學成立勞動權益促進組織。但過程遭遇許多困難，首先，校內學生工作型態異質性高，研究生協會亦有許多雜務需要處理，因此最後效果並不明顯。

張道琪分析，在校內推廣勞動權益，失敗的原因有多個層次：一、學校對於學生工作仍過度強調師生倫理問題，對勞動的想像亦很扁平，往往舉辦畢業季邀請廠商擺攤，卻未能帶領思索未來職涯發展與想像；二、研究生協會和學校擁有的資源與權力不對等，使研究生協會須和校方多次進行筆戰，搶奪對校內勞動者的論述權；三、學生為了讓研究生協會維持運作，需要舉辦大量的活動，但礙於研究生自身課務繁忙，導致後續經營相當困難。這三個實務面上的問題使得後期研究生協會在推廣勞權上力不從心。擔任會長一年來的觀察，張道琪認為，清大校內許多自然科學學生，其勞動型態與人文科學學生相當不同，不管是校內勞動狀況，或是未來職涯規劃，應有更多對話的機會，共同談論對勞動的想像，才能有效的推動組織。

關於校內學生勞動權益的推廣，在台灣還有另一條路徑。近年來由於《工會法》修法，也有諸多以大學為單位進行組織串連的企業工會。高教產業中的工會意義特殊，反映出高教產業現今問題。台

4.關於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抗爭詳細過程可見以下報導：<http://www.cooloud.org.tw/node/57865>

灣大學工會是台灣少數成立的大學企業工會之一。作為創立者同時也是台大工會現任秘書長的林凱衡表示，台大工會成立的契機在於2010年遇到教學TA、助學金降薪，理由是課程經費不足，需要砍助理學金，改以總學費的23.5%作為經費。當時林凱衡與朋友決定進行全校性的勞動調查，發現各學院的助學金普遍無法支撐生活所需，缺少獎助意義，在勞動狀況上也往往超出工時、或是進行不合理的勞動。研究生助理的勞動權益因為沒有適當的申訴管道，使得學術工作越趨廉價，缺少勞動權益意識的助學金制度反造成青年學子投入學術工作的負擔。

做為以校園為單位的企業工會，台大工會雖以助理工作為主，但也關心校內各單位的勞動權益。台灣大學有許多附屬組織，台大工會未來也將致力於關心如：台大醫院醫護人員、校內派遣清潔工等勞動權益，期待能組織校內勞動者，保障高教產業環境，不要再有血汗勞動者。

外籍勞工，溝通揣摩

現在就讀台師大社會教育系的張書書，目前在TIWA擔任實習生。張書書表示，2011年到TIWA當志工時，對於勞工的想像是單一而扁平的，只是帶著一股想要做事的熱情進去。剛開始在台北車站附近的老

舊大樓內進行印尼人的中文教學，那裡是IPIT（印尼在台勞工組織）的辦公室，約莫四、五坪，每到星期天就會聚集許多印尼人。教中文對張書書來說是一大挑戰，由於必須讓對方聽懂自己的意思，必須更為積極的表達，使原先被動的個性轉為主動。

張書書也體認到，在溝通的過程中其實有很多障礙，一方面是語言不通，另一方面是彼此所處的文化和生活環境差異很大，要理解對方的語境有一定的困難度。自己沒有深刻的勞動經驗，便很難去深切體會移工在家庭或是工廠之中的遭遇，只能透過揣摩、想像和拼湊移工們的勞動狀態。很多時候移工們會和張書書分享在台灣的工作經驗，印、中、台、英語混雜，怎麼講都不精確，但就是要打開所有的感官，嘗試去理解、進入對方的想像，透過長期互動建立起與移工的關係。張書書認為這種長期的基層工作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太多技術性或條件，但是需要大量的耐性和穩定性。

性別角色，學生身分

除了上述多元的勞工運動，在勞工運動中工運參與者面對自身的角色定位，時常感到焦慮與模糊。特別是在強調陽剛氣質與男性為主的工運場域，許多女性參與者也在訪談中論及工運中所感受到的不平

等。以筆者自身參與而言，女性經常被視為行政雜務的處理者，甚至被當作拍照的模特兒；在交際方面，強調菸酒文化的場合往往會排除掉部分女性的參與，要投入工運與勞工相處有著無形的門檻。張書書也表示，就自己目前的觀察，男性大多占據發言或權力核心，但就關廠工人案和移工運動來說，由於多為女性工人，因此女性經常扮演關鍵的角色。雖然女性並不一定會站在「領導者」的位置，但是女性經常能把最鎖碎綿密的組織工作做得徹底。當決定方向之後，所展現的行動力與在抗爭過程中的抗壓性也比多數男性更高。

除了性別，青年學子在參與工運中的角色也相當特殊。多數時候學生是輔助性的角色，很少能夠進入到核心決策之中。多數參與學生非工會專職員工，即便是未來潛在勞動者的身分，但以現實層面考量，學生無法承擔工會內部矛盾爆發，或是運動失敗後的風險以及後果，因此常膽顫心驚。然而，過去青年學子在工人運動中往往非主要角色，但2012年的秋鬥⁵加入學生相關勞工團體陣線則是一個嶄新的嘗試，期待更多青年學子開始意識到自己是未來的勞工，以及所要承擔的風險和責任。張書書表示自己以TIWA的組織者身份在參與工運

時，其實不會特別去說自己的學生身份，因為學生有太多「純潔」的包袱或可被原諒的餘地，而這有時不太實際。但在串聯其他學生、或是在某些工作時會使用學生身分，根據狀況判斷使用身份的合適性。

溝通揣摩，未來展望

本次訪談國內多位青年勞工運動者，從校園外到校園內、從本土勞工到外籍移工，青年學子如何投入勞工運動，呈現不同的層次與樣貌。訪談中，四位訪談者也分享勞工運動對自身有何影響，並對未來發展提出展望。

黃士庭擔任桃產總秘書工作已兩年，最初在社團學長的介紹下進入工會，現在在桃產總會員工會之一的南亞電路工會擔任工會秘書，協助庶務與行政事項。他坦言，工會並不總是在戰鬥，更多是處理好日常與行政事務的累積，才能讓工人對工會有信賴感。然而，工會存在的意義並不是替工人解決所有大小事務，而是去喚醒工人的勞動意識，帶動會員思考為何爭取權益。面臨龐雜的事務與高度壓力，薪資也不見得高於其他行業，因此願意投入勞工運動的青年少之又少。談論到對參與勞工運動的想法，黃士庭認為，投入勞工運動對自己而言不是去創造一個烏托邦，而是去挖

5.1988年，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為抗議勞委會提出的工會法和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及聲援苗栗客運罷工案，舉辦解嚴後的第一次工人遊行，開啟每年11月12日勞工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正視勞工處境的傳統。

掘更多精彩的人事物，並不斷面對與挑戰自我。

林凱衡表示在組織台大工會的過程中，發現青年對於勞動權益雖然關心，但不願意多付出心力來組織團結。成立台大工會的目的，一方面希望能將台大工會的組織經驗分享給其他大專院校，達到一校一工會的遠景，並串聯各校行動，促成高教產業對年輕學術工作者的保障與重視；除了保障校內勞動者的權益外，由於未來學生也會投入職場，台大工會希望能夠將自身成爲一個節點，和其他領域的工會合作，將工會組織者的經驗帶入校園，讓青年學子未來在其他領域的職場上也能具有勞動與團結的意識。

張書書認爲，作爲勞工運動組織者，如何在組織工人的同時放下身爲知識份子的「身份」是困難的，並不只是穿得像工人、吃得像工人、講話方式像工人就可以了，還必須與工人建立起集體認同。在這個「從知識份子變成工人」的過程當中，必須捨棄許多東西，需時時面對自己的缺點，自我批判。張書書也在這場勞工運動之中不時檢討，希望能夠成爲一個真正的組織者。

透過訪談四個領域的台灣勞工運動者，可發現台灣勞工運動多元繽紛的面貌。從對媒體施加壓力到親身組織勞工、建立認同，都需要

相當的心力與時間。同時不可忽略的是，政府的政策經常偏袒財團、圖利資方，忽視勞動者辛勤付出與基本權利。現行勞動相關法令的研擬與實務運作上仍存在許多血汗勞動與壓迫，更是直接衝擊到青年就業環境，造成貧富差距日漸擴大、就業不穩定以及青年貧窮化等問題。勞動意識的喚起可從校園內開始，重視勞動者的尊嚴，也期待更多青年學子願意在勞動相關議題上持續投入、耕耘，改善惡劣的勞動處境。■

勞工

碼頭罷工—全港工人 對不公義的醒悟

陳璟茵
香港大學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是香港罕見大規模工運事件，不僅學生團體投入支援，更獲得香港社會民衆的普遍支持，大量的小額捐款，提供罷工勞工暫時免於生活支出的匱乏，最後迫使資方同意加薪，參與運動的學生是如何看待這次罷工？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是香港罕見大規模工運事件，不僅學生團體投入支援，更獲得香港社會民衆的普遍支持，大量的小額捐款，提供罷工勞工暫時免於生活支出的匱乏，最後迫使資方同意加薪，參與運動的學生是如何看待這次罷工？

碼頭工人於2013年3月28日開始罷工40多天，直至爭取加薪9.8%。這場「仗」一方面是工人首先提出要發動，另一方面亦有工會以組織者方式協助，而社運組織、學生、市民亦有推動事態發展。與傳統工運不一樣，站在同一陣線的我們都是運動的參與者，我們的關注都是工人對抗資方的彈藥。罷工戰場上情況是複雜的，對內，大家要關心工人的生活壓力及團結；對外，大家亦要回應資方的抹黑及分化；又要處理一般市民、支持者對工運的期望。我作為左翼廿一的義工、香

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的新聞編輯，先以訪問者及義工的角色參與，繼而有幸加入由多個民間組織組成的各界支援碼頭罷工後援會（下稱後援會），以及《大眾碼經》¹的編輯小隊；無形間與工人建立了互信的關係，成了運動一員。

「讓工人罷工 我們已經贏了」

先介紹一下這群工人的特性。碼頭工人中包括多個工種。一半是抓結工人、²橋邊理貨員，³他們有較重的體力勞動，亦要連續工作24、48、72小時，因此會在簡陋的員工休息室地上鋪報紙小休。他們大多來自同一公司永豐，通常把罷工大小事務交由Gang頭⁴決定，著重工友的團結。另外一群人是機手，⁵來自多間不同的公司，亦有駕駛龍、

1. 大眾碼經於工潮時每天發佈罷工資訊，工潮完結後亦集結文章成書《撐到底—碼頭工潮40晝夜》。

2. 俗稱姑爺，主要是拉鐵枝穩固貨櫃到吊機儀器。

3. 俗稱樟紙，主要是檢查貨櫃安放的位置。

4. 即是工作小組中的領導者，負責管理四人小隊及與判頭聯絡。

5. 機手主要工作是駕駛不同吊起貨櫃的機械。

塔、剗⁶等機械而有所分別，因此薪金、福利都有分別。但他們同要在機器上吃飯、大小二便，亦要工作12小時多。他們亦比較獨立和有想法，會更快回應罷工狀況及社會聲音。工會朋友於是解說要令多個工種、公司、受不同待遇的工人離開工作崗位，與平常唯命是從的老闆對抗40多天亦已經很厲害，更何況是在「同一海洋上」的口號下團結起來互相照顧？跟工人親身接觸的過程亦讓我見證他們從一個被動的受害者角色，躍變成主動與社會積極連結的改變倡議者。

罷工第一天，我訪問永豐工人時，他跟我說是比較零散的工作苦況。第二天，他們留意傳媒報導，又見數十位學生到場支持，頓然感到社會支持與互動。部份工人都會說：「原來不是單純的加薪，而是可以要求老闆改善工作狀況及讓工會加入談判桌幫助我們。」⁷期後工運抗爭層面擴大至針對大財團和黃系（編註1）及李嘉誠，工人亦由完全不理解，反說「不關李嘉誠事既，只是外判商衰」，到後來我看到在長江的帳篷中工人自己閒聊時大談「外判商全都是同一班人！他們又是聽HIT⁸的話。李老闆！唉，仲有個龜縮政府！」又或「他們感

受到壓力啦，要不霍建寧⁹不會在北京鬧李卓人¹⁰啦」。工人不但更趨積極，又漸漸會扣連社會事件到整體向財團傾斜的社會制度。罷工完結後，部份工人領袖擔當工會理事，工人自己亦更會理解一些漠視勞動尊嚴、資本家剝削等社會不公，無疑裝備了部份工人成為工會的抗爭中堅份子和社運的活躍份子。

整個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亦非常有趣。工人一開始不太想接受訪問，但後來工友兄弟都會分享大家共同故事，鼓起勇氣在各大傳媒接受訪問、到大專院校論壇作分享，更會自發在罷工現場分組帶隊向學生及市民解說狀況。在長江集會時，我亦多次做司儀，起初「邀請」工友上台發言是十分困難的，幾乎是硬塞咪高峰（編註2）或是半推半鼓勵下才可以，但後來我們後援會沒空辦集會時，工人也會自發搞唱歌派對，甚或主持3000人的大集會，我只是從旁協助。工人於工潮後經常主動投入社會事件，主動幫助工人、學生，¹¹甚至組織工人參與六四、七一遊行。這群人從經驗中得到了抗爭的力量，亦從個人生活考慮昇華到對社會不公的回應，打破了對工運、社運等改革力量的污化想像與迷思。這個亦是我第一

6.龍機、塔機是按起機械的高度而劃分。

7.這亦是罷工的三大訴求：1.加薪、2.改善工作狀況及3.讓工會加入談判桌。

8.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ongkong International Terminals，簡稱HIT)。

9.長江集團的高層管理人之一。

10.職工盟秘書長。

11.有的甚至成為了處理工傷的專家、向部門投訴的工人，揭發了工潮後的秋後算帳。

次見證運動所蘊藏的力量，與工人同學市民一同學習。

對香港一般市民的啓蒙

工人運動需要社會各界關注，因此社會連結尤其重要。罷工期間我們感受到一般市民不但同情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亦是對於大商家大財團欺壓小市民懷有義憤。40多天有800多萬的罷工基金進帳、每天約兩餐共400多個飯盒、還有飲品帳篷等物資，說明的正是大眾支持工人抗無理資方。由於今次資方李嘉誠集團是地產霸權的象徵符號，一般大眾在都感受到他在超市、房地產等的壟斷，因此更同情工人，響應「我們都是工人」、「支持碼頭工人就是支持自己」的口號。我相信這是市民成功把碼頭的悲哀扣連到社會不公的問題所致，特別是受盡壓迫的基層市民感受尤深。這些抗爭經驗都有正面的成果，讓市民感受到改變的可能性。工潮期間，我們亦聽到碼頭內的貨櫃車司機、保安都加薪9.8%，而工潮剛完結後內河及高鐵路地盤亦有罷工。至於碼頭，工人得到加薪的保障之餘，員工休息室改善、有落機吃飯的時間、機手的椅子也換了。以上種種為香港的市民、工人抗爭改善生活起了示範的作用。

同時，關心工運的社運份子在工潮中亦對行動有一定的反思。工運份子沉迷癱瘓生產線的行動，

支持者間都多次討論施壓，希望工人堵路。那時我亦認為工運中段沒有升級行動，以致談判晚期工人傾向妥協。然而，我仔細了解，卻發現工人運動的暴力成份會令工人產生分歧，又要面對資方、傳媒等乘機大肆抹黑。由於涉及團體眾多，採取兼容政策亦容易令團體分裂。工人傾向溫和的方式，卻是因為擔心一旦情況失控，他們將失去社會及家人的支持。後援會的討論最終未能處理問題，但亦建議支援者向外擴展議題，增加公眾對罷工的認識。雖然面對多項限制，今次工潮讓溫和的參加者與求變的行動者對話，亦讓香港人探索多元的運動模式。大量批評工運的網友向行動者施予壓力，這一點是運動參與者及組織者要面對的危機，同時亦是促使更多年青人加入香港社運的契機。

參與學生的角色

香港自70年代起沒有大型的罷工，市民及學生對工人運動的認識可算非常少。相比傳統工運中由工人擔當主體、組織者作主導的運動，這次運動牽動全城關注，參與者都要重新思考其角色，學生所擔當的角色亦十分微妙。我們學生初期集中發放工人狀況及罷工資訊和帶物資予工人。主要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在全港多區連續多天設立街站，籌款、籌物資帶到罷工現場。

部份大專生亦製作文宣、帶學生到現場及參與遊行。例如，4月1日一千多名學生及市民便從荔景地鐵站遊行至碼頭。同時，左翼廿一成員及社運人士又會舉辦多個3000人集會、18人12小時苦行、政府官員及老闆的狙擊行動及和黃系罷買行動，當中亦不乏學生的蹤影。學生代表著社會良心關心罷工工人，指「我們將來也是工人」，以及物資上的支援，都令工人與學生連結多了一次經驗。

但在抗爭後期，工人運動漸收結，工人多擔心談判結果。我們學生的角色又有沒有轉變？我們曾經懷疑自己的定位只屬「啦啦隊」，但按以上學生與工人的接觸，我如今的判斷是我們多於支持者、接近組織者，在職場層次以外組織工人，協助他們疏理對工作及社會的判斷，以及舒緩罷工的焦慮。這一點是在罷工後期亦延續下去。工人不善於表達自己，常自卑地說自己「沒文化」。但學生作為一群關心及好奇的運動參與者，便可與工人作出互動，進而鼓勵他們成為社會積極參與的一員。我記憶很深的一幕，是我坐在工人當中，大家一問一答了解行動的各種法律責任和抗爭手法，例如靜坐、工作器材展覽、佔領行動等。據了解，工會組織者人數少，工潮要處理的問題多不勝數，無暇接觸工人；學生雖然無法提出專業意見，但我們可以親

身醞釀討論，誘發工人的創意與感受，適時鼓勵工人與領導層表達意見，與不同的參與者建立互信。

結語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與工潮，第一次認識碼頭工人這群體；但卻啟發了我對工運及公平傾向的想法；相信這也是不少工人與市民的第一次。在整個工人抗爭中，我們還需靠工會組織者及工人領袖去作深耕細作的組織工作，但罷工一旦爆發，社會便可藉此了解勞資權力關係及社會議題。我們學生亦有角色去關心和支援工運、啟發社會、揭示社會不平等、展現社會良心，繼而按組織者及工人的狀態補上組織工作，加強運動參與者互信互動。

■

編註1.和黃系即指和記黃埔有限公司集團是《財富》全球500大企業，也是香港交易所最大上市公司之一（公司於1978年1月上市）。和黃是業務遍佈全球的大型跨國企業，經營多元化業務，包括全球多個市場最大的貨櫃碼頭經營商、零售連鎖集團、地產發展與基建業務，以至電訊及電台廣播服務。現在董事局主席是李嘉誠先生，副主席李澤鉅先生，董事總經理是霍建寧先生，三人兼任公司的執行董事。（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編註2.即台灣稱的麥克風Microphone

洗腦

反媒體壟斷運動¹

黃守達
台灣大學法律所

1987年台灣結束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媒體環境擺脫國民黨黨國體制控制，卻擺脫不了政治、市場、科技三股力量的影響。為了維護媒體專業自主，獨立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2006年成立，雖然標誌著台灣的媒體環境管制進入新的階段，但面對的卻是更嚴峻之挑戰。

前言

天空忽晴忽陰，落著時大時小的雨滴，瀰漫著潮濕又悶熱的氣息。台北內湖旺中大樓前狹小的算不上廣場的廣場，滿溢著身著雨衣的年輕人。他們拿著自行製作的標語，他們滑著手機安裝的社群軟體，他們舉著相機捕捉彼此的身影，他們想著剛剛喊過的口號：

「你好大，我不怕。」大樓一樓大廳的玻璃帷幕外，圍繞著一層層的警察人牆，他們用冷漠而木然的表情，見證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的學生宣言。由於人數遠遠超出預期，音響設備難以負荷，現場不得不採取一種最原始卻也最有效的擴音器——大家稱它作人體麥克風，屬於群眾的媒體——台上的人先唸一句，台下的人跟著唸一句。

這讓人想起老舍的《駱駝祥子》——「雨下給富人，也下給窮

人；下給義人，也下給不義的人。其實，雨並不公道，因為下落在一個沒有公道的世界上。」這是2012年7月31日，台灣反媒體壟斷運動青年聯盟的第一場仗。

媒體環境

1987年，台灣結束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媒體環境擺脫了國民黨的黨國體制的操控，卻擺脫不了政治、市場、科技三股力量的影響。²1990年國民黨內鬥，《自由時報》與《聯合報》分別成為李登輝勢力與反李登輝勢力的傳聲筒，乃是媒體首度介入政治鬥爭；而2000年政黨輪替後的政黨對抗，藍媒（國民黨陣營）與綠媒（泛民進黨陣營）的壁壘分明，既是對立導致的結果，又是激化對立的原因。市場方面，2003年《蘋果日報》的崛起，其專業的腥羶色

1. 本文訪談對象包括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成員的林飛帆、吳學展，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張勝涵，以及傳播學生鬥陣成員蕭亨方，是他們的慷慨分享與寶貴經驗豐富了本文的內容。當然，本文責任一概由筆者自負。務必要強調的是，反媒體壟斷運動的面向相當廣泛，本文並不認為這幾位訪談對象足以代表整個運動，但對於把握運動的面貌，筆者相信仍有一定的幫助。

2. 顧爾德，〈當媒體走出黨國巨靈的爪掌〉；收於王金壽等著，《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左岸文化，2010年。

製造能力，獲得了消費者的熱烈回響，更招致其他媒體的模仿效法。科技方面，隨著數位匯流成為國際趨勢，為了放寬媒體事業的投資，廣電三法³禁止黨政軍投資媒體事業的「黨政軍條款」，也引起了存廢爭議。為了維護媒體專業自主，獨立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NCC）於2006年成立，雖然標誌著台灣的媒體環境管制進入新的階段，但面對的卻是更嚴峻之挑戰。

旺中併購中嘉案

2008年，本來經營食品產銷的旺旺集團，併購了中國時報集團及其旗下的媒體事業——亦即俗稱「三中」的《中國時報》、中國電視台、中天電視台——形成後來的旺中集團。由於旺旺集團的主要市場在中國大陸，該起併購案後，擔心旺中集團向中國大陸傾斜的質疑，就從來沒有消失過。而蔡衍明本人的爭議性言論——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沒有死那麼多人⁴——也突顯這樣的質疑並非空穴來風。2011年，旺中集團向NCC提出要求併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中嘉集團的要求，更引起傳播學界與媒體改革團體的關注。

旺中併購中嘉案，會有什麼

問題呢？作為有線電視頻道的通路商，系統台決定哪些頻道可以上架。全台四十七個經營區，有三十四區是一區只有一家系統台。消費者不僅沒有選擇要看什麼頻道的權利，甚至也沒有選擇系統台的權利。⁵在頻道業方面，旺中集團旗下的新聞台就已經佔了全台灣的三分之一；在系統台方面，中嘉集團在系統台的市佔率高達27.13%，更是居於龍頭地位。⁶假使旺中併購中嘉案成交，估計將有一百一十八萬收視戶觀賞的「新聞」節目內容，將由旺中集團一手掌控。

臺灣大學的鄭秀玲教授與林惠玲教授，便曾試算旺中併購中嘉後的「跨媒體集中度值」（KEK值）。根據德國媒體集中調查委員會(German Communication on Concentration in the Media, 簡稱KEK)的標準，KEK值只要超過30%併購案就會遭受否決；而旺中一旦併購中嘉，其KEK值竟然高達140%。⁷誠然，德國標準是否能夠直接適用於台灣，或許有待商榷，但要稱之媒體巨獸，恐怕也是當之無愧。

巨獸現形

不會動的媒體巨獸，大歸大，畢竟是隻紙老虎。旺中集團運用社會公器打壓異己的失格舉止，才讓

3.廣電三法指得是《衛星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廣播電視法》。

4.《蘋果日報》，〈「六四屠殺非事實」蔡衍明屢失言〉，2012年4月11日。

5.《自由時報》，〈系統台兩頭賺 難怪旺中寬頻非中嘉不娶〉，2012年9月26日。

6.《自由時報》，〈旺中若併購中嘉 學者憂成跨媒體巨獸〉，2011年9月7日。

7.林惠玲、鄭秀玲，〈恐怖的跨媒體巨獸〉；刊於《蘋果日報》，即時論壇，9月5日。

眾人意識到這頭巨獸的可怕。2012年4月間，從民進黨立委葉宜津，到國民黨立委羅淑蕾，都因為強烈表達對於旺中併購中嘉案的疑慮，慘遭旺中集團旗下中天電視台政論節目的輪番砲轟。同年7月25日，學者黃國昌號召群眾前望NCC前抗議旺中併購中嘉案的表決，卻因為現場有記者拍攝到不明人士發錢給參與學生的畫面，受到旺中集團旗下媒體的大幅報導，指控黃國昌花錢請「走路工」，動機可議。

沒幾天的時間，便有網友發現貌似旺中集團旗下《時報周刊》副總編輯林朝鑫的成年人，出現在7月25日的抗議現場，該幅畫面被網友擷取下來和林朝鑫本人對照，一時間在臉書上被瘋狂轉錄。陳為廷於轉貼後，撰文懷疑所謂「走路工」乃是旺中集團自導自演，沒想到此舉卻引起旺中集團大動作反擊，7月28日中天電視台不僅在晚間新聞公開陳為廷個人照片與個人臉書，還聲明將採取法律行動；林朝鑫更放話將對陳為廷提出誹謗告訴。

諷刺的是，恰恰就是這起「走路工」事件，才真正召喚出一波又一波挺身而出對抗媒體巨獸的學生。

七三一

「一開始都是為了聲援陳為廷。」反媒體壟斷運動青年聯盟（以下簡稱青盟）前總召林飛帆笑

道。從7月28日開始，就有群人召開一連串的會議，當時擔任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會長的林飛帆，便是其中之一。有位夥伴在臉書開設「我是學生，我反旺中」的粉絲專頁推動網路連署，沒想到短短幾天連署人數就飆到兩萬多人，大家得知這個消息後無不為之一振，也才拍板定案，確定7月31日包圍旺中大樓的行動。

這種「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效應，既要託臉書廣為流傳之福，又要拜陳為廷交友廣闊之賜，更要歸功於近幾年各校異議性社團的積極串聯。2010年由東海大學人間工作訪主辦的跨校交流、2011年由成功大學零貳社主辦的朝南音樂節、2012年由台灣大學學生會主辦的學潮再起論壇，開拓了各校異議性社團對話的空間。林飛帆大學時本身就是成功大學零貳社的創始人之一，而陳為廷則是清華大學基進筆記社的成員。也因此，反媒體壟斷青年聯盟（以下簡稱青盟），起初其實是一個異議性社團的臨時聯盟。

九一

7月31日的包圍旺中大樓行動，青盟除了要求旺中集團停止打壓異議，也要求NCC撤銷旺中併購中嘉案，但NCC或旺中集團卻沒有任何正式回應。在此同時，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宣布，將在9月1日記者節發

起反媒體壟斷大遊行。⁸青盟選擇跟進。但既欠缺媒體專業，又未長期投入媒改運動，在這個議題上，青盟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個議題要經營下去就一定會缺人，而且開學後能夠參加的人會馬上遞減。」有鑑於此，張勝涵會提出舉辦青年營的建議，希望在8月底舉辦為營隊，營隊一結束就把人拉去遊行，從中培養未來的運動幹部。對於營隊規劃，青盟內部有各種意見，有人強調媒體改革的論述，有人著重運動工作的技藝，有人傾向凝聚共識，有些傾向招募新血。而擔任營隊總召的張勝涵，則希望營隊可以成為各校異議性社團與傳播學生或媒改團體互相轉化的過程。既然青盟是一個臨時聯盟，那何不把更多人納入其中？畢竟，這些人才是與巨獸近距離搏鬥的媒體工作者。「我不知道聯盟可以撐到什麼時候，那如果會倒，也希望可以撐出一個空間。」

9月1日的反媒體壟斷大遊行，參與人數遠遠超乎主辦單位的預期。號稱九千多人的遊行裡頭，有超過五成的人是學生面孔。這可能是繼1990年野百合學運之後，台灣最大型的學生運動。⁹然而，聲勢的浩大卻難掩組織的貧弱。大遊行結束後，雖然得以告一段落，但運動能量卻快速消散，青盟好幾次嘗試集結青年營的學員，終究因為不得

其法而後繼無力，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異議性社團，也回到各自的戰鬥位置。

旺中併購壹傳媒案

讓運動跌到谷底的是，壹傳媒集團在10月陸續宣布將出售電視業務（壹電視）與平面媒體業務（《壹週刊》、《蘋果日報》、《爽報》）。種種消息都顯示，買方除了中信慈善基金會的辜仲諒與台塑集團的王文淵，還包括旺中集團的蔡衍明。從七三一到九一，壹傳媒集團不僅有平衡報導的功能，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才不過幾個月，不僅未能撼動旺中集團半分，甚至連壹傳媒集團都要被買了過去，令整個反媒體壟斷運動相當挫折。

沉寂許久，讓戰火重新燃起的，竟然是半夜裡的一通電話。林飛帆說，當時就是覺得事態嚴重，才會在午夜夢迴之際打給陳為廷。「幹！這樣下去不行啦。」衝著這麼一句話，林飛帆與陳為廷再次把大家找來，在26日與27日連續兩天佔領行政院大門，喊出嚴審旺中併購壹傳媒案、制定反媒體壟斷法案、反對中國因素干預、聲援壹傳媒工會四大訴求。更於壹傳媒併購案簽約後的29日前往公平會抗議。其準備之短、歷時之長、規模之大、群眾之多，都宣示著反媒體壟

8. 苦勞網，901反媒體壟斷大遊行。

9. 《看雜誌》，〈那一年 我們一起走上街頭的「自由之夏」〉，第121期，2012年9月13日。

斷運動將重回舞台。

青盟轉型

從11月底開始，臉書上陸陸續續出現青年學生掛著寫有「拒絕中國黑手、捍衛新聞自由、我在——守護台灣」紙牌的照片。¹⁰原本只是海外留學生的聲援，結果竟變成全台各地的串聯。校園、NGO、學生自治團體、異議性社團，都紛紛掛起了紙牌。「如何積蓄這股能量？」就成為青盟轉型的關鍵。11月29日公平會抗議結束，留在現場的青盟幹部，通過了轉型的決議，劃分出六個組別，並由各組長組成決策小組。自此之後，青盟便從鬆散的臨時聯盟，轉型為具有明確邊界的組織。轉型後的青盟，大量地吸收非既往異議性社團的社運新鮮人作為幹部，這為青盟注入活力，無意間卻也讓青盟與原本的各校異議性社團漸行漸遠。

當時就讀台灣大學材料研究所的吳學展，就是在這個時間成為青盟幹部。從大學時就開始疑惑「自己想要幹嘛」的他，因為對記者生活感到興趣，參加相關講座，才接觸到反媒體壟斷的議題。原本對於七三一與九一毫無所知的吳學展，會想要關心這個議題，一方面是因為他覺得媒體對於台灣社會很重要，「為什麼發生這多事情，卻沒

有人知道，我覺得很奇怪」；另一方面則是因為2012年總統大選時，環繞著九二共識的兩黨攻防與企業表態，都讓他逐漸意識到中國對於台灣的影響正在與日俱增。

中國因素元年¹¹

就像是吳學展所表現的，「媒體改革」與「中國因素」乃是轉型後青盟的關懷所在，甚至也可以說是青盟異於既往媒改團體之處。無論是併購中嘉案亦或是併購壹傳媒案，兩者都暴露了台灣媒體環境管制失靈的問題，也都暗示了中國資本如何控制台灣社會的問題。之於前者，既有的傳播學界與媒改團體已論之甚詳；之於後者，卻可謂是一片汪洋藍海。林飛帆回憶，早在七三一之前青盟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但苦無清楚的概念來表達；一直到後來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出版發行，¹²「中國因素」一時朗朗上口，這才提出反對中國因素干預的訴求。然而，這樣的訴求也引發青盟與部分傳播學者與媒改團體的批評，批評者認為，縱使控制台灣社會的是中國資本，但其本質還是資本，難道換作其他國家的資本來就可以嗎？如果任何國家來都不行，那又何必限定在中國呢？訴諸台灣認同來對抗中國資本，這是不是在搞民族主義呢？

10. Facebook，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

11. 吳介民，〈中國因素元年〉；刊於《蘋果日報》，即時論壇，2012年12月25日。

12. 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左岸文化，2012年。

培力與修法

縱使難免於「左右」與「統獨」的路線之爭，但轉型後青盟卻沒放棄「建立青年主體性」的嘗試，這樣的嘗試又表現在培力與修法的兩大目標。在修法目標下，一方面與民進黨團與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合作，提出修法草案；另一方面則要求在《反媒體壟斷法》制定以前，任何具爭議性之媒體併購案都不該通過。然而，民進黨提出的廣電三法修正案，嘗試納入反媒體壟斷條款，卻在2013年1月在立法院遭國民黨團擋下；而《反媒體壟斷法》雖然在3月間送入立法院，卻因為5月底立法院會期結束而擱置，立法院二次臨時會雖然於7月底召開，仍然未能排入議程，延宕至今。相較於此，在培力目標下，青盟卻大有斬獲。無論是2012年11月以後的校園巡迴演講，還是2013年1月的「一車走天涯」全島串聯，前前後後共協助成立了三十幾個新興的異議性社團。就台灣社會運動史而言，不啻是一個全新的實驗。

跨過動員的門檻

我們該如何評價反媒體壟斷運動過去一年來的表現？確實，中嘉併購案以及壹傳媒併購案，到後來都不了了之。前者是因為NCC雖然通過了併購案，卻設定了許多門檻來限制旺中集團，旺中集團對此不服提告，目前還在行政訴訟；後者

則是因為主要買家旺中集團決定收手，交易在2013年3月27日宣告破局。乍看是擋下來了，但媒體環境仍然一無所動。

在修法與培力這兩個目標，林飛帆認為青盟確實達成不小的成果，法案雖未通過，但至少排入議程，而異議性社團更是遍地開花。不過當初青盟轉型的步調如果可以慢一點，或許可以更有效地運用從七三一以來所凝聚的能量。吳學展也認為，轉型後的青盟把餅畫得太大，以至於組織跟不上運動。對此，張勝涵苦笑著說：「我們今天要做這些不是自己所擅長的運動（按：指媒體改革），都是在為過去付出代價。」台灣過去在民主化的過程裡，對於媒體改革的努力，就現在看來是遠遠不夠。但儘管青盟一路走來曲折坎坷，但從七三一、九一、十一月底這幾波行動來看，台灣的青年正進入一個高度動員的狀態，「我們正在跨過動員的門檻」。

結語

那麼，青盟的未來呢？是要完成階段性任務告一段落？還是要協助新興異議性社團的永續經營？「我們正在丟出想法」，接手青盟召集人的吳學展說。2013年6月21日，台灣與中國簽署《兩岸服貿協議協議》，無論是簽署中的黑箱作業，還是簽署後的社會衝擊，都引

起學界與產業界的強烈反彈。7月28日，由青盟與兩岸協議監督聯盟等NGO合辦的「反壟斷，要生存／反黑箱，要民主」晚會，¹³不僅僅是公民社會的抗議呼聲，也是青盟踏出下一步的摸索。

回顧青盟的發展，反媒體壟斷運動的興起，憑藉著幾點條件：陳為廷與林飛帆的冒險精神、臉書社群網站的流行、異議性社團的積極串聯、反對中國因素干預的訴求、建立青年主體性的嘗試。其中最有意思的，莫過於所謂「中國因素」。相較於2008年野草莓運動謹守捍衛言論自由的立場，盡量避免沾染上政黨色彩；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不僅勇於和政黨合作，敢於喊出反對中國因素，甚至還因此搏得掌聲。這四年多來，是什麼樣的累積，讓台灣青年養成這樣的信心？又是什麼樣的轉變，讓台灣社會形成著這樣的氛圍？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樣的信心與氛圍？

反媒體壟斷運動是進行式，它還年輕，充滿各種可能性。但至少能確定的是，即使過了這麼久，台灣仍未遺忘賴和〈吾人〉裡的詩句：「世間未許權存在，勇士當為義鬥爭。」■

13.Facebook，728「反壟斷，要生存 反黑箱，要民主」晚會。

2012年香港最大的一件群眾運動莫過於長達四個月的反國教運動，學生、家長、老師與各界人士走上街頭，最後更引發十天的絕食佔領政府總部，成功迫使香港政府擱置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國民教育的陰霾是從何開始呢？

去年香港最大的一件群眾運動，莫過於年中長達四個月的反國教運動，學生、家長、老師與各界人士走上街頭，最後更引發十天的絕食佔領政府總部，成功迫使香港政府擱置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國民教育的陰霾是從何開始呢？我們必須從回歸前後開始說起。

在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一直推行去政治化的公民教育，舉辦大量活動推動港人身份認同。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港英政府才開始推動包含政治參與的公民教育課程，呼籲市民多關心香港社會事務，參與投票，表達意見。主權移交以後，教育當局開始推行以建構學生國民身份為綱的國民教育課程，最初時利用滲透方式在不同科目（如中文、常識，以至數學等科目）推動國民身份認同，政府更資助不同學校培訓升旗隊及舉辦交流團，進一步推動國民教育。2007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並發表講話，強調「要重視對青少年進

行國民教育」，三年後，香港政府就國民教育獨立成科進行公開諮詢，最後漠視老師及學生的強烈反對意見，於中小學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去年被質疑為「地下共產黨員」梁振英勝出行政長官，隨即流傳著他上任後需要推行的「四大政治任務」，其中國民教育就是其中之一。故此，香港人開始於去年更密切注視國民教育的發展。去年7月，社交網站流出一本受到政府資助，名為《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教學參考書籍，當中對中共政權歌功頌德，將中國共產黨形容成「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並將民主制度抹黑成「兩黨互鬥，人民當災」，引發香港社會不少非議，甚至連新上任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都同意其內容偏頗，不適合作為教學教材。此事件成為反國教運動升溫的導火線，更引發部分家長成立「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監察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行。

事件隨著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處理不當，以及政府內部不斷迴避群眾訴求，最終觸發一連串的示威行動。學民思潮、教育人員專業協會、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等民間團體合組「反國民教育大聯盟」（下稱大聯盟），發起「7.29反國民教育大遊行」。在炎熱情況下，仍然有超過九萬名群眾參與遊行。雖然政府稍為作出讓步，設立「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邀請反對團體加入，可是委員會內面大多數都是親建制派的代表，反對者只佔少數，而委員會亦有既定立場主導，因此反對團體一致決定杯葛委員會，拒絕出席會議。

隨後，大聯盟亦舉辦了連續十數天的簽名運動，收集了十多萬個反對開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市民簽署，隨後遞交予政府。隨著開學時間愈漸迫近，學民思潮決定發動佔領運動。於去年八月二十九日，學民思潮成員義工進入政府總部東翼進行佔領，並同步宣布三名成員無限期絕食，要求政府立即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隨後一星期，家長、大學生、老師、七零後社運老兵團亦相繼加入絕食，令要求政府撤回科目的士氣愈加高昂。每天晚上，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外都聚集了不少群眾聲援，最高峰一晚更高達十二萬人參與。最後，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學校並可以隨意決定開科

與否，而於十月中，政府更宣布正式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後記：國民教育科事件雖然告一段落，但仍然有機會死灰復燃，以不同方式重臨，甚至到現時均出現不少不及格的教科書，香港教育界仍然處於高度戒備的狀態。隨時代的進步，具內涵的公民教育才能回應時代需求，教導負責任的公民，而不是只懂歌功頌德，順從政權的共民。■

洗腦

我在香港—我反對國民教育

黃在琳

香港大學文學院二年級曾為學民思潮義工

一場反國教運動，令香港天翻地覆。全民覺醒聽起來是如此的振奮人心，但綜觀一年後的香港，各種洗腦課程開始蠢蠢欲動，意圖再次暗度陳倉，公民意識或者已在香港再次起革命，但反洗腦這一役才剛開始以後漫漫長路。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學民思潮佔領政府總部。留守的十日中，每天不下一萬名市民到場支持，要求政府收回指引。

二零一二年十月八日，政府宣布擱置指引。

是甚麼，能讓一向文質彬彬的香港人，尤其是追求生活安穩的中產家長，頂著烈日，汗流浹背的四處奔走？

是甚麼，能讓一向冷感的香港人，尤其是朝九晚五地忙碌的香港上班族，前仆後繼的，嘶啞著聲音高喊撤回？

又到底是甚麼，讓一群本該快樂無憂的中學生，陪上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呼喊奔走，甚至在政府總部掛上了鐵屋吶喊的黑布日夜留守，只為要求政府與之對話？

德育及國民教育指引，由香港政府所建議推行，內容「旨在透過持續學習，使學生對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快速的發展引以自豪及建立國民身份認同，並以價值觀和態度為導向，幫助他們養成良好品

德和『國民素質』，從而豐富生命內涵，確立個人於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範疇的身份認同」。推行目的乍看之下仿似百利而無一害，然而魔鬼在細節；細讀以上宗旨的每一字，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油然而生。

紙上談兵—沒落的中國歷史

1997年香港回歸，筆者的祖父感嘆：「回歸祖國，以後的孩子學的不只是無日無之的英文，終於也要飲水思源，學習華夏五千年的歷史了」。可惜的是，在筆者就讀於中學的年代，中國歷史已成為乏人問津的夕陽科目。如果讀者像筆者一樣經歷過千禧年後中學教育的洗禮，大抵會理解到中國歷史在學校如何凋零。

筆者學習中國歷史的三年可以用四個字簡單概括：枯燥無味。說出來看似不留情面，可是只要看看分了科以後還有多少人願意選修中國歷史就會明白這科目在香港是何等蒼白。在筆者準備考公開試、

也是最後的一個中學學年中，在九十二個考生中繼續選修中國歷史的，只有五個。與此同時，同樣被視為冷門科目的英語文學和世界歷史，卻分別有十八個及九個同學修讀完畢。筆者甚至聽說過有學校把借出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直接送給學生，理由是「中國歷史已經乏人問津，下學年也要停辦，書留下來也沒用。」

到底我們的中國歷史教育發生甚麼事了？

對香港教育制度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人文學科在香港的教育裡總被解剖得支離破碎。以中國歷史為例，中國歷史教育完全被切割，成為了一個又一個只能考核不能細讀思考的單元。由存疑時代到三皇五帝一直到元明清，一個又一個朝代被切割成一個單元，沒有人教會學生，一個朝代覆亡的原因可以是另一個朝代的崛起的原因；沒有人教會學生，朝代覆亡，可是箇中文化精神不一定從此滅絕；更沒有人教會學生，在同一個時空裡，其他族群如何與這個朝代互動，如何影響一個朝代的發展脈絡。我們的中國歷史，在香港回歸後的第十五個年，一直對中國歷史教育大惑不解的筆者終於發現，啊，這個科目原來只存在於考試試卷中。

在中國歷史快要從學校銷聲匿跡的今天，我們在電視裡看到，一

個中學女生對著鏡頭說五四精神是尊重和包容。筆者並不怪責這位女生，歸根究柢，一個在香港就讀中學的學生，如果對歷史認識不足，通常都和中學的歷史教育蒼白無力脫不了關係。面對如此沉悶的中國歷史課程，任誰也提不起勁細細研讀；即使立心修讀，也不過是在修讀一份考試內容。中國歷史，在香港可是連啟發學生思考也做不到，更別說令學生深入認識歷史與自身的關係了。

哪來的根？

連中國歷史也教不好，我們的香港政府卻又居然摩拳擦掌要推出一份德育及國民教育指引。我們再仔細看一次指引中對學生的要求：

「旨在透過持續學習，使學生對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快速的發展引以自豪及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快速的發展？引以自豪？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看過課程指引的人都知道，這份指引要求教師教授予學生的中國是片面的、支離破碎的。指引所擬定的第一至第四學習階段不斷要求學生在國家範疇中學習建立國民認同身份及愛國心，更引指歐美地區亦有推行類似國民教育的課程，

「均重視培養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然而，筆者想指出的是，外國對應於香港國民教育課程的通常

被稱為公民教育，課程內容亦相對完整。

筆者在這將簡略介紹法國公民教育的部分課程內容。法國作為世界上公民教育發展得最完整的國家之一，其教育部所制定的課程內容對於學生對國家及歷史的認識有相當的要求。法國學生於七年的中學教育中，公民教育於初中的四年間為必修科，課程中對於歷史的著墨篇幅不少。歷史教育的延續性及完整性在課程裡亦可見一斑。學生於中一和中二是學習古文明和宗教的發源和發展，涵蓋了世界上大部份古文明的歷史，讓學生多元地了解文化的發展。中三和中四的公民教育著眼於近代的世界發展，所涉獵的題材由18世紀的歐洲及各場革命，以致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法國本國的各種歷史均在課程中。

再看仔細一點，不難發現法國的公民教育與歷史其實環環相扣。學生在學習世界歷史的同時，各種和公民社會有關的主題（王權、民主、革命等）貫穿了整個初中的公民教育課程。課程不要求學生對自己國家的種種倒背如流，但卻用各時代的歷史引導學生思考，從而啟發學生對於公民意識的認識。法國的公民教育也包括法國本土政治，課程設計採用大量史實教育學生認識法國，課程相比香港的國民教育來得客觀。

反觀香港的國民教育，在國家這個學習範疇，課程設計令學生不斷被重複灌輸中國強盛美好的一面，卻忽略了教導學生中國在歷史上，以致在當代的缺失和黑暗面。簡單舉例，在第一學習階段，指引要求學生「理解國家的山川地貌特色，感受其廣闊疆土」；但對歷史的著墨卻少之又少，整份課程指引對於引導學生從歷史中理解中國僅由幾句認識中國歷史的重要時期輕輕帶過。更讓人不安的是，德育和國民教育被歸納成同一個科目，當中的含意實在讓人不敢恭維：以後的學生大有可能被灌輸不愛國就等於不道德的意識一而我們知道，盲目、與道德掛鉤的愛國，通常只出現於極權國家。

說了這麼多，其實所有事離不開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感情，不是任何教育能製造的產物。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最賣力教育國民愛國的一個國家，是納粹德國。如果一批又一批的學生被要求愛國，被剝削了完整地了解中國歷史、自行判斷其是是非非的權利，被灌輸一種排外的社會意識，恐怕香港人那僅餘對於身份認同的探索空間也將被消耗殆盡。香港，一個曾經被形容為空氣是自由的地方，不需要任何指引來教導我們的學生該如何愛一個國家。我們不需要任何指引讓老師來教育我們的學生要如何思考。

親歷其境——我在街頭奔走的日子

《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一書被發現內容偏頗，引發了九萬人上街，為往後三個月的反國教運動拉開了一個人聲沸騰的序幕。

筆者也是去年七二九遊行中九萬人的其中一份子。曾有評論員說過，在外國，要是觸發到九萬人上街，那政府中的主事者只有下台一個選擇。但是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無論有多少人上街多少人表達不滿，政府不理睬你就是不理睬你。短短三個月，香港人見證著我們的政府如何扭盡六壬為了一份滿是漏洞的指引護航。短短三個月，香港人見證著我們的政府如何漠視民意。

七二九過後，因為一份不忿、因為不甘心在筆者之後的莘莘學子從此被剝奪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自由，筆者加入了學民思潮成為義工，在往後兩個月的反國教運動中穿梭於街頭。短短的兩個月中，筆者由一個連派傳單給途人也澀於啓齒的新手，變成了在一晚集會間僅和數個學生義工應付著數千人流的學民義工。短短的兩個月中，一句立於街頭、走進人群，讓筆者看見了社會眾生相。

香港人一向文質彬彬一說穿了就是比較冷感。筆者在過往十年看

到香港人為了社會而憤怒，而市民又願意走出來的，記憶所能觸及的就只有零三年的五十萬人七一遊行。零三年適逢非典型肺炎肆虐全球，香港人對於時任特首的董建華所有不滿被一場疫症所引爆一失誤的房屋政策、無力重整香港經濟、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種種無能的施政讓香港人意識到自己所處於的社會再也不容許自己沉默和置諸不理。上街，成為了社會大眾市民發聲的途徑。五十萬人上街，成功令政府擱置廿三條立法，亦從此令七一遊行成為香港人社會參與的象徵。

然而，零三七一過後，香港人又仿佛重拾那種冷感。仿佛零三七一的那種熱情不過是曇花一現，仿佛香港的城市面貌又再次被香港人冷落。往後有關社會、有關民生的議題，仿佛都只有小數人看成是自己的事，走上街頭為社會發聲。現在細細回想，卻又發現其實香港人的冷感不難理解。如果說二零零三年是香港人的公民覺醒，那引爆這一份覺醒的，大概是香港人對於自身利益被明顯侵蝕的危機感。一如之前所說的，七一遊行成為了香港人社會參與的象徵。遺憾的是，遊行亦從此變成了多數香港人表達訴求的唯一社會參與方式。

近年和多數香港人提到社會參與，第一時間在他們腦中所浮現的，是年輕人衝擊警方鐵馬、是示

威隊伍被噴射胡椒噴霧、是示威者被抬走——在他們眼中，社會參與是激進的、是會擾亂現有秩序的。很多香港人抱著一種心態，一種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心態。他們會覺得，國民教育沒有阻礙到我的生活、沒有妨礙到我的孩子考小學，所以我不用費心裡去搭理它。有更多的香港人甚至會覺得，站出來的人都在擾亂秩序、不過爲了反對而反對。在剛開始派傳單、收集聯署的時候，筆者也聽過不少類似的評語。不過當初最讓人氣餒的，是叫我們先給政府一點時間，等成效出來了才決定要不要反對的聲音。筆者不敢貿然斷定這樣說的香港人都沒有看過那份教育指引，但最起碼，和筆者說要給政府時間的人，十之八九連上網查閱一下國民教育是何方神聖也沒有。

這些香港人才最讓筆者擔心，他們抱持著香港所謂「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態度，但當中的理性卻是一種由別人所灌輸的理性——他們不反對溝通，但前提是你不能挑戰權威；他們不反對參與，但前提是你不能擾亂他們已習慣的秩序。讓筆者不安的是，過去幾年中，抱持著這種態度批評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的，都是事業有成、生活質素中上的中年人。由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到反對清拆菜園村；由反國教到支援碼頭工人，筆者看見了越來

越多年輕人的參與，也看見了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口中的中產批評。

反國教一役，喚醒了莘莘學子站出來。七月，八月，無數學生爲了把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傳到更遠，走遍了全香港。九月初，一連十日，學民思潮百多個成員義工日夜守在政府總部，爲的只是要政府直接面對民意。《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一書成爲了這場運動的引爆點，一本教科書讓香港人終於明白，原來我們的思想自由隨時可以被溫水煮蛙式的謀殺；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的沉默大多數支持論讓香港人終於明白，原來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後果是你真正想發聲的時候才發現你早就被代表；特首梁振英讓香港人明白，面對一個不民主的政府，只顧生計不問社會、千方百計要遠離政治，最後受害的依舊是民生。

當然還是會有人批評學民思潮的學生鬧市、爲反對而反對，但看見七二九中那帶著嬰兒車來遊行的家長；看見八月時握著學生義工的手說加油的市民；看見九月那剛下班拿著麥當勞外賣，不介意會場已經擠的水洩不通，坐在馬路邊加入集會的上班族，筆者的心底裡有一種莫名的欣慰。到現在，筆者房間裡還貼著十月重返公民廣場集會所派發的單張：全民覺醒。

全民覺醒這四個字，在香港是很有意思的。零三年的時候社會上

很多聲音說，啊，香港人終於站出來了；啊，香港人的公民意識終於起步了。然而如上面所說，香港人的社會參與經歷了好些倒退、好些耗損。反國教一場運動，能夠喚醒市民關注這個議題，很大程度是因為這次的抗爭者由過往的大學生、成年人換成了中學生。對於香港人來說，要未成年的學生出來為同樣是學生的其他孩子捍衛自由，在近十年的香港社會可以說是匪夷所思。可能有人不同意筆者的推測，但反國教之所以引起了不同階層市民的注意，原因不外於一群中學生為公義所發聲而站上了的道德高地。

一場反國教運動，喚醒了無數本來對政治漠不關心的香港人。由家長關注組到各個校友關注組；由七十後社運老兵團到各方演藝人員，香港人又一次見證了社會參與的轉變，香港人再一次體驗了公民社會的力量。但指引擱置以後，公民社會這個概念該如何繼續廣傳於香港社會？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短短兩個月的運動經驗中，不乏市民告訴我們香港的未來就靠你們、香港再次出現英雄。然而一個社會中，參與社會事務其實並不一定要像黃之峰、葉寶琳等社運人士一樣走在前線。反國教之所以成功，不只因為每天數以千計的市民前來參加集會；更重要的是，一眾市民走出自己的框架，用心留意各

種社會事務一家長留意孩子學校有否滲入洗腦教育；學生在學校簡易向同學說明國民教育的弊端；各方市民密切留意政府每天的最新動態、行政機關的最新決策。反國教由一群學生擔當了打開大門的先鋒，背後逼使政府把指引擱置的，是這一股來自公民社會的監察力量。

一場反國教運動，令香港天翻地覆。全民覺醒聽起來是如此的振奮人心，香港仿佛邁進了一個全新的公民時代。但綜觀一年後的香港，各種洗腦課程開始蠢蠢欲動，意圖再次暗度陳倉，荼毒學生的思想自由。公民意識或者已在香港再次起革命，但反洗腦這一役才剛開始以後漫漫長路，就靠覺醒的香港人繼續走下去。■

陸客湧港顯矛盾 族群矛盾漸激化 階級矛盾是根源

譚樂基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

中港交流漸漸頻繁，加上共產黨加強對港控制及干預，香港人的自我認同開始覺醒，透過個行動及渠道宣洩不安感並做出反彈，以尋求更大的自主性。香港的排外情緒不斷加劇，反蝗運動，聲討大陸遊客不當的行為不斷進行甚至升級，在這陸客問題的背後，除了族群矛盾外，還代表了些甚麼？

前言

自2003年起，香港與內地簽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簡稱CEPA），這是中港融合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其中一個衍生品便是大陸遊客自由行。根據官方對CEPA的論述：¹

「CEPA是一個共贏的貿易協議，為內地、香港與及外國投資者帶來新的商機。對香港來說，CEPA協助香港商界開拓內地市場的龐大商機。CEPA也為內地帶來不少益處，讓香港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最佳跳板，加速內地與世界經濟的接軌。」

如此論述，彷彿將CEPA這互惠性質的貿易協調定調成大陸對香港的「恩賜」，好像將香港看成寄生大陸一樣的噁心。

近年，隨著自由行及中港交流漸漸頻繁，加上中共加強對港控制

及干預，中港融合的歷史巨輪彷彿變得無可避免，中港矛盾亦由此而生並漸漸加劇。

在這大環境的轉變下，香港人的自我認同開始覺醒，通過各行動及渠道宣洩不安感並作出反彈，以尋求更大的自主性。香港的排外情緒不斷加劇，反蝗運動，聲討大陸遊客不當行為的行動不斷進行甚至升級，在這陸客問題的背後，除了族群矛盾外，還代表了些甚麼？筆者將以本土土生土長香港人的視點提出觀察結果並進行批判。

中港融合現矛盾 財富分配顯不均

中港融合的其中一個方式就是透過大量大陸遊客訪港，為香港帶來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收益，並以之作為統戰手段之一，令香港對大陸產生依賴，也成為制衡香港的其中一個技倆。

大陸遊客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收益，但與此同時亦帶來不同的

1. 工業貿易署。(2013)。工業貿易署：CEPA專題網頁。

社會問題。大陸遊客帶來大量大陸資金，大大地加劇香港投機炒賣之風，上至股票地產等投資市場，下至奶粉益力多等日常用品，無一不被炒起。

可是在這透過不斷炒賣升值而帶動的經濟增長背後，大部分的香港人能分享到這些自由行所帶來的成果嗎？不！自由行的消費的金額雖然不算少，但實際上落在誰的口袋，就絕少人會去想。這些自由行在港的消費多是購買奢侈品，所帶來的大部分收益，除了透過名牌貨賺取大量金錢的名牌大集團手上外，絕大部分的資本收益也只是掌握在那些大地產商及日益膨脹的中資集團手中。過去三年受自由行帶動，零售額大大增長了65%，但零售僱員名義工資增長僅得27%，²工資增幅遠遠不及零售額增長。在大部分港人的口袋中，能夠從自由行所能分享到的經濟淨增長成果其實遠比想像中的少，但大部分港人卻直接或間接地身受其害。

在這不斷漲價的環境下，商店慢慢變得更加單一化集團化，香港的租金呎價漸漸高得離譜，只有能付擔如此高昂租金的商舖才能生存。除了走在街上仿如返回廣東的廣東道已被自由行陸客攻陷，成為各大名牌旗艦店的集中地外，早前D & G (Dolce & Gabbana)只許陸客拍照卻不容本土港人拍照更牽起一連串風波，港人亦發起圍拍行動

反擊，這些看似繁華光影的背後，好像已經變得不像屬於香港人的地方，而對大陸人的排外情緒亦漸漸激化。

現在就連本土港人常逛潮流集中地——旺角，也開始出現大集團名牌商店進駐，而本地小店被趕走的情況，瓊華中心原是本地年輕人和辦公室女郎的集中購物點，但中心內的本地小店卻無奈地因自由行及租金倍升而面臨結業，街上的店舖變得單一化，彷彿變得像是為大陸遊客服務一樣，而香港人消閒娛樂的地方就變得愈來愈少，香港人更失去了大家共同的集體回憶，市場亦被大集團壟斷，消費者失去選擇的可能性，在缺乏競爭的市場下，消費者任由大財團宰割。

而且在這大財團壟斷的環境下，市場漸漸缺乏公平競爭，而本土小店的生存空間亦漸小，香港人創業就更難，不像以前靠著獅子山下精神努力打拼便可成功。反之，普遍的香港人卻因高租金和大量資金流入下，身受其害，承受租貴房貴物價高漲之苦，努力打拼換來的卻是僅能糊口的收入，這正正是典型香港人的寫照。

而且自由行陸客數量之多，已破壞了香港城市本身的平衡，亦失去了城市本身的秩序，產業漸趨單一，亦開始依賴大陸喪失我城原有的活力和多元。這亦令香港本土失去原有靈活多變的特質、自我成長

2.星島日報。(2013)。陸頌雄：租金與工資。

和有機發展的生命力，與及可持續發展的可能，適應力和競爭力隨之而下降。

財富分配現不公 族群矛盾漸暗生

由於香港人受到自由行所帶來的衝擊，大部分的香港人不能分享到自由行所帶來的經濟成果，卻要日日忍受自由行所帶來的惡果，如物價高漲生活壓力迫人等切身問題，還有大陸遊客行為不檢等問題。雖然行為不檢的大陸遊客可能只佔少數，但他們不當行為隨街蹲、髒、吵鬧、甚至隨街大便，卻惹來大多數港人強烈反感，也對香港人帶來龐大的衝擊，甚至成為族群矛盾的其中一個導火線。

其中，部分香港人將大陸人比喻成蝗蟲，大陸人佔據了香港的資源而自肥，然後「割禾青」地絕塵而去。而「反蝗運動」的出現，更帶有排外甚至族群歧視色彩，與此同時族群矛盾亦由此而生，這令原本由移民組成香港社會漸漸撕裂，變得不再包容多元，也喪失香港原有的獨特性和優勢。

族群矛盾屬幌子 階級矛盾實真兇

在香港人與大陸人之間族群矛盾的根源，實際上是大陸投資及消費所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均，這些資

本長期只壟斷在社會上層階級一小部分人的手中，而大部分的香港人卻不能在自由行的帶動下獲得合理的收益，反之，他們卻承受自由行直接及間接所帶來惡果。

直接或間接促成香港族群矛盾的卻是那些大地產商和中資集團，還有財富分配不力的香港政府。那群上層階級一小部分的人利用民粹化把戲及香港人不滿陸客的情緒，蓋過原有的階級問題，並透過各種各樣的上層建築渠道將階級矛盾轉移成族群矛盾，從而令公民社會內耗，並掩蓋核心的階級問題。

將階級矛盾轉移成族群矛盾，實有利於「黨官商」集團繼續地控制香港的資本市場，與及有利他們的利益集團繼續及持續地剝削。再者將階級矛盾轉移成種族矛盾，實在是民粹化的其中一個把戲，這將大大不利公民社會的發展，也將公民社會的錯誤地把焦點在種族矛盾之上，而非核心的階級矛盾之上，無助有效地改變社會，也無助從根本地改善這個備受剝削的景況。

再者，香港政府並不民主，特別行政區首長（特首）的選舉過程並不民主，由中共及商界控制的小圈子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特首，除了在關鍵時候又很大程度地受制於中共政權的控制，也受到商界的影響。加上香港立法會的一半席位由中共及商界控制下的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產生，這令社會上屬少數

的建制派透過畸形的政制進入立法會成為立法會的大多數。在政府行政主導和立法會建制派的保駕護航下，立法會除了淪為橡皮圖章外，也成了各利益集團透過立法程序達致分配利益或進行利益輸送的場所，立法機關不再是監察和制衡的機關。在這畸形制度下，香港政府維護「黨官商」勾結利益集團的利益而失民心，亦不能有效地保障香港人自身的利益。

而且，現在的香港「黨官商」勾結畸形之勢漸成，能有效地作出財富分配就更難，

因為那些獲益的既得利益者，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管治。將來的環境，對大部分港人來說只會變得更差，隨著中資集團進一步坐大，加上原有各大地產商長期壟斷，利益分配只會變得更加細緻，絕大部分的資本只會落入中資集團及地產商之手，市民難以從中獲利，反而從中被層層剝削，苦不堪言。

階級矛盾急求變 民主政改莫遲延

階級矛盾的各問題，如財富不均等等，在社會累積了非常重的怨氣和怒氣，衝突不時地發生，而這些衝突其實是可以避免的。要解決階級矛盾及財富不均問題，必須要從人民充權(empowerment)與及民主的政制改革開始。人民在現在這不民主的環境下，要勇敢地為自己及

別人的權利發聲，從而經歷充權並持續充權，關心社會參與社會，並爭取民主政制。持續地監察及完善民主政制，令衝突能在民主政制中化解，也能透過民主政制有效地監察及制衡政府，使之能真正地保障香港人的利益，並為民謀幸福。■

陸客

量變到質變

中國觀光客的雙面刃

施彥廷

台灣大學政治所

從開放中國大陸旅客來台觀光開始，制度上對於來台限制持續放寬，大陸來台人數直年上升，占來台主要客源的比例逐年擴大，目前已成為來台旅客的主要客源。這樣龐大的客源，對於台灣的觀光造成什麼影響呢？

中國觀光客來台人數近年來直線上升，從2008年的32萬9千人次，到2012年已成長到258萬6千人。以2013年7月為例，單月共有24萬8千人次中國大陸旅客來台，換算下來，一天就有8千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來到台灣。¹2010年台灣平面媒體對於「陸客」的相關報導就高達2983筆，大陸觀光客受到台灣社會的注目程度，可見一斑。

管制逐漸放寬 人數逐年上升

從開放中國大陸旅客來台觀光開始，中國觀光客的數量逐年上升，政府對於中國觀光客來台的管制也逐年放寬。2008年兩岸開辦平日包機直航，2009年改為定期航班，每週有231個航班往返兩岸，而到了2013年8月，已增加到每週670航班。此外，2011年馬政府開辦「自由行」，有別於以往「團進團出」的方式，中國觀光客得以持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俗

稱入台證）和大陸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俗稱陸胞證）往來台灣。起初只開放北京、上海、廈門三個城市的居民開放，到了2013年已開放26座城市，²每日配額上限2000人。並從2013年8月開始，開放中國大陸專業人士「一年多次簽」，有別於以往「一次一簽」的簽證規範，中國人士將可以用一份入台證於一年內多次往返台灣。

在制度上對於來台限制的持續放寬，具體表現在中國大陸來台人數上。大陸來台人數逐年上升，佔來台主要客源的比例逐年擴大，目前已成為來台旅客的主要客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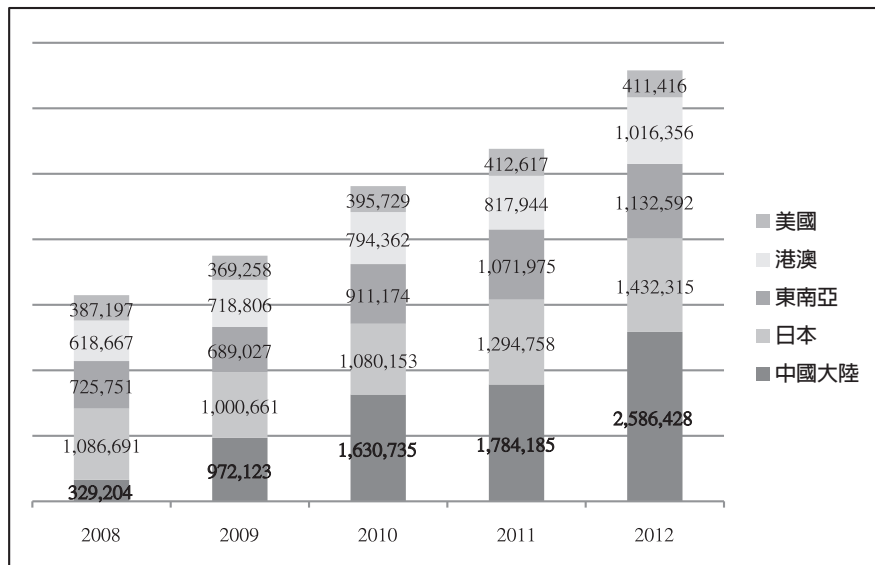
觀光收益大 觀光業倚賴中國觀光客

這樣龐大的客源，對於台灣的觀光造成什麼影響呢？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調查，中國觀光客的每人每日平均消費為265美元，僅次於日本的308美元，是消費力第二強的國

1.含觀光、業務、交流等目的。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年報

2.自由行26個試點城市為：北京、上海、廈門、天津、重慶、南京、廣州、杭州、成都、濟南、西安、福州、深圳、瀋陽、鄭州、武漢、蘇州、寧波、青島、石家莊、長春、合肥、長沙、南寧、昆明、泉州。

表一、近五年來台主要客源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歷年觀光統計。

外旅客。如果從2008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開始計算，「團進團出」的觀光客達573萬，平均停留6.5日，估計已創造2千9百多億的觀光外匯收益，無怪乎台灣的觀光產業殷切關心中國觀光客的旅客人數。

例如中國在2013年10月施行《國家旅遊法》，對於旅行社的管理趨嚴，進而影響到中國觀光團的出團人數，對此高雄的飯店業及餐飲業馬上受到衝擊，訂單銳減。³除此之外，高雄市長陳菊更曾表示過希望增加南部的直航班次，增加中國觀光客「南進南出」的意願。⁴

觀光業萬靈丹？爭議層出不窮

然而，中國觀光客在台灣各個景點的脫序行為，也屢屢成為新聞的焦點。例如在野柳女王頭上簽名、於風景區隨地小便，以及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吐痰、插隊等情事，已是台灣觀光客在景點常見的景象，如此使得台灣民眾對於中國觀光客的印象普遍不佳。雖然政府欲試辦「優質團」來改善此現象，但仍舊因優質團人數不如預期而無濟於事。⁵因此，避免在觀光景點遇

3.謝龍田，「陸客銳減一半 觀光業盼祭獎勵」，2013/9/1，聯合報。

4.孫偉倫，「高雄首爾開航 陳菊：爭取南進南出與直飛航線」，2013/6/10，Nownews今日新聞。

5.曾虹雯，「中國「優質團」沒人來 飯店叫苦」，2013/6/28，民視新聞。

到大批中國觀光客，已成為台灣國內旅客的旅遊注意事項。

除此之外，中國觀光客雖然多，錢真的進入台灣業者的口袋嗎？根據報導，台灣的觀光產業已出現「港資一條龍」的壟斷現象，也就是由港資來台投資旅行社、飯店、商場等，使得中國觀光團的上中下游均被特定資本壟斷，⁶導致台灣本地的觀光產業無法從中得利。而隨著馬政府對於中國資本的逐漸解除管制，此一現象恐怕會逐漸加劇。例如馬政府欲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就開放了中國資本來台開設「乙種」旅行社，雖然「乙種」旅行社不能直接承攬國外旅遊業務，但是仍然使中國資本進軍台灣的旅遊業，瓜分市場。

下蛋的金雞母？致命的吸引力？

雖然帳面上中國觀光客為台灣帶來了龐大的收益，但別忘了觀光客來台人數是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上，要收要放，都仰賴中國的臉色。中國觀光客的開放，是中國政府對台「讓利」的手段之一，若是台灣本地業者過於依賴中國觀光客，將使得赴台觀光客的人數管制成為中國干預台灣政治局勢的工具之一。日本觀光廳有感於釣島紛爭之後，中國觀光客大量減少，因而在2013年的《觀光白皮書草案》中

建議多向東南亞旅客招手，避免過度依賴特定市場。⁷台灣人在面對中國觀光客時，除了要打開雙手迎接，也不可不慎慎面對背後的政治意圖。■

6.鄧凱安，「港資一條龍跨海來台 專賺陸客財」，2013/3/29，壹電視。

7.林翠儀，「日觀光白皮書 倡降低依賴中國客」，2013/5/27，自由時報。

選舉

香港人看普選

陳柏亨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人很矛盾，希望保持現有自由，延續港英政府所建立的種種基本權利，但不少港人都不希望因為爭取民主落實的過程中，引起過激的行為而致令玉石俱焚。作為一個香港人，我願不願意放下部分生活條件，去追求自己應有的權利？

歐洲國家爭取普選過程是因為中產階層興起，所以希望能夠自己的聲音能進入制度；中國大陸對普選態度卻因為富有階級都與政府的利益一致，致令往往因為站在與中央角度，否定普選民權。香港人則是很矛盾，希望保持現有自由，延續港英政府所建立的種種基本權利，但不少港人都不希望因為爭取民主落實的過程中，引起過激的行為而致令玉石俱焚。筆者為一社工學生，同樣肯定民主自由價值，但心痛香港在追逐民主的落實的同時，漸愈喪失其他與民主同樣珍貴的公民精神質素。

香港現今民主進程

在普選權利上，香港人普遍是認同民主精神。可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在選舉特首時，我們只能從千二人的選舉委員會中選出特首人選。在立法會的選舉中，則分為全民普選及功能組別。前者為全香港人都能選出，功能組別則是某些利

益團體代表才可以選出，例如教師選教育教、農民選漁農界。但是長久以來，由於某些界別的比例未有更新，又可以進入議會進行表決，例如漁農界選委只有159人，卻可以選出一人，教育界有七萬餘人，也只能選一個。最後，功能組別更否決多個民生議案，例如「制定公平競爭法例」、「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均能從地區直選所產出的議員所通過，卻被功能組別方面的議員所否決，可見未必能夠代表普遍市民聲音。

「公民抗命」以迫令政府進行政治改革？

最近，香港因為「佔領中環」牽起爭議。部分香港人希望以佔領香港一大經濟地區，即中環，以要脅政府徹實推動普選。但是由於中環乃香港經濟重鎮，不少人擔心會因為佔領中環而令香港經濟蒙受災難，如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便指出佔領中環可能會使

香港每天損失十六億港元。此外，也有團體認為佔領中環指向對象不當，應該指向香港特區政府而不應有針對內地中央政府的部分。無論如何，這正代表香港人對「經濟發展」與「民主發展」當中的矛盾，同時也會有牽涉到「一國兩制」的政制爭議。

筆者很少關心佔領中環是否合法。因為在追求公民基本權利與表達市民聲音的條件下，不應單以時下法律就去認同與否定當中的意義與是否應該實行。筆者一直思考，經濟利益與基本民權，哪樣比較重要。民主不保證民生，只是強調公民應該有參與政治與選擇社會代理人的權利；而經濟利益卻是人民生活水平所在，作為一個香港人，我願不願意放下部分生活條件，去追求自己應有的權利？

個人想法與結論

其實，香港人對民主精神絕大部分都是肯定的。但在實行民主的改革歷程中，因為政府遲遲未公佈方向，為政治局勢添上更多不明朗因素。尤其是保守派和改革派，兩方的激進力量正在不斷擴張，甚至有不少兩方陣營團體都高調地於各主流媒體唇槍舌劍。筆者不明白，為何如此重大議案，到目前為止政府都未有公佈任何清晰路線圖，四年後就普選立法會，但現在政府始

終閉門造車，任由持不同意見的市民在外撕殺？

最近不單是中聯辦發言人曾於公開媒體對未來香港實現的普選憧憬進行表態，例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強調佔領中環無論如何包裝都是違法；美國駐香港大使館領事夏千福也表明「期待香港根據《基本法》、人大常委的決定及港人意願，在2017年及2020年，真正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顯示外國與中央勢力在香港也有不少的角力地方。筆者並不擔心外國高調支持本地民主發展，而是正正有世界性的重視，香港人才能避免只受內地政府壓力，延遲落實民主的速度。

不過，若只追求民主，欠缺公民互相尊重與自由的保障，則會引來更大的亂局。可惜，香港政局與社會矛盾近年不斷被激化，特首梁振英明顯無力維持社會和諧，建立如當選時所講的「香港營」，社會輿論混亂情況令人擔憂。筆者作為社工學生，亦出身基層，希望民主制度能夠在香港實踐。但近年目睹保守與建制力量上升，往往感到唏噓，究竟因為社會愈來愈混亂而不應予香港實踐民主？還是某些人製造混亂來減低市民對民主信心？無論如何，筆者期待民主早日落實，也希望政府應多做諮詢與盡早公佈草案，而不是冷眼漠視社會爭論不出來解畫。正正因為政府久久未行

動與表態，令外界難以評估政府推行方案為何以及其態度，佔領中環行動亦因為外界不能評估政府反應，變成一賭博——以癱瘓經濟來一搏不知有多可能成就的民主改革。問題不是方案提出者有多激進，而是政府為何還可以無動於衷？■

以商圍政繼續進行，上次九二共識，下次呢？

顏蔚慈

東吳大學政治所

從1996年畫過台灣海峽的兩顆飛彈，到2012年選前台灣商界領袖紛紛公開宣示支持九二共識；從文攻武嚇到以商圍政，在在顯現出中國為左右台灣選情，不單著力甚深，更透露出隨著中國對台策略的轉變，其執行手法更為縝密細膩。

2012年總統大選甫結束，中研院副研究員吳介民即投書蘋果日報評論中國因素對此次選舉的影響，文章一開頭便說道「國民黨勝選，有人認為是中國獲勝」。¹確實，從選前各種跡象顯示，說是國共聯合對抗民進黨的一場選戰也不為過。中國試圖影響台灣選舉情勢已非一朝一日之勢。從1996年劃過台灣海峽的兩顆飛彈，到2012年選前台灣商界領袖紛紛公開宣示支持九二共識；從文攻武嚇到以商圍政，在在顯現出中國為左右台灣選情，不單著力甚深，更透露出隨著中國對台策略的轉變，其執行手法更為縝密且細膩。

恐嚇不果，錢誘利惑

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普選，中國於95年年底便展開一系列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更在大選前夕送給台灣海峽兩顆飛彈，文攻加武嚇就是想讓台灣民眾緊張害怕而不出門投票。不論

究竟是美國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協防奏效，抑或是中共劉連昆少將提供的空包彈情報穩定民心，還是台灣硬頸精神的展現，最終台灣民眾用張張選票堆疊出所謂的亞洲民主奇蹟，以過半數民意賦予「獨台」的李登輝執政正當性，這是中國干涉台灣選舉第一次的挫敗。

四年後的台灣總統大選，中國重新調整對台選舉的干涉策略，加碼文攻力道而輕武力威脅。2000年3月15日時，任國家總理的朱鎔基接受記者提問對台灣選舉情勢看法時說道「絕不承諾放棄武力」、「誰要是搞獨立，你就沒有好下場」、「台灣股市重挫617點，集中地反映了台灣人民對於台獨勢力囂張的憂慮，他們擔心，台獨勢力的上台會挑動兩岸的戰爭，破壞兩岸的和平」等云云，句句鏗鏘有力，強硬又帶點眼泛淚光的戲劇性談話。三天後，「台獨」的陳水扁當選，和平的政黨輪替再創民主奇蹟高峰，而這是中國干涉台灣選舉的第二次失敗，也是最為挫折的一次。

1. 吳介民。「中國因素與台灣選舉」。蘋果日報。2012。

2004年面對欲尋求連任的陳水扁，中國此次採取極為低調的文攻武嚇，不願再次造成台灣民眾更加堅定投票意志的反效果。但無論是牽手護台灣還是兩顆子彈奏效，最終中國欲左右台灣選舉的期望還是落空。

儘管三次文攻武嚇的張力及強度有別，但干預台灣選舉的目標總是失敗，中國於是開始調整對台工作方針，認為加強「經貿利誘」及「民族情感訴求」才是有效影響台灣選舉的重點策略，其中又以經貿利誘最為赤裸鮮明。

隨著兩岸投資開放，中國市場吸引大批台商進駐投資設廠，這批台商人質在台灣選舉期間成為最易號召也最堅定的投票部隊，另可稱為「92共識直銷商隊」。中國透過對台商惡意查稅、逼迫表態等方式要求台商返台投票，²形成許多台商剛下飛機便秀出特定手勢並拍照留戀的特殊景象。2010年台灣五都選舉，更傳出國民黨訂一「十萬台商保五都」的輔選計畫，直接將台商畫上堅定票倉的深藍色。³2012年選舉，台商表態更儼然已為經過嚴密排演、精心安排的連續大戲，從潤泰尹衍樑登半版廣告表示經濟穩定好重要、東元黃茂雄親自上陣替藍

營拍CV，到長榮張榮發、鴻海郭台銘、台塑王文淵，以及選舉前一天HTC王雪紅的公開表態，不僅時間序列整齊，連力挺92共識的口徑也幾近一致：一、確認92共識的真實存在；二、確保92共識等同於確保台灣社會、經濟的穩定。其中郭董演得更是出類拔萃，還自掏腰包包機送台商回台投票，可算是友情贊助加碼送。

對此，美聯社於一月初特發佈報導直指中國運用貿易來影響台灣選舉；香港學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則表示，中國雖表面保持沉默但檯面下卻不斷以經濟力量影響台灣選舉。⁴而根據台灣媒體指出，國台辦系統推出超低價機票、威脅中斷交流，以及針對挺藍台商的切割綁票方式，積極動員各地台商、台商協會計20萬人配合回台投票。⁵此外，中國社科院台研所陳桂清則撰文表示，直航班機加班、優惠機票措施，以及台商放投票假，此三項策略確實有效提升台商返台投票的意願。⁶

中國勢力無孔不入

除了以經濟利誘拴住台商票源外，中共藉由對台工作四大平台

2.王信賢。惡意查稅問題。大陸地區風險資訊。2006。

3.比照2008大選 跨海催票 藍搶10萬台商票。蘋果日報。2010.08.15。

4.美聯社：中國運用貿易影響台灣選舉。美國之音。2012.08.01。

5.決戰1趴 國台辦動員挺馬。自由時報。2012.01.04。

6.陳桂清。2012“大選”中大陸台商票分析。中國社會科學網。2012。

（國共論壇、海峽論壇、博鰲論壇以及紫金山會談），搭起對台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的對話管道，就是為了深厚台灣各階層民眾對中國的民族情感。國共論壇、博鰲論壇被批評為專供國民黨退休高層的取暖論壇。於2012年由地方層次提升至中央層次主辦的紫金山會談，側重兩岸企業界的交流，並逐步擴張至台灣中小企業。而海峽論壇乃特別針對台灣民間交流而設，第五屆海峽論壇於今年6月在福建舉辦，「擴大民間交流，加強兩岸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則為本屆主題，台灣與會成員諸如媽祖會、佛教會、工商會、漁農會等地方草根團體，的確與論壇宗旨相互呼應。多達73個的主辦單位中，台灣占了37個，確確實實完美呈現大雜燴式的兩岸交流。

但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調查，2008年馬政府執政至今（2013），台灣民眾認同自己為台灣人的比例不單逐年升高，甚至年年皆高於民進黨執政時期。今年6月份的民調更顯示，台灣人認同比例達57.5%，創1992年以來的新高，就連1996年的兩岸飛彈危機也沒能激起超過半數的台灣人認同。⁷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是，兩岸交流用力越深，兩岸差異卻也越顯越深？

下一站，進攻中南部

台灣中南部傳統上被認為是民進黨的大本營，中國更是希望將中國情、同胞愛散播到濁水溪以南。2011年時任海協會長的陳雲林首次跨過濁水溪來到高雄訪問，不單是一償其宿願，光是南臺灣的陽光，都可以讓陳雲林大嘆感動。但做的比較誠懇實在的，實屬國台辦常務副主任鄭立中，頻繁且低調地帶領中小企業及農產品採購考察團訪問台灣中南部地區，特參訪農場、茶園以及農漁業加工廠等；鄭更曾發下豪語說要走遍台灣319鄉鎮，⁸而鄭立中的中南部之行美其名為考察訪問，倒不如說是撒錢軍團更為貼切，所到之處皆承諾大批採購南台灣的水果、石斑魚，甚至在臺南市學甲區以保價收購方式向漁民契作虱目魚，每年保證收購360萬斤，並提供較台灣市場更優惠的收購價格。

然而，政策性收購台灣農產品、收買中南部基層選民的路子是否真如此順利？例如台南學甲虱目魚銷中國總量根本不到契作的一半，⁹因為中國人根本不愛吃虱目魚！於是儘管有政策性的一味讓利，然鄭立中的台灣農委會假面主委身分，仍不敵自由貿易競爭的壓力。去年鄭立中掛保證說未來協商

7.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2003.06）。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8.鄭立中走過台灣316鄉鎮 差3個就達陣。中國評論新聞網。

9.銷中量不到合約一半 學甲虱目魚契作膨風。自由時報。2013.01.21。

兩岸農產品開放時，大陸仍不會要求台灣開放大陸農產品進口；¹⁰但今年則改口說兩岸應相互適當開放農產品市場。¹¹天下雜誌今年三月一篇「中國蘿蔔大軍 接管台灣市場」的專題即指出，目前台灣農產品出口中國並不完全具市場競爭優勢，而僅基於中國的政策採購，然而中國低價農產品則大舉入台一如豌豆進口，導致台灣本地產量面臨腰斬；過去五年中，台灣進口中國穀物製品從4萬公噸成長三倍多達12萬公噸；大陸茶葉的進口額已達台灣茶葉總消耗量的三分之一，而目前仍有830項中國農產品尚未開放進口，表示未來台灣有更多的本土農業將受到中國農產品的低價競爭。¹²

今天國台辦買了虱目魚、買了香蕉，但能買下中南部所有的農產品嗎？抑或能買下台灣的所有產業嗎？此外，經濟讓利是否真能牽制台灣民眾的投票行為也有待觀察。比較2008及2012年總統大選南部縣市的得票率，包括台南市、嘉義、雲林、屏東及彰化各縣，2012年投票給綠營候選人的比例皆較上屆選舉高，這樣簡單的數據比較足以突顯進軍綠營票倉的農業買票政策，卻遠不如中國宣傳般的神效。

以商圍政繼續進行，上次九二共識，下次呢？

中國所有對台交流及讓利皆基於「92共識」基礎，無論臺灣做何文字遊戲上的解釋，對中國而言92共識即為一個中國原則。長期以來中國只與手持92共識旗幟的信徒對話，主張其他兩岸關係的政黨空間逐漸被壓縮。從今年三月吳習會中習近平發表四項堅持談話中，可觀察出中共對堅持92共識立場緊縮至「一中框架」。若說民進黨於2012年選舉是敗給92共識，在沒有提出92共識之外，且中國也能接受的兩岸論述，未來台灣總統大選的緊箍咒只會越來越陷越深。非選舉期間中國透過各大交流平台逐步收買人心，「人人有兩岸關係、家家有兩岸情感」的溫情攻勢必將持續進行，而台灣大選期間則嚴密監控台商返台投票大軍，搭配台灣企業家選前進行公開喊話，持續深化中國因素對台灣大選的影響力。

然而，中國面臨經濟成長減緩、房市泡沫化危機、維穩經費沉重且成效不彰、貪汙腐敗危脅執政正當性等政經社會問題夾擊，本身已是泥菩薩過江，再加上與鄰近國家衝突不斷，中共的兩岸戰略若只押寶92共識以及國民黨，透過對台經濟讓利與收買，只是場高成本的消耗戰，中國日趨嚴峻的投資環境已不是吸引台灣企業，政治契作、政治收買的代價卻越攀越高而

10.鄭立中：陸不要求台灣開放農產。中央通訊社。2012.05.25。

11.鄭立中籲台 開放陸農產品進口。世界新聞報。2013.05.25。

12.中國蘿蔔大軍 接管台灣市場。天下雜誌。2013.03.27。

不收成效。更是對國民黨執政的過度樂觀，以及錯估台灣民主機制的複雜程度。再者，中國快速崛起，並欲以和平大國自居，兩岸局勢穩定固然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標，但更關鍵的是如何與民進黨正常且平等的交往，而非傳統文攻武嚇以及利誘收買等手段，才有可能令國際社會想像「中國夢」並非是威脅惡夢一場。

接續馬總統災難式的六年執政，而接下來的兩年大概也只剩下迴光返照可以期待，面對2016大選，民進黨除了感謝對手增添信心之外，更應思考的是如何正常化其兩岸政策，說服台灣民眾過去執政8年，兩岸同樣能維持和平局勢，並著手策畫開放晶圓廠、小三通，以及兩岸包機等政策，顯示民進黨同樣有與中國對話的空間與能力。而中國要不應禱告吳敦義副總統不會成為下屆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要不則應思考目前對台政策的矛盾與成效，並實際探求與民進黨合作的可能性，才是真正為兩岸和平與發展的關鍵。■

捐款

香港對中國的不樂之捐

周雪凝
香港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2008年中國四川地震，香港一個月內籌得二十億民間捐款，其後玉樹地震亦有捐款賑災。然而當2013年四川蘆山地震香港政府決定撥款一億救災，香港民間出現反對聲音，而民衆捐款亦不及2008年踴躍。事隔五年，中國再次發生大型天災，何故香港民間反應出現變化？

中國天災頻仍，以往每逢中國天災，香港定必出錢出力、踴躍捐輸。例如2008年四川大地震，香港短短一個月內籌得20億民間捐款，一年後民間捐款更累積至130億元；其後中國玉樹地震，香港亦有捐款賑災。然而2008年四川地震過後，傳媒相繼揭發豆腐渣工程、賑災捐款濫用問題，令人懷疑善款是否用得其所。2013年初四川蘆山地震（又稱雅安地震），香港政府決定撥款一億救災。此時香港民間出現反對聲音，而民間捐款亦不及2008年踴躍。事隔五年，中國再次發生大型天災，何故香港民間反應出現變化？

自香港開放自由行後，中港矛盾日漸升溫，內地人與港人爭拗無日無之；不少港人對陸客印象均為財大氣粗、橫蠻無禮，筆者也曾親身目睹港人與陸客爭吵。另一方面，不少內地新移民來港被指搶奪資源。經過傳媒大肆渲染，一般港人均先入為主認為內地人「蝗蟲」；也對陸客來港大包小包的情

境嗤之以鼻。經過數年洗禮，中國再次天災時候港人也漸趨理性，不如以往熱心捐輸。

於2008年四川地震過後，網路經常流傳不少圖片或新聞指稱有港人捐助興建學校或樓宇被強拆、四川震後重建的政府大樓又如何宏偉昂貴；也有災民表示地震之後也未有得到適當安置。2013年初四川再次發生天災，香港政府提出撥款一億賑災，卻未有提出任何措施監管捐款運用，此事引起香港民間社會廣泛討論，由於2008年四川地震前車之鑑，不少港人呼籲停止撥款賑災。擔心善款缺乏監管後無法用得其所。

中國天災實在多不勝數，曾經有中國領導人提出「多難興邦」，以示中國於災難過後能國家興盛，形成中國特色的「災難經濟」。每次災後重建工程均成為地方政府建立政績之機會。每次中國發生大型天災，善款均會自四方八面滾滾而來，這些善款物資均任由地方政府

運用；假如地方政府立心不良，存心中飽私囊，外間則難以介入。而2008地震過後，不同地方媒體亦揭露內地豆腐渣工程問題嚴重，當時中央政府宣稱將會重建可抵禦八級強震之樓宇，可惜當2013年四川再次發生地震後，當時聲稱可抵強震的樓宇均宣告崩塌；由此可見，救災善款缺乏監管之問題。港人亦因此開始對捐款賑災、救援中國失去信心。

近年中國致力塑造經濟強國形象，意圖於國際間爭一席位；內地遊客亦為不少歐美國家帶來可觀外匯收益。對外中國企圖以巨人之姿矗立國際，對內卻出現地方政府收入不振，民間企業放貸過度、經營不善。偶而也有慈善團體特約製作廣告特輯，以呼籲捐助中國山區兒童，更出現賑災善款遭人挪用情況。以上種種均令人迷惘，為何中國如此「富強」，面對天災時卻束手無策？

縱觀以上所有，完善捐款監管制度才是有效救災出路。然而捐款並非長治久安之計，捐款只能治標，只可解決災民一時燃眉之急。每次中國天災發生，背後均會揭示人禍問題，例如四川地震的豆腐渣工程、地方政府延誤救災。當地方政府收到賑災捐款後，卻又發生災民未有妥善安置、重建工程遙遙無期，更有外間籌款捐建之建築遭到拆卸或挪用。故此當地方政府挪用

捐款之事爆發後，更易引起民怨以及使外間難以安心捐款予中國政府用以救災，實以慈善之名行貪婪之實。

總括而言，單靠捐款實在無法解決中國天災後之問題，而且中國天災之人命傷亡及經濟損失是有機會減低及避免。捐款及慈善工作只使人一時紓解困難，無法得以完全解決，我們從中國發生天災後問題可見中國內部之政經問題。沒有完善政商制度及權力均衡支持，中國人民無法得以安居樂業。而中國天災後衍生之問題亦只會沒完沒了，假如中國仍需依賴外地支援及捐款，則需讓人看見有效監管制度及妥善災後安排，否則中國的國際形象塑造得如何強大、對外經濟如何亨通，也不能解決對內矛盾。■

捐款

捐款是同理心 還是民族情感呢？

黃守達
台灣大學法律所

對於災區的認知與態度，屬文化面；那麼捐款運用則影響捐款者對於災區公權力機構的信任，則屬治理面。我們為什麼會想要捐款？又為什麼會覺得捐款會有用？這當然有其文化面與治理面的因素，但重要的或許不只是為什麼，而是怎麼辦。

埃及之於摩西的以色列，黑船之於明治維新，帝國入侵之於中國民族主義，殖民之於台灣獨立——苦難，是建構共同體想像的過程。而苦難不只來自人禍，更來自天災。隨著媒體產業與技術日漸發達也愈趨精緻，一個颱風、一場地震、一陣洪水，一襲海嘯，都讓所謂的命運共同體，似乎不只是想像而已。

在這個影像充斥的台灣社會，每當發生天災意外，我們總是被各種畫面、聲響、報導所包圍，在這種疲勞轟炸之下，到底氾濫的影像是會將苦難的感受刻劃於我們的記憶之中？還是會讓我們變得愈來愈麻木且冷漠？因為我們是人，所以當我們正視苦難眾生的面容，會感受到憐憫而悲痛。但重要的不只是感受，良知總是稍縱即逝，要有所改變，便要將感受付諸行動。

面對天災，能夠採取什麼行動？或許就像是那句老話：「有錢

出錢，有力出力。」親臨現場的，掃除障礙，搬運物資；網路在線的，彙整災情，互通消息；那些分身乏術的，至少可以募款集資。捐款，是最簡單的行動。

然而，捐款的發生，涉及諸多複雜機制。從苦難如何透過媒體再現，苦難感受如何轉譯成捐款需求，捐款者的社會經濟地位，到政府與民間社團如何有效運用捐款，這涉及良知，卻也涉及文化與治理的機能與制度。如果我們來比較台灣社會對於日本與中國的捐款數量，更可以發現箇中微妙之處。

2008年的中國汶川大地震，根據四川省人民政府於隔年公佈資料，扣除官方的20億，台灣民間總共捐助台幣50.5億，¹捐助額度僅次於香港。相較於此，2011年的日本東北大地震，台灣民間就捐助台幣70多億，捐助額度為世界第一。²誠然，救災憑藉的不單純是資金的挹注，捐助的多寡也並不與誠意成正

1.《蘋果日報》，〈川震周年台灣捐款計70億〉，2009年5月8日。

2.ETtoday，〈絕不能對台灣失禮！311震災2周年 日首邀我代表獻花〉，2013年3月12日。

比，但捐款額度的比較，仍值得深省。

可以確定的是，縱使捐款，也仍然擺脫不了權力的作用。以日本大地震為例，2011年5月，知名導演北野武主持的節目「北野武的TV擒抱」，邀請多國駐日記者到場評論震災後各國救援行動。節目後半，日本記者山際澄夫與北野武向來賓解說各國所投入的人力、物資、捐款數字，就在提及中國捐助了日幣3.7億並派遣15人救援隊伍之時，中國記者孔健突然插話，表示如果加上台灣，中國捐款就是世界第一。此語一出，現場譁然。而當山際澄夫對於日本政府花錢向十多個捐款國家登報致謝卻獨漏台灣感到不以為然時，孔健又喊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山際澄夫於是回嗆，「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³節目播出後，在台灣引發不小的風波。捐款本身是情感驅動的行為，而情感不只來自於影像的召喚，更來自於記憶與投射。國民黨政權的高壓統治，讓象徵著現代化的日本，成為台灣社會的憧憬；中國在國際政治的外交圍堵，也在台灣社會留下國際孤兒的陰影。汶川大地震與日本大地震捐款額度那20億的差距，或許就是某種隱喻。

捐款的數量是一回事，捐款

的運用卻是另一回事。根據學者林宗弘的研究，2008年中國汶川大地震，災後重建過程中民間捐款的流向，突顯了中國相關法令規範上的不完備以及執行上的不確實。甚至有民間社團受訪者表示，其募得物品「在機場運出來就被公安攔截，說所有物資全部歸紅十字會與民政部門統一管理，就把我們辛辛苦苦募來的東西運走了…結果到了災區，紅十字會又說他們能力不夠運不進去，倉庫空間也不夠，又叫我們這些社團幫忙托運」。總的來說，中國各級政府在重建過程中佔用大多數的民間捐款，而捐贈單位往往無法監督其用途。⁴相較於此，日本的制度便較為完善，捐款的運用並非由日本紅十字會等募款團體來決定，而是由第三方的「義援金分配委員會」來分配，這個義援金只能用於受災民眾，不能另外挪作他用，更不能作為活動經費。⁵2011年日本大地震的捐款為史上最高，雖然也不乏弊案，但卻無損捐款者對於捐款制度的肯定。

如果說捐款數量表現捐款者對於災區的認知與態度，屬文化面；那麼捐款運用則影響捐款者對於災區公權力機構的信任，則屬治理面。我們為什麼會想要捐款？又為什麼會覺得捐款會有用？這當然有其文化面與治理面的因素。但重

3.NOWnews，〈回嗆厚臉皮中國記者！網友用「正義新聞」感謝山際澄夫〉，2011年5月12日。

4.林宗弘，〈災後重建的政治：以中國512地震與台灣921地震為案例的分析〉；刊於《台灣社會學刊》，第50期，2012年，頁76-78。

5.橋本隆則，〈橋本隆則專款用日本沒有“郭美美”〉；刊於搜狐评论，2013年4月26日。

要的或許不只是「為什麼」，而是「怎麼辦」——我們要如何讓捐款真正成爲一種行動，而非只是購買一張讓遮掩良知逃避現實的贖罪券。捐款不等於解決問題，捐款甚至還會暴露更多問題，但這並非意味著要就此卻步。要是捐款行爲有什麼值得深省的，或許便在於此吧。

就像是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所說的：「人並非因爲受到數量龐雜的影像衝擊而變得無動於衷——若這是個適洽的形容。令感受呆滯的原因是有所感而無所行動。」■

統戰

兩岸青年交流 踏入既熟悉 又陌生的國境

施彥廷
台灣大學政治所

在交流活動中，常常有統戰意味濃厚的情境，諸如在晚宴上中國大陸的長官會強調兩岸是同胞、一家人，或是強調來中國念書或工作會有許多好處等。參觀行程也會安排歷史古蹟或紀念館，讓人感受到中國和台灣共同的文化元素，試圖喚起團員對中國的認同。然而這些統戰的行為對參加交流的學生有用嗎？

每逢寒暑假，是「兩岸青年交流團」的旺季。常常可在各大學的BBS論壇或是facebook上，見到兩岸交流團的宣傳訊息，以「了解中國文化」、「見識軟實力」等主題吸引台灣大學生赴中國大陸交流。交流團多是民間團體主辦（也有由學校主辦），再由中國大陸政府單位接待。交流時程短則5-6天，長可到8-9天以上。行程大多是參訪中國大陸的大學，進行兩岸大學生交流，以及參觀知名景點。由於可以用低廉的團費參訪中國大陸各地的景點，吸引台灣的大學生結伴參加，不少大學生寒暑假的規劃都會考慮參加這樣的兩岸交流活動。

團費低廉 行程豐富

學生交流團最吸引人的亮點，就是低廉的團費。各類型的交流團費大約在新台幣一萬五到兩萬五之間，視交流的長短和行程內容而有所不同。而這筆團費已包含來回機票、飲食、住宿、交通及景點門

票。換算下來，一個人幾乎只要負擔機票和基本的食宿費用，而且實際上中方的接待單位，往往會安排中高等級的餐廳和飯店來接待。除此之外，參觀交流的行程也相當豐富。大部分的行程前幾天會安排參訪大學以及和大學生交流互動，後半部的行程則以參觀歷史建築、博物館及商業設施等觀光景點，與一般觀光旅行團行程類似，而且甚至可以透過中方接待單位的安排，進入一般民眾較難進入的設施參觀（如人民大會堂、航天基地等）。因此對大學生而言，可以用便宜的旅費遊覽中國大陸，並且中國的大學生互動，而團員又是年紀相仿的學生，參加交流團可說是同時達成遊玩、增廣見聞和認識新朋友等目的，因而頗受青年學子的歡迎。

對台重點工作 領導設宴款待

「擴大兩岸交流」是胡錦濤上任後的對台重點工作，在胡錦

濤2007年十七大的報告中便指明「兩岸同胞要加強交往，加強經濟文化交流，繼續拓展領域，提高層次」。¹其中，對擴大台灣青年交流也是重點工作之一。台灣青年交流團赴中國的行程，多由各省台灣事務辦公室（簡稱台辦）負責規劃協調，分層交由各市台辦處理接待；或由中方主辦的團體或學校請台辦系統支援。台辦系統有一套既定的作業流程，大多會先安排青年交流團先與某個特定的大學進行座談，讓台灣大學生和中國大陸學生有初步的認識。接著晚上則由台辦領導出面在高級餐廳設宴款待，席間在酒酣耳熱中，讓台灣學生和中國大陸學生有更多聊天認識的機會，培養感情。有些交流團甚至會安排兩岸大學生表演才藝來炒熱氣氛。

青年交流與統戰行爲

在一整天的座談及晚宴之後，這群年紀相近的兩岸大學生通常已培養有一定的情感，成為朋友。而有些交流團還會安排中國學生陪同台灣學生一起遊覽各個觀光景點，讓雙方的情誼有更深入的發展，因而到了交流結束學生要返台的時候，常發生兩岸學生離情依依並相擁而泣的溫馨景象。事實上，對於台灣學生來說，並非完全不知悉中國大陸背後的政治目的，許多學生私底下也會戲稱交流團為「統戰團」，把赴中國大陸交流的行程戲

稱為「去給別人統戰」，足見學生們對於中國大陸以「交流」之名來進行「統戰」的政治目的有一定的理解。然而，即便知道可能有「統戰」的成份，但是對於許多學生來說，參加交流團仍然是個增廣見聞和認識朋友的好機會。根據參加過交流團的大學生透露，在交流活動中，常常有統戰意味濃厚的情境，諸如在晚宴上中國大陸的長官會強調兩岸是「同胞」、「一家人」，或是強調來中國讀書或工作會有許多好處等。而參觀行程也會安排歷史古蹟或紀念館，讓人感受到中國和台灣共通的文化元素，試圖喚起團員對中國的認同。

然而，這些「統戰」的行為對參加交流的學生有用嗎？就讀台北大學，曾參加過多次交流團的陳同學覺得對他沒有用，他能很明白對方正在進行統戰，但是對他來說，和中國學生培養的感情是真實的，和中國學生有許多共同的話題可以聊，即便交流結束，仍然會繼續聯絡。但陳同學也提到「有些人還是會真的相信統戰那一套，對某些人這還是有用的」。而台灣大學的鄭同學也認為，即使知道這是統戰工作的一環，但是仍覺得有機會去實地了解中國相當重要，「畢竟我們的未來將會深受中國的影響」。

年輕世代的認同觀

從調查資料中可以發現，當被

1.胡錦濤，2007，〈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大報告內容〉，新華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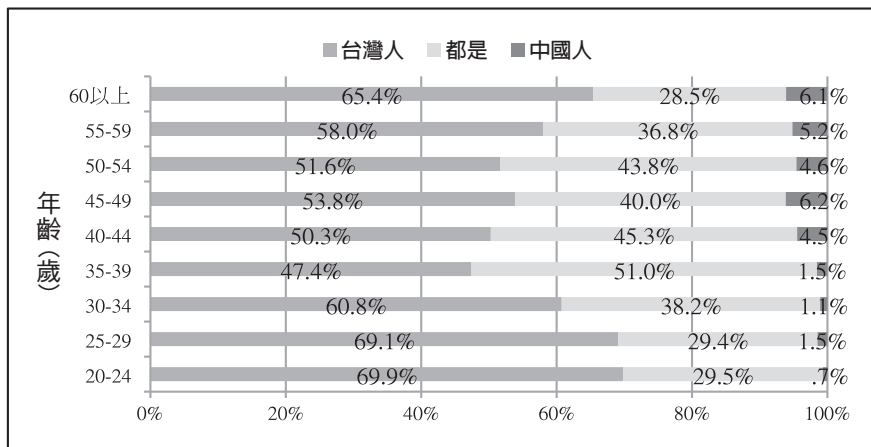
問到「你是台灣人？中國人？還是都是？」的時候，越年輕的世代越傾向回答自己是「台灣人」，可見的年輕人的台灣認同相當的強（見表一）。然而，參加過兩岸交流團的大學生，是否會改變自身的國家認同呢？根據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耿曙的研究，參加過兩岸交流的台灣學生明顯會對中國大陸的印象有所改觀，但是印象變好並不會上升到政治立場和國家認同的改變。²

義守大學王嘉洲副教授的研究也指出類似的現象。³由此可見，參加過兩岸交流團的台灣學生，對於兩岸的統獨問題和國家認同，並沒有因此而改變立場。雖然在政治立場上並沒有改變，但是參與過兩岸交流後，對於中國大陸有更進一步

的認識，並且也對中國大陸的印象改觀。「中國感覺起來跟之前想像得不太一樣」參加過交流的張同學這麼說，「在台灣會聽到很多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有好的有壞的，但親自去了之後覺得沒有以前想的那麼恐怖」。

在交流的過程中，也可見到台灣學生面對中國學生暢談台灣民主自由的可貴，以及台灣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這些發言常往會引起部分中國學生的不快或出言反駁，而台灣學生有時也會因中國學生所發出的保守言論而嘖嘖稱奇。在言談之間，往往可以更讓台灣學生體會到生於一個自由社會的可貴。即便見到了氣派宏偉的建築，華麗壯闊的河山，但是在人與人的

表一、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12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

2.耿曙，2010，〈中共邀訪台灣青年政策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49(3)。

3.王嘉洲，2012，〈赴陸交流對臺灣學生統一意願之影響〉，《社會科學論叢》，6(2)。

互動之間，在涉及公共性和公民意識的環節裡，很容易就能理解到：民主，並不只是政治體制，同時也是公民素養的一部分。

媒體的轉譯，親身體會到台灣與中國的差異。未來，這段前往中國交流的經驗，想必會在心中發酵，影響未來面對兩岸議題的抉擇。■

中國經驗將帶往哪裡？

中國交流的經驗，並沒有影響到青年學生的國家認同，那到底影響了什麼？1987年之後出生的世代，成長的過程伴隨著台灣的民主深化。在國小的時候歷經第一次政黨輪替，在中學的時候歷經「去中國化」及「本土化」的思潮衝擊，遠離了「大中國思想」，自我認同偏向「台灣人」。然而，「中國」的威脅／善意在大學的階段浮現出來，中國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影響與日俱增，對於正在求學的大學生來說，很難忽視中國在科技、經濟及學術上的快速增長。這個國家令人既熟悉又陌生，從小出現在課本之中，你也許背得出中國各省的省會和特產，但卻從未能踏上這個國家一步。而兩岸交流，正好給了這群年輕人一個接觸現代中國的機會。因此，兩岸交流的背後雖然暗藏統戰的意圖，但是對台灣學生來說，提供了一個離開課本，真正接觸中國的機會。

中國經驗必然帶給了台灣學生一個特別的經驗，或許使學生更嚮往中國，也或許更排斥中國，但無疑增加了青年學生對於中國的認識，讓他們得以越過教科書和新聞

統戰

更加「瞭解」祖國的 學生參訪團

胖胖
左翼廿一成員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自零三年，香港社會慢慢走上政治化之路，不同的團體組織發動了一浪接一浪的社會抗爭，當中那些易於動員的口號式立場，如反洗腦、救救孩子以及不切就罷，為在地的抗爭做出相當示範。但我們有否追問過，洗腦是所謂何事呢？

自2003年，香港社會慢慢走上政治化之路，不同的團體組織發動了一浪接一浪的社會抗爭。要數最令人注目的，相信必然是最近的「反國民教育」運動，當中那些易於動員的口號式立場，如「反洗腦」、「救救孩子」、以及「不切就罷（課）」，為在地的抗爭作出了相當的示範。但我們有否追問過，「洗腦」是所謂何事呢？

若然我們將「洗腦」置於「反國民教育」運動下重新解讀的話，那麼我們將得到另一種理解：

- * 洗腦作為一個過程，參與者將被刻意重新灌輸一套思想。
- * 操縱整個過程的人既神秘、且無處不在（正是所謂的地下組織）。
- * 唯一的線索就是，這些邪惡的力量都是與中共帶有關係，目的就是要控制我們，無論在思想，或是政治經濟上。

若這些對於「洗腦」的理解是

成立的話，那麼有關（與中共有關的）「洗腦」活動又豈止於中、小學層面的國民教育呢！事實上，類似「洗腦」的活動源於更早時期，從大專教育的國情遊學團、到現在的國情學習班、甚至是形形色式的參觀旅遊團，亦有異曲同工之妙。有人會標籤這些參訪團為「洗腦團」，意謂只要同學參加了這些交流團的話，便會變成「盲目愛國、相信中共」的人。但整個過程又豈能以「洗腦」兩字說得清呢。

因緣際會，筆者參與過左派機構所舉辦的交流團籌備工作，因此能與讀者分享那些「組織內」的經驗和所見所聞，一方面提高大家對「參訪團」的認知，同時為所謂的「洗腦」補上經驗的空白。

既是文化學習，亦是政治吸納

誠如黃偉國（2009：260）¹所言，遊學團（或參訪團）本來

1. 黃偉國，（2009），《文化學習，還是政治工具？國情遊學隊的前世今生》，載於《本土論述 2009 — 香港的市民抗爭與殖民地秩序》，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及新力量網絡（編），台北：漫遊者文化出版。

就是一種文化學習，目的是要打破人們從媒體中所獲得的、對某個地方的刻板形象，有時候甚至希望受眾對所見所想作出「貼近現實」的調整。當然，作為參加者（特別是基層學生）很少會衝著學習的名義參加遊學團，大多數都希望透過廉價的遊學團到訪國內，一方面認識新朋友，另一方面又可以吃喝玩樂。或許，這些都是參加者的自我期許，舉辦單位主要的目標是「替機構尋找新的同伴」，尋找有潛力的接班人，好好的培訓，記得有一次某位機構內的高層就向我坦言：「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舉辦這個交流團？…目標當然不是教育，而是「搵新血」…」，當然，整個過程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它包括一年的觀察，從你長處、表現、甚至是（機構／政治）忠誠度都成為會否被吸納的條件。

打破「鄉土落後」作為一種手段

為了達到目的（吸納和觀察），參訪團每每安排一些看似不具爭議的地點，例如京劇中心、九一八事變紀念館、甚至是天安門廣場。從近代國內社會發展的光輝面，讓參加者明白「內地變得繁榮和先進」，以打破人們對於內地帶

有的「鄉土、落後」的想像，再又讓同學感受到「作為中國人的使命感」，例如行程之中會加上不少能夠凸顯過往中國「被列強瓜分、受盡屈辱、但仍然能夠突圍而出、大國崛起」的歷史，藉以讓參加者感到自豪。

透過對比過往的「戰敗、屈辱、落後」以及現在的「崛起、民族復興、國際化」的經驗，讓參加者重新認識「繁榮中國」，繼而將自身扣連到整個地方的發展歷程當中，培養對國家的歸屬感。²藉著讓參加者將他所見所聞，例如到處林立的百貨公司、國際名店、以至其他繁華鬧市的景象，當作成經濟發展的指標，鋪陳出一套「國家崛起，面向國際」的意識形態。當然，機構亦會舉辦交流會，並把題目設定成「中國崛起：兩岸大學生的機遇與發展」，讓學生演練一次，利用符合效益的工具性思維，向別人（同時亦是為自己）解釋中國崛起與自身的關係與好處，繼而合理化整個政權的存在。³

回想當年，筆者第一次隨該左派機構到內地時，就是到北京的商業大街，那時候站在市中心，四處名店，感覺與小時候回鄉探親所看到的「落後」，有著天壤之別。畢竟，眼見未必為實，這些「所見

2.當然，這種認知是有偏見的，它仍仍注重於中國於經濟改革的成果，而忽略其他範疇的改革。

3.記得一次某黨員就跟參加者說，「共產黨有六分對，四分錯，縱使殺人不對，也不要忘記共產黨所帶來的繁榮…」，明瞭的人心裡就不禁大笑，但真心相信的人卻很可能認同這番言論，繼而向外傳播出去。

所聞」會再透過小組討論進行深化，讓參加者漸漸了解所謂「改革開放」與「中國崛起」的因果關係（當然，這種因果關係是簡化、粗糙的）。縱使，討論的過程是片面、容納不下另一種闡釋，亦避開富爭議性的議題，例如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三農問題」、「不斷惡化的貧富差距」、甚至是「貪污腐敗」，對於缺乏認知的參加者來說，這些解釋看似是指路明燈。

讓沒趣的人離開，把有心的人留下

在整個參訪團裡，左派機構為參加者準備不少能增強國家認同感的材料，⁴有時候又會讓參加者純粹的享受著整個交流團的氣氛，藉以避免參加者懷疑所看到的表象。當然，若果討論當中有持相反意義的時候，帶領討論的人會選擇忽略那些意見，並任由反抗的人沒趣地離開。篩選後的，若非完全相信上述的意識形態，很可能亦是已洞悉到參加這些機構背後的「發展機遇」，從而選擇留下來幫助這些左派機構。這些成員，或許會被挑選成為下一個交流團的籌備成員、或義工。然而挑選的準則便看該參加者的投入程度，若屬於活躍份子的話，機構更會主動聯絡該成員，邀請他們參加已舉辦的活動。此外，他們更會提供一系列的「課程」，推薦一些課外讀物（例如由港澳

辦前主任強世功所寫的《中國香港》）給新成員，讓他們好從國家／當權者的視角，漸漸加強／調整既定的意識形態及對國家的認知。

當然，吸納的過程有其知性的一面，亦有其物質的基礎。除了讓你閒時，代表該機構會見政府官員之外，有時候還會以兼職的身分留在機構之內，好讓你盡心盡力幫助機構發展，對外吸納更多的青年朋友。但哪種青年是左派機構最為看重，非要吸納不可的呢？

據我的工作經驗來看，左派機構最常招攬的是就讀於「愛國學校」的同學，另外亦多挑選一些能夠吸引新生、有創意、甚至是唯命是從的同學，這樣就能讓組織自行運作起來，而其他舊有成員則可以再擴展去其他地方工作。這樣便能造成「薪火相傳、一代傳一代」的效果。當然，舊的成員仍然會加強對內的聯繫，有些更轉戰到教育界，漸漸形成另一股的勢力，一方面強調國家發展的論述（所謂發展就是硬道理）而招兵買馬，另一方面又繼續推薦學生參加遊學團，以增廣見聞為名，吸納為實。

總結

總的來說，這種另類的國民教育實踐，表面上以學習為名的參訪團，其實是一種政治宣傳和吸納。它不會強迫你接受官方的論述，亦不一定要你擁護國內的執政黨，卻

4.包括與註北京港澳辦單位、甚至是與屬商界的黨員會面，藉以「解釋」到底有多「先進」。

但願你閉上嘴巴，功利地成為所謂的「政治中立派」，繼續在機構圖利。整個過程，只要你不跟他們對抗，接受現實就已經足夠。它依靠的是一種漏洞百出的常識，例如「經濟增長必定帶來幸福」、「發展就是硬道理」、「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經濟增長」，所組合成的意識形態，再扣連到國家的官方論述之中（當然，箇中的過程必然是更加複雜，這裡我只能進行簡單的描繪），進而堆砌並鑲嵌於「愛國愛黨」的論述之中，培養那拙劣、不加批判的愛國主義，好讓參加者接受那官僚專政背後的黨國混合體制（party-state system）。然而，所謂的「玄機」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後話

回過頭來，這些用以堆砌成「愛國愛黨」的元素，原來就是我們一直理解自身「香港經驗」不可或缺的部分，所謂的「洗腦」其實一直都存在，它早已潛伏於教育制度之中，並於各種活動之中被利用。這樣看，國民教育都只是一個爆發點。真正要「反洗腦」倒是要從根本造起。

筆者於該次籌辦參訪團之後，便離開了該機構，現在回想過來

確實是獲益不少。若非有這段經歷之中看清楚昨天左派已經跟社會主義、甚至是溫和左翼政黨的綱領背道而馳的話，相信筆者會跟主流社會一樣，把老左派（例如工聯會、民建聯）歸邊，順勢將共產主義的「平等」與「自由」、「民主」這些價值與對立起來，（縱使認為資源應該被再分配，也會）拒絕承認自身那微乎其微的左翼傾向，還間接地承襲殖民地時代所遺留的「中國共產主義／香港資本主義」二元對立的框架，阻礙思想上的解殖。除此之外，這種二元框架更會衍生另一種更複雜的關係：縱使立場帶有左翼色彩的青年（原因可以是反對社會資源不公義、甚至是反專制也好），亦會怕被標籤成「與中共有關」而拒絕承認該政治傾向。當右翼新自由主義（或稱新保守主義）未能為他／她們指引一個可行的出路之時（領匯私有化⁵已經為我們証實盲目地相信「自由市場」的惡果），新一代的左翼青年卻因這種殖民邏輯而陷於失語的狀態，既無法處理談階級的議題，亦將資本主義結構所衍生社會矛盾轉移到去意識形態的議題之上（例如中港矛盾），更可能促使法西斯主義從全面政治化的社會之中死灰復燃。

5.2004年，香港政府於經歷經濟衰退時，為解決停建居屋所帶來的財政困難，房委會將公共屋的商場（包括街市）及停車場出售於私營的房地產信託公司，後來將商場命名為領匯。往後，領匯為求賺取最大的利潤，不斷增加租金，迫使不少陪伴當地居民成長的小商戶結業。租金增加，亦引致物價上升，直接影響每區的基層市民，使他們無法買到廉價的日常生活用品與食物，間接造成及擴大貧富差距，詳情參見：<http://www.inmediahk.net/thelink>。

這些議題都是鼓吹「回到左翼」的人必須要處理的，然而這篇文章卻只能拋磚引玉，卻未能為整個思潮開出一個良好的「藥方」。



房價

貨幣寬鬆—投資客與高房價

Sean Huang
財經雜誌撰稿人

許多人認為投資客投資房地產是因為現今很多，因此才玩得起房地產，但其實這個概念並不完全正確。如果考慮到房地產成本高昂、流動性差等特性，不論有再怎樣多的現金，房地產都不是一個好標的。投資客的資金之所以湧入房地產，最主要是因為房貸所帶來的財務槓桿效應。

近年來台灣房價高漲，引發龐大民怨。從房價的三大要素：供給面、需求面與資金面看起來，其實供給與需求都沒有太大改變。從供給面看來，2007年之後新成屋不斷增加，以建案數而言到今年是為高點；從需求面看來，台灣人口成長雖然趨緩，但由於青壯年更往台北市集中，反而推動市區的需求。但從供需看來並無法解釋為什麼房價飆漲如此之快，因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資金面。美國推行貨幣寬鬆政策後，便宜資金四處流竄，投資客的資金大舉湧入房市與股市；然而台灣股市這幾年來並未像歐美股市一度創下歷史新高，反而是湧向房市，使房地產價格居於歷史新高。

許多人認為投資客投資房地產是因為現金很多，因此才玩得起房地產，但其實這個概念並不完全正確。如果考慮到房地產成本高昂、流動性差等特性，不論有再怎樣多的現金，房地產都不是一個好標的。投資客的資金之所以湧入房地產，最主要是因為房貸所帶來的財

務槓桿效應。

槓桿效益與投資意願

以下用一個例子來說明房貸如何產生槓桿效應。假設一間台北市內的小套房目前市值1000萬，在貸款成數8成還款年限20年（從支付本金開始）的情況下，投資客只要用200萬現金就可以買1000萬的房子，剩下800萬就是有利息的房貸。而房貸的支付方式通常並非一開始就是連本帶利還錢，而是一定年數內（通常為兩年）只需支付利息，過了該限定年數後才需要支付本金。假設前兩年只需要支付利息、貸款利息為2%，800萬的年息為16萬，意味著前兩年每個月只需要付大約1.3萬台幣的利息。另外台灣住家用房屋稅極低為1.2%，1000萬的房子也只需要付12萬。

換言之，對於投資客而言，只需要準備250萬左右的現金，就可以玩得起成交價1000萬的房地產投資；假設房價漲25%到1250萬，投

資客脫手時並不是賺25%，而是賺100%。這就是槓桿效果的威力，將原本25%漲幅變成100%的獲利，也才是投資客願意冒著高度流動性風險投入的原因。流動性對投資客而言至關重要。萬一得開始支付本金，那麼每月還款就會從1.3萬增加到4.1萬，大幅提升了投資客的持有成本；此外，要是房子在賣出去之前就開始大幅跌價，那麼不僅房子難賣，同時虧損也將以槓桿倍數擴張。

透過以上例子可以知道，形成財務槓桿的主因有四：1.房貸利率，利率越低越有利於投資；2.房貸成數，成數越高越有利於投資；3.本金還款年限，年限越長越有利於投資；4.房屋稅，稅率越低越有利於投資。在資金寬鬆的情況下，銀行手頭有大量便宜資金，因此就會願意用更好的條件吸引各種借款，例如中小企業貸款或者房貸。其中政府能完全控制的是稅率，其他三者只能設立部分規範，否則也會破壞市場秩序。

政府該如何抑制投資客炒房？

台灣的房屋稅率與外國相比大約僅為一半，這樣的低稅率我相信與過去政府不想擾民有關。台灣自有住宅率一向很高，政府為了讓大家安居樂業所以不採取高稅率，我認為是個良善的動機。然而，經

濟學揭櫫的最殘酷的概念之一，就是良善的動機往往帶來不良善的後果。持有成本（房屋稅）低廉雖然一方面減少居住成本，也有助於壓抑租屋價格（這有助於降低CPI膨脹），但在某些條件成立之下，卻可能促使人民屯屋炒地皮——例如貧富差距拉大、資金寬鬆，也就是台灣這幾年的情況。從最根本的角度看來，提升房屋稅才是徹底解決真正的有錢人願意多買兩棟、三棟房子屯屋意願的手段；但提高房屋稅也會拉高租屋價格並且帶動通膨成長，目前政府應該無力為之。

奢侈稅雖能彌補房屋稅過低的缺憾，但台灣的奢侈稅太過強調針對兩年內短進短出的投資客，忽略了重複持有房屋的有錢人，等於是罰短不罰長。台灣持有三棟房屋以上的人有66萬人，如果釋出這些房子，房市的供需就能回到更平衡的水位。如果政府真要修改奢侈稅，我認為可以直接房屋稅改成階段課稅，一戶持有一間房子仍可維持1.5%的低稅率，但第二戶以上則直接課以5%~10%的重稅，如此才能真正解決重複持有房屋的問題——房屋是用來住的物質，不是用來囤積炒作的物質。

房貸利率、房貸成數與本金還款年限這三者是否應該由政府管控是個相當麻煩的問題。對於銀行與消費者來說這三者是一個套裝（package），某一項目對一方有利

就會拉高另一方的風險，因此三者一定會維持在平衡狀態。假設政府控制了一者，其他兩者就會調整；控制兩者，剩下的一者就會調整；但如果政府控制全部，又會綁死房貸影響一般買房者權益。我認為比較可能採行的方式，可能是同時針對持有第二棟房者進行管控，例如買第二棟房以上者或者過去三年內房地產交易頻繁者，房貸成數限制最高3成、不得採取平均以下之利率、同時不得享有本金還款年限。

景氣回升、貨幣緊縮與升息會如何影響房地產投資

這幾年全球受到美國貨幣寬鬆政策影響，資金四處流竄，導致利率大幅降低。台灣房貸利率最低不僅達到2%以下，支付本金的年限為兩年到五年也相當寬鬆，而房貸成數最高甚至達到八成五。最近半年以來，房貸利率開始回升到2%以上，銀行對貸款成數的要求也變得嚴格，顯示銀行已經開始進入升息循環的階段，預估對房地產的抑制效果將會越來越明顯。換言之，即使政府不出手調整房屋稅與房貸利率，支持投資客對房地產興趣的主要因素也將反轉。

從銀行角度來看，目前台灣全體銀行的總放款額約為20兆，其中約9兆用以購置不動產，再其中又有5.5兆為消費者房貸，佔總放款將近3成。消費者房貸佔了消費者貸款約

8成。從房貸餘額和比例來看，目前已經處在歷史最高點。以台灣GDP約為14兆看來，房貸加上房屋修繕貸款金額約為5.8兆已經超過4成，也是歷史新高；如果再加上土建融資，所有跟房地產相關的貸款金額則約7.2兆，超越GDP的5成。換句話說，消費者房地產相關貸款已經佔了台灣年度總產值的一半。這個水位對銀行以及整個台灣社會而言都非常高，相對地更壓抑了民間其他投資與消費。因此，銀行未來持續推升房貸的比例想必不會很高，順著升息便反手壓抑房貸比率的可能性很大。其次，全球景氣開始真正復甦將會強化民間投資意願，這會促使銀行拉高企業放款的比例。總而言之，資金面未來將逐漸不利於房地產投資，這相當可能是房地產反轉的訊息。

整體而言，房地產價格除了受到資金面影響之外，供給面與需求面的影響力也相當重要。但台灣近十年來人口沒有快速成長、戶數沒有快速攀升的情況下，最近五年這一波房地產多頭，顯然為資金面推動所致。政府基於平穩房價、避免泡沫化的前提之下，還是應該透過政策加強壓抑房地產價格，這在日後看來，才會是德政一樁。許多看似良善動機的政策不一定會帶來良善結果，但是完全不作為任憑市場波動，未來要收拾的殘局可能更加狼狽。■

在香港生活一段長時間，必然會對一詞語耳熟能詳：上車，他是指首次置業，個人或家庭由非業主變成業主的過程。上車幾乎是香港人理想生活的標竿，因為這意味著有資格參與物業升值的遊戲。對業主來說，樓價當然越高越好，最好只升不跌，這樣代表著他們出售住宅物業時，可得到豐厚的投資回報，以彌補職業收入的不足。

何謂地產霸權？

在香港，市民通常用「地產霸權」一語批評地產商：（一）全面壟斷市民的日常生活，因為香港四大地產商（長實、新鴻基、恆基、新世界）以龐大資本控制各行各業，包括公共事業（能源及運輸）、進出口、零售、通訊及資訊科技、金融以至傳媒，普羅大眾的衣食住行幾乎都不可能擺脫地產商的統治。（二）誤導消費者，近年地產商為了賺取更高利潤，不惜以失實資料和陳述誤導買家，買家購入樓宇單位後，才發現真實單位狀況與售樓宣傳文字所述並不符實。在香港是可以出現「平台是地面、五樓即二樓」及「窗台當作睡床」的荒謬現象。

不過，上述兩種對「地產霸權」的批評，尚未觸及關鍵之處：就是大型地產商對地產業務本身的壟斷。即是說，在香港，除政府外，對只有少數大型私人地產商可

以購入土地、興建房屋及攫取高額利潤這一事實本身，質疑的聲音卻不多。大多香港人是會抱怨樓價高、供款時間長、政府官員與地產商勾結等，但未必會進一步提出「誰在抬高樓價/租金？」、「什麼的政策和制度容許高樓價/租金現象？」、「香港還應該以地產業為主導嗎？」等問題。即使有人提出這些問題，但迴響會很有限。

其中一個原因，是不少中高收入人士，都有一個「置業夢」 - 是指透過將個人或家庭收入投資在住宅物業上，成為業主，待其升值後出售以取得利潤，然後資金繼續投放於住宅市場上，博取更高利潤。在香港生活一段長時間，必然會對一詞語耳熟能詳：「上車」，它是指首次置業，個人或家庭由非業主變成業主的過程。「上車」幾乎是香港人理想人生的標竿，因為這意味著有資格參與物業升值的遊戲。對業主來說，樓價當然愈高愈好，

最好只升不跌，這樣代表著他們出售住宅物業時，可得到豐厚的投資回報，以彌補職業收入的不足。

現時香港約有六成家庭住戶居於自置物業中。對業主或想成為業主的人來說，「地產霸權」也是一種誘惑，一種覺得自己可以透過投資物業，終有一天致富而晉身上流社會的誘惑。香港政府在1987年及1998年的兩份《長遠房屋策略》中，指明鼓勵市民自置居所，是其房屋政策的目標，政府是擔當著大力推動置業夢的角色。2013年9月，政府會為新一份《長遠房屋策略》作公眾諮詢，我們可預期，為保證私人樓市繼續蓬勃發展、為銀行業營造更多住宅物業貸款機會，從而鞏固地產商和金融界利益，政府一定會提出鼓勵市民自置居所的措施和方案。

由此可見，除大型地產商外，香港政府、金融界和不少來自業主階層的市民，是維持和壯大「地產霸權」的共謀者。

房屋不平等

香港這種以房地產為經濟支柱的社會結構，必然導致嚴重的不平等和階級矛盾。較明顯是業主和租客的對立。在香港，由於缺乏法制保障，租客議價能力甚低，業主幾乎可自由操縱租金價格，因此，私人住宅的租金也隨樓價飆升。租客的唯一出路，就是搬去面積

較小、地點較偏遠或生活條件較差的單位，基層租客為求減輕租金負擔，不惜犧牲生活質素。於是，香港出現了舉世知名的「劏房」，即是部份無良業主為求大幅增加租金收入，將一個本來只供一戶居住的大單位，「劏」（切割）成數間甚至十數間小單位出租，部份單位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少於十平方米，缺乏基礎設備，衛生環境惡劣，但租客在別無選擇下，仍不得不居住。而這些業主（通常是私人公司／法人）卻肚滿腸肥。

居於私人住宅單位的租客，其租金支出吞嚥了他們的四分之一月入，部份更高達三分之一，香港，名符其實「寸土尺金」之地。當一個人／家庭要承受如此龐大的租金負擔時，通常會減少食物開支來應對（節衣縮食），長遠來說，對家庭成員的健康會造成負面影響（尤其小童會營養不足）。

即使能僥倖「上車」成為業主的市民，其實生活也未必好過。因為他們跟租客一樣，每月乖乖奉獻四分之一（或以上）收入供款予地產商（大地主），通常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償清樓債。三十年節衣縮食的生涯，你能想像嗎？這樣不就是做了地產商的奴隸嗎？因此，一些人會形容這種狀態為「樓奴」。

青年拒當樓奴

在2001年至2011年之間，香港青年（15至24歲）的每月收入中位數只是上升不足百分之七（由港元7500升至8000），而同期私人住宅平均售價卻升了兩至三倍（視乎單位大小和地點而定），「置業夢」已不切實際。近年，有年輕人開始組織起來，成立「青年拒當樓奴運動」，聲言拒絕做地產商的奴隸，主張政府應承擔為基層市民興建可負擔住屋的責任。該組織在2013年8月公佈問卷調查結果，發現九成受訪青年表示現時無力置業，打算五年內置業的青年亦僅得三成，逾九成青年贊同政府增加興建公共房屋，¹顯示香港年輕人漸漸意識到，政府應擔當積極介入的角色，透過大量興建廉價租金的公共房屋，減輕「地產霸權」對市民大眾之禍害。然而，這場向地產商發動的不合作運動能否取得成功，關鍵在於市民（特別是青年）是否願意完全擺脫「置業致富」的物質誘惑。在「投資物業 = 升值」意識根深柢固的香港，解除誘惑之路非常艱難和漫長。■

1.《新聞稿：青年拒當樓奴運動住屋需要調查結果公佈》，2013年8月24日。

港大罷免赤化會長，臺灣 學生自治何須畏懼？

顏子傑
臺灣大學政治所

近兩年開放中國學生來台之後，各大專院校的陸生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從北到南紛紛成立，部分學生營隊亦可見中國學生蹤影。台灣校園是否會重演香港大學陳一諤事件？

2009年香港時事評論員黃世澤於《自由時報》專欄發表「香港人看陸生來臺」¹一文，認為承認中國學歷、讓陸生來臺是國安問題，讓陸生來臺等同臺灣向中國投降。他更舉出香港大學學生會長陳一諤公開否認六四事件，且疑似受到中國駐香港聯絡辦公室資助。在其不當言論公開發表後，儘管港大研究生陳巧文等人成功發起罷免會長，避免港大學生組織「赤化」；²但是，港大學生會《學苑》刊物在選舉期間，影射陳與親中組織密切聯繫，網絡上也流傳陳「內地學生關係好、支持多」。罷免投票結果，仍有九百多張選票支持陳，黃世澤認為這是來自受到中聯辦指揮、黨性剛強的職業學生所為。黃世澤在香港《蘋果日報》發表的評論³中也分析，中國目前正在香港各大專院校企圖滲透學生組織，建立一個以中國留學生為主體、企圖統戰香港學生的赤化網絡，不可不防。

前述香港學生自治遭中國共產黨入侵經驗，確實值得我國借鏡。由於兩岸本質仍具有敵對關係，陸生來臺與其他國家學生來臺就學相較，在國安議題上有其特殊性。而中國共產黨是否透過嚴密的涉台組織，安排中共青年團陸生，監控自由派陸生言論，甚至指使陸生滲透臺灣學生組織、參與各政黨寒暑假營隊和情報蒐集，都埋下嚴重的國安隱憂。近兩年開放陸生來臺之後，各大專院校的陸生組織（如陸生聯誼會、大陸同學會、陸友會）如雨後春筍般、從北到南紛紛成立，部分學生營隊亦可見陸生蹤影。臺灣校園是否會重演港大陳一諤事件？

根據教育部最新陸生統計資料顯示，100學年度共招收928位（含博士班23位、碩士班181位、學士班724位），101學年度增加為1,864位（含博士班48位、碩士班439位、學士班1,377位）。102學年度將試辦招收大陸專科畢業生來臺就讀二

1.黃世澤，「香港人看陸生來臺」，自由評論，自由時報，2009年5月6日。

2.本報訊，「會長選舉結果惹赤化疑慮，隱形左派掌港大學生會」，要聞港聞，香港蘋果日報，2009年2月8日。

3.黃世澤，「陳一諤被罷免的意義和隱憂」，論壇，香港蘋果日報，2009年4月27日。

年制學士班，逐步擴大招收來源。除了正規「學位生」之外，短期來臺的「研修生、交換生、雙聯學位生」人數逐年上升，對照「學位生」的入學標準，後者明顯寬鬆許多，不須考試、未有人數限制、也未訂定審查統一標準。以100學年度為例，共吸引11,097位研修生；101學年度上學期也已有6,544位來臺交流。⁴透過這種寬鬆條件來臺學習的「研修生」，素質參差不齊、背景複雜。在大專院校內，若再加上學位生的人數，已逐漸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潛在勢力。

以具有指標性的臺灣大學為例，學生會和研究生協會的選舉辦法中，並未對在校陸籍「學位生」和「研修生」進行任何限制，也因此陸生得以參與投票、競選。陸生的「學位生」結合這些透過非正式管道入學、人數眾多的「研修生」，在具備學籍的情形下，享有選舉權，若中國共產黨藉此對臺大學生自治選舉進行滲透，將沛然莫之能禦。在兩岸仍存在有主權爭議的核心問題時，這些陸生的政治行為、社團活動想當然耳也格外引人

注意。在臺陸生會成員凝聚力高，十分團結。幹部也不諱言表示，若能匯集一個群體的想法，就可以對外提出訴求。⁵以陸生高度的團結性，未來臺灣學生自治組織活動，絕對有機會受到陸生團體或受陸生團體支持的對象所影響。

近兩年臺大研究生協會選舉過程中，便已陸續出現陸生動員的影子。政研所學生林飛帆在第44屆研協會長選舉前，曾經代表研協參加「大陸同學會」設立校級審議工作。林在會議上發言提到，「大陸？哪一個大陸？是美洲大陸，還是非洲大陸？」因而引發陸生代表的不滿。在教育部「三限六不」⁶的政策限制之下，林因提出助學金薪資化政見，陸生將無法擔任系所研究、教學助理並領取薪資。

因此，陸生會串聯反對他擔任研究生協會會長。即便林最後獲得319票順利當選，仍罕見的有高達93張反對票（該學年校內陸生共177人）。⁷在第45屆研協會長選舉中，為陸生爭取研究津貼及權益也成為兩位候選人攻防的重點之一。時任臺大陸生會會長、國發所博士生王

4.100學年度，專科生1,135人、學士班8,680人、碩士班1,124人、博士班158人。101學年度，專科生622人、學士班5,167人、碩士班688人、博士班67人。其中，又以商學、工學及文學為主。研修不在「三限六不」的政策規範中，因此研修生得以選擇中、西醫學或涉及國安涉密及相關高科技領域的科系選讀。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5.黃甦俞，「陸生會起步，對內照料對外發聲」，旺報，2013年2月1日。

6.教育部針對陸生來臺就學所設下的「三限六不」（限校、限量及限域，不加分、不影響招生名額、不提供獎助學金、不允許打工或兼職、不可考照、不可續留臺灣就業），及不納入健保成為最主要的陸生政策指導原則。教育部將於102學年度起逐步鬆綁。

7.根據臺灣大學來臺的陸生統計表，100學年度碩士班註冊43人、博士班9人、研修生上、下學期合計125人。101學年度碩士班72人、博士班6人、上學期研修生也達95人之多。

欽在臉書(Facebook)上公開支持特定候選人，呼籲陸生踴躍投票。陸生會幹部並帶著特定候選人於宿舍、研究室對陸生進行拉票。選舉期間，還曾因王欽在新聞上的頻繁曝光及其知名度，一度被誤傳將投入參選，甚至許多臺籍網友紛紛留言支持力拱，最後還公開發表聲明闢謠，顯見陸生會幹部在校園內儼然成為風雲人物。最終的投票結果，並未由陸生團體支持的候選人勝出。

在臺大校園討論區批踢踢實業坊《臺大板》(NTU)，也曾經討論親中報系《旺報》專題報導「在臺灣，陸生可否競選學生會主席？」，⁸提出陸生在臺大參選學生會會長的風向球。在回應中，網友提到「是不是陸生無關，假使夠優秀還是能吸引學生支持」、「陸生不就是外籍生」、「有什麼好吵，外國朋友來念書就是外籍生」，學生們似乎不在乎會長是否由非臺籍學生出任。2012年旺中集團總裁蔡衍明公開否認六四天安門事件，並扭曲大屠殺事實。臺灣社會不因他是臺灣人出身而認同他的言論；同理可證，在臺大校園中，若學生會長發表相似看法，公開倡議兩岸統一的言論，不論是臺灣籍或外國籍，都將因此受到撻伐。原因不在於他的「身分」或「國籍」，而在於他違反了臺灣社會最可貴的共同價值。

香港大學的短暫赤化經驗，固然值得我們警惕。但民主可貴之處正在於其自我修復的能力。近期無論是野草莓運動抗議集遊法違憲、白衫軍運動25萬人上街、或是主張土地正義的苗栗大埔事件等，都有許多年輕學子參加的身影，在在證明臺灣學子在這塊土地上，充分吸收了自由民主的養分。在校園內，北部以臺大為首的學生自治圈，對追求校園自由民主、教官退出校園、挑戰威權制度、轉型正義、研究生勞動權益爭取的堅持，至今也仍不遺餘力。香港學生自治的赤化危機，更讓我們看見臺灣校園民主化的轉機，透過陸生參與學生自治的衝擊，喚醒少數冷漠的學生們願意重新關心公共議題。在民主化比香港更深化的臺灣，如果臺灣為政者能夠持續維持民主的環境，香港大學都能成功淘汰不適任的學生會會長，臺灣的校園學生自治何須畏懼共產黨的挑戰？■

8.本報訊，「在臺灣，陸生可否競選學生會主席？」，旺報，2011年6月13日。

只要真正認識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都會明白既有群體所造成的隔閡，並不意味要在對方身上加諸偏見。目前，本地大專院校的所謂國際化，流於滿足非本地生人數、英數教研等指標而徒具形式，只有當不同學生群體間的自發交流發生，相互了解真實地對方，真正的國際化、跨文化視野開拓才能修成正果。

在中港矛盾的主旋律下，我們急需還原兩地交流的繁雜現實，否則不僅個體生活會被泛政治化的氛圍所吞噬，社會改革的方向也將失焦，得益的只有當權者。大專學界多年來都有取錄內地生，兩地學生的相互衝擊、實際改變的校園景觀，值得以超越主流的資源分配乃至人口殖民視野來探討。

傳說中的內地生——我們需要「解魅」

即便撇開近一兩年因中港矛盾越演越烈，在部份院校民主牆出現針對內地生的仇恨言論，內地生群體在本地生眼中聲譽向來平平。舉凡合作小組功課時遇到的麻煩，到宿舍流傳的奇怪習慣，當中自然少不免誇大和以偏概全。但這類都市傳說，往往構成本地生對內地同學的刻板印象。

究其原因，兩地學生接觸不多是一大主因。同系的內地生朋友就表示，來自同一政治共同體所產

生的內聚力，是很多矛盾產生的基礎。¹不少傳統以本地生參與為主的學生組織，多會因語言障礙而排斥內地生參與。無論內地官方背景、自發的代表組織，一般都不會進入本地生的視野，兩地學生鮮有參與對方的活動；部份院校甚至由迎新營開始就分隔兩地學生。不僅交友圈子會因而以族群分界，中港學生之間的接觸也會頗為有限。

只要真正認識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都會明白既有群體所造成的隔閡，並不意味要在對方身上加諸偏見。目前，本地大專院校的所謂「國際化」，流於滿足非本地生人數、英語教研等指標而徒具形式，只有當不同學生群體間的自發交流發生，相互了解真實的對方，真正的國際化、跨文化視野開拓才能修成正果。

「染紅」恐慌

不過，學界和大眾對內地生確有很實在的憂慮。八九民運以降，

1.中大學生報，〈我們眼中的對方——內地生與本地生文化沙龍〉，2013年4月號。

爭取民主自由、拒共，成為香港學生運動的核心議程，也是大眾對學界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期望。因此，內地當局對內地生的監控和組織，一直是香港學界和大眾關心的問題。隨著親建制組織對香港社會各界的滲透越來越強烈，同學和大眾對於內地生參與大專學生組織也越趨敏感。過去幾年曾有學生會候選內閣成員被揭發是中共黨員，引起軒然大波。²但是，恐慌情緒對解決問題的實際幫助委實有限。建制陣營多年來一直有在港經營學生組織，由中學開始就招攬本地學生。由於大部份學生並不熱衷參與學生會事務和學生運動，建制組織要滲透這些陣地，根本不需要動輒動員內地生。^{3 4}

無疑，當局對內地生的監控，窒礙他們公開發表異見，但不代表他們都支持現政權、身負政治任務，更不代表他們對於學生自治，以致學生運動就不可能有任何參與的位置。⁵要阻擋建制對學生自治、學生運動的破壞，還需同學更積極參與，本地生更應視大部份無「任務」的內地同學為溝通和團結的對象。

良性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正因上文指出內地生學生組織在校園生活中處於邊緣，大眾較難覺察香港對內地學生的影響。內地生的內聚力配合內地校園缺乏的結社自由，令學生組織發展蓬勃，並從本地學生組織取經。

內地生學生組織多不勝數，有聯誼會、義工、劇社、球隊及報刊。翻閱中文大學內地生創辦的雜誌《獨立時代》，除了同學投稿、文學評論，還有香港和國際政治的新聞專題，從中窺見內地生既有基於相異生活經驗的視角，也有與本地生殊途同歸的一面——作為尋常大學生而已。

此外，內地生自覺不屬於本地社群，所以對本地學生運動關注的社會議題冷漠亦無可厚非，但卻不經覺感染本地學生的抗爭方式和權利意識。他們學會了組織關注組帶起討論、收集同學意見，以至動員同學抗議。說到底，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會越發成為世界的共識，這是內地當局無論對內地民眾和來港內地生的監控有多嚴密，都無法逆轉的歷史洪流。

國民與外界交流增加，導致意識形態控制變得困難，是中共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2.蘋果日報，〈城大生抗議中共滲透校園〉，2011年11月18日。

3.去年廣被學界和輿論認為是親共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內閣，就不見內地生的蹤影。

4.都是那些日子，〈中共要滲透嶺大學生會？〉，2011年11月17日。

5.梁仕池，〈與本地和內地同學談學生會的困局—防範中共的滲透與「保護」內地生上座的權利〉，2012年1月30日。

香港在過去，一直扮演著中國改革的發祥地，今日亦將延續這歷史任務。誠然，我們需要回應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扭曲，抵抗盲目追求排名、降低教育質素的劣質國際化政策，反對濫收非本地生，但同時亦不應排斥在此政策背景下來港的內地生，開放接受與內地生的交流，豐富香港的文化視野，在談笑間播下革命的種子。■

教人好生矛盾的是，我們欲將內地生拒諸門外，對滲透二字又懼又怕。但同時又對內地生把熱熾學運氣氛帶同北上感到熱血無比。到頭來，在這場博弈之中，我們還是沒有信心先守好保衛戰。

香港各大專院校中內地生比例過高是近年社會大眾頗為關注的問題。支持者認為引入內地高材生對提升本地勞動人口質素存在裨益，反對者則謂過度競爭會損害本地生留港發展的契機，得不償失。

然而撇除一切標籤別人成「蝗」的主觀情感，香港大專院校內地生比例仍煞是驚人。本地本科生及研究生中，內地生比例分別高達四成及七成，而其中九成更會留港工作。這樣的客觀數字，反映了不少人的疑慮並非空穴來風。

數字上的感受也許不如一切傳言來得具真實感。傳言把有能力來港的內地生，形容得一如洪水猛獸，身懷奇技。然則此言非虛，內地一切學習及工作單位中都存在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其中職能不乏嚴加挑選外流學生。每年這些機會均落入在各省市成績最高的「狀元」袋中，能夠過五關斬六將獲得來港讀書的黃金機會者，理所當然乃是人中龍鳳。

大學中走每一步身邊都迴響著流利自然的普通話是不爭之事實，

在星巴克買咖啡下單時是普通話；在圖書館查覽書籍時也是普通話，乃至於課堂上的竊竊私語都是普通話。龐大的內地生群體，在港理所當然地需要一些組織加以維繫。作為對大學事務稍有關注，卻難以加入內地生群體的普通本地生，亦不難稍稍瞻望到這些組織的表面。

三四月的一個平凡中午，港大邵逸夫平台上忽爾出現一群身穿綠色衣衫的學生，口操流利普通話。我本來正在校園中作有關香港經濟情況之問卷調查，也不由自主被這群聲勢浩大的綠衣人吸引。一問之下，原來是西索（CSSAUD，也就是香港大學內地本科生聯合會）的福利，在場的學生比港大任何其他一個院會、舍堂學生會所辦的活動出席人數要多上一倍有餘。最教人驚詫的是，在場的內地生雖然就讀不同學院學系，亦居住於不同舍堂或宿舍之中，卻有其他組織無可比擬的緊密性，彷彿在場每一人都互相認識。在網上討論區上，亦不乏有關西索迎新營和西索高桌晚宴的討論帖，其受注目程度不下於一所

大專的學生會。

去年港大《學苑》出現一則題為「學生會疑辦「暗O」內地生強制參加」的報導，指學生會疑接受中聯辦命令，強制內地學生出席為他們「度身訂造」的迎新營，更有內地生在內地社交網站留言：「學生會來電時，指明天（8月24日）的活動（新生迎新日營）是「強制參加」，甚至指「中聯辦會到場」、「不去的話大陸那邊會有紀錄」，並勸退Faculty和社團（屬會）迎新活動以騰出時間參加SU（香港大學學生會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的活動。「團結一致、獨立自主」本為港大學生會的宗旨，如今恐為外間政治勢力利用。但更使人擔憂的是，這並非能夠各家自掃門前雪的事。「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TSA，簡稱專上同盟）與中聯辦及中央幹部子女的聯繫，以及它期望完成學界力量的轉移，取代學聯(HKFS)，亦是情況堪虞。這是後話。

他們對於香港學生爭取民主和近年本地蓬勃的學界運動的反應是又驚又喜的。我在舍堂的室友見到我用以裝飾房間的選舉海報，是戰戰兢兢地問我有關選舉的事；在七一遊行尾聲的和平佔中晚會，亦有內地本科生誠意相詢，亦是一貫無能為力，「我們都知道，可是救不了」的語氣。本年度六四學界在銅鑼灣鬧市舉辦絕食活動，亦吸引

了一眾內地生圍觀，他們雖問長問短，但一旦邀請他們留下聯絡資料，或是跟展板稍稍拍照留念，他們也必多作推搪。

教人好生矛盾的是，我們欲將內地生拒諸門外，對「滲透」二字又懼又怕。但同時又對內地生把熱熾學運氣氛帶同北上感到熱血無比。到頭來，在這場博弈之中，我們還是沒有信心先守好保衛戰。■

戀殖 台灣的日本情節¹

吳叡人 / 翻譯 許容禎
中研院台研所副研究員 / 台灣大學政治所

1949年台灣人民原本企望中國國民黨的到來，但是想不到迎接的卻是不會比日本更好的威權統治，從期待到落空，讓日本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成為一個獨特的存在，台灣人民對日本友善的態度，甚至讓日本人都覺得訝異，這是什麼背景什麼因素產生的結果？

賤民飽經憂患的沉默

台灣歷經四十五年的日治時期，與韓國同樣受過日本殖民，同樣經歷歧視的創傷、強制的同化政策以及戰亂時期的軍事動員，但台灣的受害者心態卻遠小於韓國與中國。事實上，台灣人民不僅較少埋怨日本的殖民統治，許多人甚至將這個過從甚密的國家視為最喜歡的國家，這點從日本發生三一大震後，台灣是捐款最多的國家可見一斑。

台灣於1985年納入日本版圖時仍是清朝的海島邊陲或拓墾殖民地，與韓國這類已經經驗了政治動員的王國有別。台灣割讓之前並沒有完整的國族情感，中國與台灣民族主義皆無以扎根；因此，台灣人在心理上較易接受政權的轉換，不若韓國人於1910年遭併吞前夕所激起的民族情感。

領土轉換的歷史脈絡

何以台灣人對日本統治觀感與韓國及中國極具差異性，這點必須從歷史脈絡窺探，回溯至十九世紀末期起，台灣這塊土地無可奈何地因地緣政治而被反覆轉手的歷史。

首先，與韓國這類已經經驗了政治動員的王國有別，於1985年納入日本版圖時，台灣是清朝的海島邊陲或拓墾殖民地。韓國人於1910年遭併吞前夕被激出強烈的民族情感，然而台灣人並沒有一個完整定義的國族情感，在割讓之前，不論中國或是台灣民族主義均無以扎根，從而台灣人在心理上較易接受政權的轉換。

第二，不論北京政府如何正當化其割讓台灣之行爲，以在地觀點來看，台灣明明白白就是做為清政府的外交與軍事潰敗的替罪羊而被割讓出去的，這樣被不義地捨棄，造成在割讓期間，台灣人普遍對北

1.節錄自吳叡人文章” Redeeming the Pariah, Redeeming the Past: Some Taiwanese Reflections on the Murayama Statement” 收錄於Taiwanese Reflections on the Murayama Statement, p71~75

京懷有強烈的憤慨情感——因為打一開始，作為祖國的中國便是造成台灣人悲劇的元兇之一。

第三，儘管日本的統治嚴厲而壓迫，並且歧視台灣人，卻終究給台灣帶來了秩序、現代化與物質享受。反觀1945年後，取代日本人的國民黨政府，不僅壓迫、歧視台人，甚至腐敗而沒有效率，顯然劣於日本統治時期。1947年2月，台灣爆發全島性抗爭，要求進行政治改革或自治，便是最初的覺醒；此次抗爭卻遭到國民黨政府的血腥鎮壓，隨之而來的是恐怖統治的戒嚴時期，這段期間又被稱為白色恐怖，粗暴地讓人們意識到中國政治的現實。較之於國民黨政府，多數台灣人對離去的日本政權有較正面的評價。而對於激進、以意識形態論著的異議者，如流亡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而言，刻意闡述殖民時期的正面意義，其實更是詆毀當前國民黨流亡政權的論述策略。

國民黨政府治台的影響中，最為關鍵的，便是一方面造成長期的族群衝突，亦即外省人與本土台灣人的對立，以及另一方面，以國家暴力造成不分族群的共同創傷經驗。這個影響對弱化台灣人對日本敵意有所影響：國內的族群衝突削弱了日本人的他者形象，而國家暴力造成的創傷經驗，則使得台灣人對於轉型正義的要求，集中於國民黨在台灣造成的歷史不義。即便日

本人與國民黨政府皆對台灣有歷史不正義之舉，弱小的人們倘若長期處於一連串的歷史不正義中，通常感受最鮮明而引發強烈情感的，會是時間點上最接近的不正義經驗。

第四，台灣戰後的地緣政治處境，亦形塑了台灣人對日本的觀感。冷戰的結構下，中國才是台灣最為顯著的他者，而非日本。此外，近年來由於中國崛起，南韓在現實政治的邏輯下，對於邊緣化台灣從不遲疑。中國與南韓皆為對日本帝國主義兩個批評聲浪最高的國家，在當代的地緣政治局勢中，實際上卻共同加害著已然更趨弱化的台灣。反觀日本自1990年代起，一直以來都是這個區域中唯一對台灣最友善的國家。

受害經驗的結構

十九世紀晚期開始，台灣的受害經驗有特定結構，當中有兩個特色：第一個是涉及日本的受害經驗中，關鍵受害經驗通常都有多個施暴者。這類的例子不勝枚舉。首先，1895年的領土割讓使得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是基於日本與中國的協議；1945年將台灣移交國民黨，則是少數盟軍領袖間的協議，而台灣人在戰後沒有選擇國籍的權利，則是日本、美國政府與國民黨的共同決議。

專斷任意的領土轉移，最終導致1947年2月28日全島規模的大

屠殺，造成島上長期的獨裁統治；而戰後褫奪台灣人選擇國籍的權利，則是台灣人喪失了以公民身分向日本要求勞務或受害補償的原因之一。1952年，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中日和平條約》，放棄了所有戰爭相關賠償。條約中並未提及任何有關台灣人向日本要求在殖民統治下的損害賠償權利。甚至在1952年至1972年間，與日本仍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之際，中華民國流亡政權亦持續對這個議題保持沉默。即使到了1990年代，台灣人對日本統治時期的索賠問題都是懸而未決的。與此相反，韓國政府縱然妥協，讓韓國人民有權以個人身分向日本求償，卻也在1965年的《韓日基本條約》中，與日本協調了五億美元的賠償與貸款援助。然而，在戰爭賠償或援助上，中華民國政府卻從未爲了台灣人進行過類似的官方求償或溝通。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以其沉默致使台灣人民只能緘默。

直到1972年，台灣未曾停止這樣的雙重沉默。從1971年起，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在聯合國上的會員資格，以及1972年美國對台斷交，開始了一系列的外交危機，日本也於1972年對台斷交；直到今日，對日斷交對於台灣人向日本索求戰爭賠償而言仍是場災難。面對官方正式管道的斷絕，以及政府的不爲人民政府發聲，1970年代以

來，以個人身份索賠的台灣人，被迫以曠日廢時的訴訟與社會運動的形式來傳達訴求。

1990年晚期，日本政府對南韓與中國尋求一系列的外交和解，從而提出對歷史爭議的共同宣言，以及由政府出資的雙邊共同歷史研究計畫。在外交層面上，日本對於歷史和解的提案，縱然象徵意義居多，卻仍是極爲重要的。而僅因爲日本並未正式承認台灣，台灣便被全然排除在和解的議程之外，就如同這段歷史未曾發生過一般。至今有許多理論探討究竟誰該爲1970年代台灣的外交潰敗負責，其中，蔣中正對於代表一個中國的可笑堅持，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最終誰該爲了「我何以成爲一個孤兒、一個賤民」負責？對於雙重、三重、甚而時常是多重受害者，然而在這些攸關性命的大事件中，不具發言權的台灣人而言，這確實是個令人困惑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上述領土轉移史中，推論出台灣人受害經驗的第二個特色，便是這樣的受害經驗是一次又一次連續不斷的、而且通常是受到多方加害的。十七世紀以降，台灣的領土在從不曾知會人民的情況下，不斷地移轉於在不同的帝國中心之間，例如緊接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於戰後在台灣施行的獨裁政權，很多面向上與殖民統治非常相似。

對於非自願性領土轉移與殖民政權造成的連續受害經驗，一個最常被提起的例子，便是1940年到1950年間，數萬名台灣青年接連被日本人、中國民族主義者、中國共產黨徵召入伍，因而被迫參與了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與韓戰。最終那些韓戰的倖存者滯留中國，面臨一系列的殘酷考驗：1957年的反右翼運動以及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台灣人被貼上「區域民族主義者」的標籤，其忠誠遭到質疑，並且受到嚴重的迫害。

簡要回顧台灣在歷史正義上的損益，台灣的多元結構與連續受害經驗本身也許不是特例，像韓國與中國這類在地緣政治上相對脆弱國家或人民，也曾遭受到類似的情況；然而這類受害經驗，在台灣的具體脈絡中，確實造成了特定的政治與心理作用——即便不是完全消弭，至少也大大稀釋了日本人作為使台灣人不幸的加害者的觀點。

最關鍵的差異在於，台灣人民受原加害者與曾受害之同胞多方且連續性迫害。這源於1970年代起，台灣退出聯合國中心的國際體系，且中國的影響力擴大，從而台灣日益受到孤立；這種窘境或可被稱為「賤民困境」，主要是國際政治的結構使然。正是因為陷入賤民困境的台灣，在加害者－受害者關係上是多層次而複雜的，而緩解了台灣人對日本人的憤恨。

總而言之，那些曾經受日本迫害的國家，諸如中國民族主義者、中國共產黨、韓國人、甚或菲律賓人、新加坡人、印尼人，皆有加害或醜化台灣的經驗，這對台灣人而言是血淋淋的教訓，使之了解真實世界並非善惡分明的邏輯，相反的，在道德上有其模糊地帶。從中台灣人了解到——或可稱之為賤民的頓悟——對於日本的道歉問題，這些國家採取一種更為複雜而世俗的態度：賤民真正要求的並不是強國的道歉，而是其自身的道德力量，因為只有道德力量會帶來認同與尊嚴。因而我們看到《村山聲明》之中對弱者的道德觀點，其清楚指出，諸多事物之中，權利先於強權，即便在國際政治中亦如此。



戀殖 香港主權移交後的 「戀殖」現象

羅永生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中國對香港費盡心思，但是香港人卻近年卻出現懷念英國統治時代的聲音，到底中國做錯什麼？香港懷念什麼？這只是單純對現狀不滿，而產生美化過去的投射嗎？

這幾年來，香港冒現了一道特異的風景，就是在大大小小的示威遊行的場合，都見有青年人揮舞著英國國旗，以及舊日香港在英國殖民地時期用的旗幟。那面「港英旗」在左上方是一面小的大不列顛「米」字旗，右下方是一個由「龍」與「獅」合組的盾徽。而另一支也非常耀目搶眼的，是從港英旗移去了「米」字，保留了「龍獅」徽號，中間加上漢字「香港」的「龍獅旗」。這幾支旗交相出現在街頭，象徵著一種向英殖民時期致敬的願望。

好幾年前，筆者首次在七一回歸日的遊行見到「港英旗」的出現，當時並沒有甚麼媒體報導及關注，及至去年香港出現了一個「香港自治運動」的小組織，他們以「港英旗」為基底創造出一支「龍獅旗」，也乘著網上「城邦自治論」的流行，社會上方開始廣泛留意這種帶著「戀殖」色彩的政治新潮流。自此之後，這些不同款式的英殖像徵便形成一種小小的「次文化」。

不過，雖然港英旗和龍獅旗都令人聯想到對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懷緬，但嚴格來說，兩支旗幟所展現的是頗為不同的政治取向。

城邦論的支持者主張香港要以族群政治的手段，爭取香港真正的「自治」。他們主張「中港區隔」，香港人要在心態上和中國切割，但在政治上，城邦論者認為他們並不是要追求獨立，甚至還要以香港來復興「華夏文化」，這可謂一種既反對人家抱大中華思想，卻又要擁抱中華「道統」的「小中華主義」。

雖然兩支旗幟底下的人，都共同分享著對中國大陸及大陸來客的抗拒，不過，揮舞「港英旗」的年青人，對任何中華思想都具有戒心。在揮舞港英旗的活躍分子中，有人並不諱言他們最希望達成的是「香港獨立」，所以他們也毫不顧忌人家認為他們有「戀殖」的傾向。雖然他們並未有像「城邦派」一樣有一套完備的理論，但他們要表達的是一種更為坦率的要求，

也就是希望與中國，甚至包括中國文化切割。所以，揮舞港英旗並不代表他們以為香港重新受英國管轄是一個可以實現的選擇。因為他們要衝擊的，其實只是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後，鋪天蓋地在香港生活每個範圍都可以感受到的民族主義政治正確性。這種大中國主義想將殖民時代對香港及香港人的真實影響含糊淡化掉的。對他們來說，這種民族主義政治正確性，不但存在於官方建制，也存在於主流的泛民反對派。但這種民族主義正直接或間接地否定一個明顯的事實，那就是「香港人」已經變成與大陸上的中國人截然不同。這種新浮現的香港人意識，標誌著和過去十多來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以來的全新現象。

事實上，香港主權轉移的起初十年，香港縱有風浪，政治身份認同都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人們總是以基本法為依歸，認為基本法承諾的「一國兩制」仍然是在實踐當中，當中最為敏感的政治改革部份，也只有步伐快慢的爭論，不存在信任崩潰的狀況。但是自從2004年人大倉促釋法，為雙普選訂下額外的框框開始，人們廣泛地對基本法的承諾產生懷疑。香港的泛民主派陣營中間，亦因為路線分歧出現嚴重的分裂，把社會上最大的共識打破。蜂擁而出的是更多的青年自發社運、網上數不盡的異端政見群組。夾雜在各類新政治見解中的，

是強烈的反共情緒，以致身份認同問題的重新理解。

去年是香港主權移交的十五周年，網上有好幾篇文章，很能夠反映出青年一代對自身身份認同問題的思考，它們被大量的轉載和討論。其中一篇題為《一名90後對英屬香港既感受》，文章開頭是這樣寫的：

「當年電視6點半沒有洗腦時段，英國亦讓香港人學習中國歷史，了解我們來自那裡，卻沒有一科英國歷史，迫我們洗腦。我尊敬英國，是因為英國有尊重香港人，真正的愛和尊敬是發自內心，不需要洗腦。香港回歸時我只有2歲，對英國沒有很深的印象，很多90後更加可能沒有經歷過英治時期，但不代表他們沒有權說懷念過去，回歸數年後的香港，仍然有英國留下來的影子，他們都能看到和感受到香港回歸後如何衰退，並非沒有經歷，沒有懷念的權利，英國人不會對我們說你們是狗是奴才，沒有英國照顧你們早就完蛋了，但中國呢？我只能說聲，我的心在英屬香港，因為那裡有尊重，中國的洗腦，永遠不能改變我的心。」

正如絕大部分的「懷舊」一樣，所緬懷的都不一定是個人的實際經歷，而是一些由於當下處境而重新塑造，以致投射出來的「記憶」。這位「90後」的作者真實的處境是目睹他有生之年（「回歸

後」)香港的「衰退」,也經歷過年前北大教授孔慶東出言侮辱香港人都是狗的惡毒言論,也受到香港「反國民教育科」運動的衝擊。這些都是他將他的不滿,連結對一個美好「英治」形象的背後原因。

事實上,香港的確是一個很容易對歷史產生各種心理投射的地方,因為正如這位作者所寫,香港過去並沒有統一的歷史教育,甚至應該說,香港教育一直是非常嚴重的「去歷史化」。在英治時代,英國歷史既沒有納入課程,中國歷史也只是個別文科學生的選修科,而且在一段長時期內,中國歷史科也只偏重中古、遠古的歷史而非近代史。對「歷史」的放任自由主義,同時也意味著虛空的歷史觀。過去這項意圖淡化歷史記憶的政策對英國殖民者有利,但主權移交後雷厲風行的教育改革,也一樣將中國歷史科日益邊緣化,因為主政者希望以「國民教育」去取代為學生建立歷史觀的功能,想建立對國家的忠誠而不是明辨歷史的態度。所以,當新一代馳騁於美好英殖時期的浪漫想像之際,他們也毫不諱言,他們並非以殖民歷史的真相為依據。

例如,另一篇題為《為甚麼我想香港獨立/自治》的文章中,作者也坦然承認殖民主義並非仁慈無私的善意統治,她說:

「我不認為懷念英國的一部份香港人是崇洋媚外,那是發自內心

的感激之情,我們絕對知道殖民地政府自己拿了好處,真誠為香港的官不多,但英國人為香港確立了廉潔、自由和法治,建立了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把香港從漁村變成國際金融中心,這些都是香港人自己做不到的,就看特區政府的無能而知。我不覺得這是奴性,這是學生對老師般的感恩,我很佩服英國人的管治能力。殖民地政府沒有教我們愛英國,以前政府口號廣告公民教育都是教我們愛香港。香港人在外國遇險,例如日本地震或泰國軍變,中國大使館不受理,反而英國會接走持有英國海外國民護照的香港人,我完全能理解他們認英國為祖國。還有,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獅子山下自力更生精神,也是在殖民地政府下建立的。」

作者比較特區政府和英治時期的管治能力,認為前者遠遜於後者。姑且先勿論英國一直都肯為香港人出頭是否符合事實,以及香港是否真的曾經是一個完善的福利社會(很明顯這些都是誤解),有趣的是在於,無論是「管治能力」還是「英國把香港由漁村變成金融中心」等幾乎已成了陳腔濫調的香港故事,都是自八十年代以來,中、英、港幾方合作所形塑的主流論述。英國人在部署「光榮撤退」過程中,努力形塑英國如何創造香港奇蹟,但中國方面,也要表演如何把「香港奇蹟」光榮平穩的接收。

中國關於香港的「去殖民故事」也只是強調香港過去的成功，是有賴於中國在背後的大力支持。也就是說，沒有中國過去對香港的支持，就沒有今日的香港。於是，香港漫長殖民史上的各種複雜、糾纏的關係，都一一變成同一個浪漫殖民香港奇蹟的變奏，中國與英國共同打造香港的「殖民奇蹟」。今天，主權移交後成長的一代，也不知不覺地全盤接收這套論述，因為這是流通在各種公共空間的主流論述。問題卻出在，當英國撤退後，英國可以隱身成為抽象地懷緬、追憶的想像，但中國卻被同一套論述所訂下的標尺所批判。

事實上，香港是一個沒有通過「解殖民運動」而完結它的英國殖民統治狀態的社會。殖民地經驗、殖民主義文化、殖民管治方式等，全部都未有經過反省、批判和痛苦的衝擊就給「急凍」起來。所以，從某一個意義來說，「戀殖」是一個早早就內置(built-in)於香港目前「後殖民」狀態的成份。因為，整個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所定下的，基本上是一種筆者稱為「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狀態的延伸，它不意圖去終結殖民主義，而是將殖民主義冷卻和凍結。就正如香港的專欄作家陶傑反複的在他的諷刺文章上所表述的，其實最最表現出香港崇洋戀殖一面的東西，正好是當今中共及依附在它周圍的權力建制所推許和讚頌的東西。

問題就在於，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官式政治正確文化底下，建制派的附從不時要高舉「戀殖」的大棒去對付香港的青年異見分子。例如2007年社運青年發起保留皇后碼頭的運動，當時的親中左派就大肆抨擊這些為「戀殖」的行為，是香港政治上回歸了但「人心尚未回歸」的例證。這種論調早已從主權移交後初期的一些個別、零星的評論，慢慢變成一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官方政策，他們希望可以透過改造香港的人心，克服和扭轉「人心未歸」的狀況。「國民教育」背後的愛國主義教育議程昭然若揭，最近又更出現的針對「通識教育科」可能成為中學生政治覺醒溫床，因而要求教這科的老師申報自己政治立場的呼聲。

不過，這種種新出現的意識形態控制舉措，與其說是在補救「去殖民」/「反殖民」意識在香港「回歸」過程的缺席，倒不如說是深化了香港「解殖未完成」的危機。因為親中的國家主義者揮動批判大棒，把反對者的反對行動上綱上線，把一切爭議都上升為關於身份認同的對立，連繫到民族與國家忠誠的問題，把香港正常的民主政治爭議上升為「敵我」矛盾。但是，這種批鬥所壓縮的正是過去數十年香港持異見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空間，把香港的一切的政治都化約為國族身份認同的政治。

事實上，「批判戀殖」往往內含著對香港文化經驗獨特性的敵視，把「香港性」化約為可以簡單移除抹走的「殖民性」。這顯然是對殖民性的複雜糾結傲慢與無知。當批判戀殖日益以國族主義方式，以君臨香江的姿態出現，它會在否定浪漫化的英國人功蹟的同時，也一道取消了香港人的主體性。這種批判不單會肢解英治時期複雜的殖民歷史，也會日漸消融文化解殖過程所必需的那種忠誠面對歷史的態度。而為了守衛香港人作為香港的歷史主體地位，反對中國國族主義的侵凌，懷緬英治美好舊日的情懷正日漸演化成一種「策略性的戀殖」。

就正如香港社會學家呂大樂最近出版了一本題為《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的書，其題旨是透過重新細閱的歷史資料，商榷一種通行的觀念。那種觀念認為七十年代是香港形塑出一種香港本土身份認同的起點，也因為這樣，所以不少人也因此認為七十年代也是一個好的時代。呂大樂透過他仔細的史料扒疏，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他認為縱然香港人在那個階段形成了本土意識，但絕非是因為市民認同了當年港英政府的施政，也不是因為認同及參與了當時殖民政府為了最終撤退的打算，刻意消除施政的殖民地色彩所打造出來的各種民意工程。

呂大樂的研究提出的是歷史真

相的問題，他所針對的那些流行觀念，如果說那已經變成一種神話，也是一種由各個不同的立場的人所分享的神話，當中包括今日泛民中堅的那一代，亦即出生於嬰兒潮時期的所謂土生土長的新一代。可是，呂大樂的研究針對的這種嬰兒潮中產一代的迷思，卻不符合新一代本土主義寫手要求刻意打造英國善治神話的口味。他們認為，呂著是一本讓那些「離地中產」知識分子去替英治神話「去魅」的著作，功能是幫中共滅火，打擊英治香港比特區香港更好的論述，暗合中國的新殖民主義。他們認為，縱然英國人善治香港只是一個神話，未必符合史實，但依據托古改制的精神，對過去的重構或者再創作，都是合理的，毋須受準確無誤史實的羈絆。很顯然，對這些論者來說，只要政治上有需要，人人不單有權懷念英殖時期（就像上面所引的年青作者），更有權打造出值得懷緬、值得依戀的「殖民回憶」，讓香港「思今苦而憶昔甜」，以說明我們有權追求自己的「本土性」。

這種「策略性戀殖」的歷史觀，雖然實質上是鏡像倒映出他們所反對的中共所依附的那種官方史學／中國皇朝史學那種以政治駕馭歷史的精神，但也正好例證出今日香港「解殖」工作的舉步維艱，也就是說，當香港身陷勾結殖民的雙重困局，也體現了國族主義反殖民

的虛妄與自傷，甚至了解到國族主義運動其實就只是準備著另一種殖民主義，但當自身要在掙扎當中確認自身的歷史主體性時，「急就章的政治」（politics of expediency）仍要驅逼著一些人去拿起敵人早為他們預備好的「反抗」武器，仿效一種類國族主義的想像。他們分不清那是武器還是陷阱。

就像Ashis Nandy所說：我們不單在身體和思想上被佔領了，還更被先佔了對自身解放條件的認識。這就是他所說的「第二次的殖民化」。■

本土

從「夾縫」看本土意識

白蓮達
香港自由撰稿人

身處中國領土的一塊土地，香港需要自己的本土意識嗎？特別是與在地關懷不同，現在香港討論本土意識可能是香港認為自己與中國不同，對於北京不滿，到底這樣的本土意識與大中國意識型態在港人眼中，會怎麼走？而香港的本土意識興起是否又可能成為另一個種族霸權的展現，如華人對於外來族群後裔的排擠？

引言

身處中國領土的一塊土地，香港需要自己的本土意識嗎？特別是與在地關懷不同，現在香港討論本土意識可能是香港認為自己與中國不同，對於北京不滿，到底這樣的本土意識與大中國意識型態在港人眼中，會怎麼走？而香港的本土意識興起是否又可能成為另一個種族霸權的展現，如香港人對於外來族群後裔的排擠？

借來的時空與本土意識

在英殖時代，香港人根本無本土意識的概念。殖民地政府從來沒藉此培育出香港市民的本土意識，到底香港需要本土意識嗎？在此亦先說明，本文所提及的「香港人」，不單指長居於香港的華人，亦包括幾代長居香港各族裔的人士。

在英殖民統治百多年，香港人在「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生活、工作，一個小小漁港竟蜚聲

國際，成為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與紐約倫敦齊名。香港有以捕漁維生的漁民，也有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因戰亂及逃避中共政權而選擇南來香港的華人。這批南下的華人，有學者、生意人及技術人員。抵港後，從商的在港設廠，建立自己的生意，學者到學術機構任職或任教，透過各種渠道將華夏文化的知識傳授給學生，亦令很多經典古籍得以流傳。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學術發展蓬勃，這些南來的商人和知識份子實在功不可沒。

香港人「以香港為家」的觀念及確立「香港人」身分，大概要推到上世紀七至八十年代，在傳媒、藝術及流行文化中紛紛展現出來，電視劇劇集的內容，亦與當時社會現況息息相關，如：「變色龍」、「大丈夫」、「網中人」、「香港八幾系列」等等，至於流行曲方面，也有以香港為主題的作品相繼推出，如：「香港·香港」、

「東方之珠」、「蚌的啓示」等，其中「蚌的啓示」更是當時公民教育宣傳的主題曲，至於電台，香港商業電台自六十年代已播出的廣播劇「十八樓C座」，¹透過小市民談論時事，諷刺時弊，嬉笑怒罵，這廣播劇至今仍然廣播。香港作家西於七十年代創作小說《我城》，「以人物爲經，以城爲緯」（見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可算是本土文學的始祖。《我城》在當時來說乃創新嘗試。

英國在殖民統治時代爲香港提供了自由的土壤，令香港人在學術出版及言論方面的自由皆受保護，以致大量學術著作能夠出版面世，爲文學創作及流行文化，開拓了康莊大道。另外，香港的法定語文是英文和正體中文，香港人大部份以粵語爲母語，奠定香港人的本土身分。英國政府縱使無心插柳，卻爲香港本土意識提供基礎。

從「夾縫」看大中華情意結

有人總是以「香港是移民的城市」爲駁斥本土意識的理據，事實上，香港於上世紀曾經歷幾次人口遷移：（一）五、六十年代，大批移民由中國大陸逃難來港；（二）七十年代末大批非法入境者來港，其後港府實施「抵壘」政策，特赦大批偷

渡人士；（三）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爲止，不少香港人因六四事件而人心惶惶，紛紛移民海外，移民潮一直持續至九七前後。²

可是，遷移歸遷移，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新移民在移居香港後，迅速融入香港社會，努力找工作，不懂廣東話的學習廣東話，學習社會風俗和世情。五、六十年代的新移民都能趕上七十年代經濟起飛的列車，和其他香港人一樣，與社會邁步前進，不止改善物質生活，也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

上世紀九十年代，身處象牙塔的學者也熱衷研究香港人身分問題，參照外國學者對香港人文化身分的描述，多以「夾縫」（in-between）去說明香港人的處境。

「夾縫」的確突顯了香港人身份的曖昧和尷尬。我們並非英國人，我們只是在英國殖民地生活的香港人。我們大部分也是黃皮膚的華裔人士，然而，我們和中國大陸的華裔人士又不太相似。身處「夾縫」的香港人到底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

有些早年移居香港的人，雖然視香港爲家，但在他們心中，仍以中國大陸的土地爲他們的故鄉。有很多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也有

1.十八樓C座 - 維基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5%85%AB%E6%A8%93C%E5%BA%A7>

2.香港人口 - 維基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A%BA%E5%8F%A3#.E5.B0.91.E6.95.B8.E6.97.8F.E8.A3>

類似的心態，此所謂「大中華情意結」。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為香港人帶來希望。隨後一系列描寫家國情懷的流行曲應運而生，如：「我是中國人」、「我的中國心」、「中華民族」、「中國夢」等等。有份主唱這類型歌曲的張明敏，亦被冠以「民族歌手」的稱號。

沉醉在大中國夢多年，卻因八九年學運及後來發生的六四事件，令很多有大中華情意結的香港人心碎了！由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香港已經發展成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本來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香港人對九七主權移交的憧憬頓成泡影。六四事件後頭幾年，陸續有香港人移民海外，為自己家人尋求避難所。

在後殖民時期，香港人面對主權移交的恐懼揮之不去，除了享受世紀末剩餘的日子，對自身的「夾縫」處境從來無法亦不敢面對。學者從來沒為這個問題提供實在的答案。如何在「夾縫」中尋找香港人的身分？其實，答案必須由香港人自己去思考去發掘，別期望別人告訴你。

本土意識的確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仍承襲殖民時代的普通法。另外，《基本法》亦清楚解釋香港特區與宗主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分野和關

係。受《基本法》保護下，主權移交後初年，香港人仍感到與英殖民地時代沒兩樣，香港人仍享有一切自由，每年仍能參與六四晚會，仍然可以表達激烈言論、有出版自由。可是，在往後的日子，卻起了微妙的變化。

2003年，SARS在香港迅速爆發，特區政府對疫情隱瞞及應對遲緩與醫護人員以至一般市民的反應成強烈對比，當時香港社會的凝聚力是史無前例的強烈。同年，政府官員強行推出廿三條立法，引發五十萬人上街表達對政府施政的不滿，這是自主權移交以來上街人數最多的一次。之後政府因為民怨沸騰，擱置立法，這是民意推倒政府政策的一次重要里程碑。2003年可以說是喚醒香港人對本土意識醒覺的開始。

SARS之後，一連串反對政府無理施政的公民及社會運動，令很多本來對政府非常冷漠的香港人，漸漸關心社會，並開始評論政府政策，由2003至2009年期間，經歷了政府強行搬遷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再有包圍立法會反對興建高鐵，以及保衛菜園村運動等等。這些運動未必完全與本土意識的確立有直接關係，可是，卻是本土意識發展至最熾熱的時候，可惜當時並無一套很完善的本土論述，就像熱鬧過後，火炬熄滅。2010年，有關由政改爭拗演變的五區辭職變相公

投，再次牽動本土甚至是自主意識。可惜政改一役再次令香港人跌進深淵。

2003年，中國大陸與香港簽訂 CEPA（更緊密經貿協議），並向香港推行「個人遊」（自由行）計劃，最初中國廣東省東莞、中山、江門及佛山四個城市的居民，可以個人身分來港旅遊。之後，「個人遊」計劃進逐步擴展至多個中國城市，令申請來港旅遊中國居民大大增加。後來，大家索性稱呼此為「自由行」。開始時，大家都視此計劃為救港良方。可惜，十年下來，香港人真正得益的有多少？當大家假日往旺角彌敦道或西洋菜街，滿目只是金舖、藥房、化妝品專門店或那些外國名店，名店只顧爭取「自由行」旅客的生意，商場乘機大幅提高租金，令很多光顧多年的老字號都消失，原本在同區經營的本地小商店無法抵受昂貴租金，或是結束營業，或是將鋪位搬到遠一點的位置或改租樓上舖，店舖所在的街道均令人寸步難行。

2010年8月，在菲律賓發生人質慘劇，原是歡天喜地的暑假旅遊，最終釀成八名港人魂斷馬尼拉。當時學者沈旭暉提出有關「次主權」³的問題，慘劇亦令香港人對中共政府無實際行動去營救人質頗有微言，亦令香港人重新再思考香港人的主體身分。

2012年，令人驚訝的事情終於

發生，尖沙咀廣東道名店D&G因拒絕香港人在店外拍照，引發多次由網民發起的圍影店舖活動，這次可說是香港真正的本土運動，令香港人真正反思自己香港人的身分，在有問題發生時需要挺身而出，保護「主場」。

同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清楚表達了香港人對中共企圖以愛國來包裝洗腦教育的不滿，為何要取消中國歷史科？而通識科的課程也包括當代中國等內容，何必要另外撥資源去增加上課時數？表面上，政府讓步了，不再推行國民教育科；實際上，國民教育這陰霾仍籠罩香港教育界。

由於大量「自由行」旅客借旅遊在香港大量購買嬰兒配方奶粉，令香港媽媽無法買到奶粉，事件再次觸動香港人神經。及至2013年初，網民發起「光復奶粉」運動，由於輿論壓力，特區政府不得不急急推出「限奶令」，這次是繼2003年的反廿三條後，再次因為市民發起反對政府無能施政，而取得暫時勝利。

在反對新界東北發展、反雙非、反對殘體字、及在上水反走私（水貨）客等多次本土戰中，都是香港人重新確立自主身分的重要事件。經過多場本土戰事，香港人明顯已走出「夾縫」，確認自己身為香港人的自主身分。

執筆之時，特區政府因受中共

3. 沈旭暉〈解構香港次主權——從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談起〉，《明報》2010年8月27日。

政府的壓力，月來不斷出口術，說要檢討「限奶令」成效，並打算於十月一日後撤銷「限奶令」，若特區政府依然不理香港人的需要，凡事要討好中共政府及其人民，難保市民會再次與大陸遊客發生衝突，後果堪虞。

本土意識、主體身分與排外

2011年末，香港學者陳雲的著作《香港城邦論》⁴出版，當中提出的「中港區隔」論點，為學術及社運界揭開一場本土意識與大中華意識之筆戰。2013年初，陳雲的著作《香港遺民論》出版，再次深化其本土論述及中華聯邦之主張。年多下來，網上輿論由最初反對本土論述，到後來漸漸認同其「香港人優先」的觀點，更有議員認清本土利益才是香港人心所趨，遂成立政治組織「香港本土」。⁵

曾有些長居中國大陸的香港作家撰文攻擊本土派論述，他們的論點主要是：

- 1) 香港人很多都來自中國大陸
- 2) 香港人應包容新移民及雙非，因為他們都是「同胞」
- 3) 關於限奶令一事，他們說「港媽何不餵人奶？It's all about determination.」（這是取決於意志）
- 4) 簡體字容易學習。

還有其他零碎言論，不贅。陳雲及旅美港裔學者孔誥烽多次於面書及專欄撰文駁斥這些論點，香港作家陶傑亦多次於其專欄文章表示支持本土論述。

如果命運能選擇，香港人本來就希望誠如鄧小平所言「五十年不變」。可是，只是區區16年，香港在各方面已被中共步步進擊：香港沒有審批單程證的自主權，「自由行」計劃只能任憑中共的安排，因為《基本法》條文的灰色地帶，「雙非」（父母皆非香港永久居民）嬰兒在香港出生便能自動獲得香港永久居民的身分，特區政府並無推出相應措施去應付近年大量飆升的「雙非」嬰人數，現時連小學學位已被「雙非」學童攻陷，導致本地學童無奈要到跨區學校上學。在往後的日子，可以預期中學及大學學位會被雙非學生搶奪。另外，自1997年後，入讀研究院的學生均以中國內地學生為主。

在多次本土運動中，參與人士所製作的標語和撰寫的文章都以「香港人優先」、「香港我主場」等為主題。這是因為近年香港人意識到，只有本土優先才能守衛香港本身的特色，保護香港人的權益。如香港人遇到壓迫不作抗衡，香港很快便會淪為中國大陸一個城市，而非具獨有特質的特區。如果中國政府仍未認清本土意識已在香港人

4.《香港城邦論》簡介http://www.cp1897.com.hk/product_info.php?BookId=9789881550415

5.「香港本土」臉書。

心中茁壯成長，而打算用種種方法損害香港人的利益，必然會有惡果。那些說捍衛本土為「排外」的人，根本是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誣蔑本土派支持者。

「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無疑擔當了示範的作用，是中國向台灣體現一國的表現。有人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香港人怎樣自處，台灣人想必也有類似的看法。

香港之所以是香港，正正因為她承襲了前殖民地一百多年的歷史、風俗及文化，使她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儘管只是地球上那僅可標示的一點，卻是國際著名的都市。

香港於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至1997年7月1日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凡155年。■

白蓮達

本文根據本人多篇投稿文章整理而成，現詳錄如下：

- 1) 〈『自由行』的不自由〉，BBC 中文網「大家談中國」2012年7月10日。
- 2) 〈港人十年來受惠於『自由行』嗎？〉，BBC 中文網「大家談中國」2013年1月30日。
- 3) 〈本土意識是如何煉成的？〉，《輔仁媒體》2013年6月8日。
- 4) 〈香港遺城十六年〉，《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3年6月19日。
- 5) 〈我的未來在十六年前被移交了〉，《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3年6月29日。
- 6) 〈遙祭港人英靈〉，《輔仁媒體》2013年8月23日。

參考書目及資料：

1. 陳雲面書貼文<http://www.facebook.com/wan.chin.75>
2. 孔詒烽面書貼文<http://www.facebook.com/hofung>
3. 陳雲《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全部。
4. 朱耀偉《繾綣香港 大國崛起與香港文化》，香港：匯智出版，2012，全部。
5. 朱耀偉《香港流行歌詞研究：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香港：三聯書店，1998，全部。

本土意識、政治轉型與 菁英鬥爭

陳中寧

東吳大學政治所博士班

本土意識同樣面對大中國意識型態，在台灣產生藍綠不同的想像，到底什麼才是台灣的本土意識？還是其實我們允許不同的本土意識同時並存，但是這樣的局面面對跟中國的互動，是不穩定的，台灣的年輕人又是如何看待台灣本土意識的內涵？

前言

〈本土意識〉，在台灣或是香港都是重要的議題。面對中國民族主義，本土意識將是港台兩地民眾心理上的重要壁壘，抵抗「兩岸統一」與「中港融合」；並能成為實質政治行動的動員基礎。

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許多論述會回溯自2004年利東街保存運動與06、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兩場運動中，面對資本與權力的入侵，〈本土意識〉伴隨著老社區的保存、歷史地景的捍衛而形成。集體記憶的守護，在抗爭中扮演相當重要的地位。2009年從廣東穿越深圳進入香港的高速鐵路迫使菜園村面臨拆遷，進而引發抗爭。雖然在抗爭中並未太強調〈本土意識〉之成份，但高速鐵路的貫穿或可視為北京支配香港之權力圖像的體現。保衛菜園村運動中，新的世代：「80後」，相當於

台灣所謂的七年級生，登上了抗爭的主要舞台。

2011年〈本土意識〉呈現出另一種面貌。由於中國人搶購香港奶粉，加上諸多生活上的摩擦，致使部份港人指稱中國人為「蝗蟲」，引起不小風波。學者陳雲提出的《香港城邦論》與其所引發的香港自治運動，則似乎將香港的〈本土意識〉帶往政治訴求的層次。張鐵志在蘋果日報的投書上提到，他認為「香港的本土有兩種」，保衛利東街與天星、皇后碼頭的，是偏左翼的一種；而蝗蟲論與陳雲等人則屬於「右翼本土派」。¹

回到台灣，〈本土意識〉在台灣脈絡下的定義與內涵或仍有爭論，但台灣認同早已成為主流。²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在1996年後持續攀升，2009年之後更一直處於50%以上。統獨上的轉變則因為中國的武力威嚇而較為保

1.張鐵志，2013，〈蘋中信：香港的本土有兩種〉，《蘋果日報》（台灣），2013年7月16日。

2.本文中所謂台灣的〈本土意識〉就是指〈台灣意識〉與〈台灣(人)認同〉。當然，可能有人會不滿意這樣的代換，不過本篇文章並不是要針對〈本土意識〉在台灣的定义做探討，因此請姑且容忍此一代換方式。

守。「維持現狀」始終具有較多擁護者。然而近20年，偏向統一的人也未曾高於10%。數據顯示台灣主流民意擁護的乃是以台灣為場域的認同。這樣的認同，也就是對〈本土〉的認同。³即便對台灣獨立的主張，民眾會因現實考量而有所保留，以致台灣人的〈本土意識〉或台灣認同無法充分體現為政治力量或投票選擇。但至少在認同上，無疑地，以台灣為主體的認同多年來已獲得穩定多數的支持。

這樣的認同是在文化論述與政治事件的導引下，以及與國民黨政權和其所擁護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抗中形成。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興起及相關論戰，對台灣〈本土意識〉的形成扮演了重要角色。美麗島事件與黨外運動的路線轉變則在政治上為台灣認同開闢道路。（王甫昌，1996；⁴蕭阿勤，1999、⁵2000⁶）本文擬藉由既有的研究文獻，概略探討1970-80年代〈本土意識〉的浮現。

戰後世代的回歸現實

台灣人的本土觀點，並非戰後才首次出現。日治時期台灣認同曾一度萌芽；只是在殖民政權的壓抑下，無法充分開展。（吳叡人，2006）⁷當時，作為台灣人相對方的乃是日本殖民政權。台灣認同是在反殖民鬥爭中誕生，因此「中國」與「台灣」起初在認同上並非直接的對立。中國象徵的乃是一個鄰近卻已分離的「祖國」。

戰後，228的屠戮造成許多人心中祖國幻想的破滅。民眾拿著國旗迎接的政權成為血腥鎮壓的兇手。隨後，國民黨政權在5、60年代施以高壓的白色恐怖統治。在國家暴力對言論自由的打壓下，國民黨政權所依賴的意識形態基礎：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法統」，難以被挑戰。國民黨政權更透過教育，在台灣戰後世代的成長歷程建構起中國認同。

蕭阿勤（2005：9）⁸提到學校教育對於塑造國族認同特別重要。相對於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時所面對的動盪不安，「台灣的戰後世代是國民黨能在繁榮穩定中，透過學校

3.數據可見於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資料庫：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

4.王甫昌，1996，〈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1：129-210。

5.蕭阿勤，1999，〈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3：1-51。

6.蕭阿勤，2000，〈民族主義與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台灣史研究》，6，2：77-138。

7.吳叡人，2006，〈福爾摩沙意識型態一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2：127-218。

8.蕭阿勤，2005，〈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第9期，頁1-58。

正式教育充分教化其特定主體角度中國國族認同的第一代人。」無分本省與外省，戰後世代擁有著與其父祖輩一無論是處於日本統治之下或生在中國動亂之中一不同的世代意識。

對中華國族主義的挑戰，卻也正是從戰後世代開始。世代意識成了抵抗的根源。蕭阿勤（2005）⁹提到：1970年代發生的釣魚台紛爭與中美斷交等歷史傷痛事件，以戰後的國族教育與教化為基礎，凝聚出不分省籍的世代意識。此一世代意識，讓青年開始思索自己一代所面臨的社會、政治困境，並積極關懷相關的社會、政治議題。加上：相當矛盾地，黨國威權教育體制卻傳播著自由民主思想。自由民主思想，促使戰後世代對國民黨威權統治進行了強烈的批判。

戰後世代無論對台灣或中國的歷史都相當隔閡，再加上威權統治、國共對峙與冷戰格局，「更使他們有孤懸於歷史之外，置身於時局現實發展邊緣的失落、無根與無力感。」回歸台灣現實成為了他們的出路。其實踐方式便是積極的瞭解社會現實、要求改革。黨國教育下養成的「第一代人」反倒成為推動台灣政治、社會與文化變遷的開端。這群年輕的中國認同者也基於「回歸現實」的理念，對台灣本身

的鄉土歷史文化進行「尋根」，進而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先聲。（蕭阿勤，2005）¹⁰即便他們自身不見得是台灣認同者。

文學與政治間的互動

戰後世代的回歸現實刺激了〈本土意識〉的浮現，但這〈本土〉是屬於中國的或是台灣的，卻歷經相當的轉折。蕭阿勤（1999）¹¹對《笠》和《台灣文藝》這兩份鄉土文學刊物的研究指出：鄉土文學一開始所立足者乃是中國民族主義；認為台灣的鄉土文學乃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鄉土文學中的台灣意識是逐漸發展而成，台灣與中國的分歧並浮現於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之中。只是當時的文學「台灣化」的傾向尚不強烈。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與黨外運動卻激發了《笠》和《台文》成員反國民黨的意識和行動。鄉土文學也因此於80年代開始「去中國化」，朝向「台灣文學」的方向發展。此一走向也促成了「台灣意識論戰」的產生，懷抱著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作家之間展開了辯論。隨著政治運動的前進，〈本土意識〉持續在作家群體中發展，並逐漸形成獨特的「台灣民族」文學傳統。（蕭阿勤，1999）¹²

9.同上

10.同上

11.同註5

12.同註5

美麗島事件當時，政治運動卻也非以台灣民族主義為號召。王甫昌（1996）¹³指出：至1979年為止，台灣反對運動的主要訴求乃是民主化而非本土化。當時的黨外人士，僅是扮演「忠誠的反對者」，意圖矯正動員戡亂時期條款下被扭曲的政治體制，追求回歸民主政治的常軌。民主化的訴求在美麗島事件中遭到強烈的打壓，打壓卻促成了黨外運動的激進化。這顯示在1983年「住民自決」主張的提出。國民黨對溫和改革的強硬態度，讓反對運動意識到體制內改革的不可行，而開始對國民黨的統治基礎——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法統——發起挑戰，並因此朝向台灣民族主義發展。文學論戰也成為台灣民族主義建構上「重要的刺激及素材」。

文化與政治，兩個層面的民族主義相互引領，政治運動激發文學家的反抗意識，文學家的論戰充實了台灣民族主義的內涵。¹⁴文化與政治兩者都並非孤立的發展，而是在時局中相互牽動。同時，國民黨本身可說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美麗島事件的鎮壓讓鄉土文學朝向台灣民族文學發展，並令反對運動激進化，「台灣化」因而取代「民主化」成為政治上的主要訴求。

〈本土意識〉為何浮現？

隨著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80年代後，台灣民族主義持續發展。不過，其過程也非一帆風順。民進黨在1991年通過台獨黨綱。同年國大選舉中民進黨得票比例下降，莊淇銘（2005）¹⁵解讀為：選民不接受民進黨的新政策與路線，造成國民黨大勝。此外，中國因素的存在：無論是武力威嚇或經濟誘因，都令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遇到阻滯。但1992年的國會全面改選與96年的總統直選無疑是在政治上拋棄了中國法統，確立以台灣為基礎的政治體制。國民黨本身亦「台灣化」，並因此催生出懷抱中國意識的新黨。（蕭阿勤，2012:207）¹⁶文化論述亦在80年代後持續演進。

台灣的〈本土意識〉於70~80年代間浮現，原因應可歸納於4點：1.新世代一回歸現實的戰後世代一出現，並對上一個世代發起挑戰；2.文學上的去中國化；3.政治上，反對運動的激進化。4.國民黨的打壓更成為〈本土意識〉的催化劑。美麗島事件後，無論政治或文學上，台灣民族主義都更迅速的發展。

對照於香港，相對於在殖民統治下懷抱中國情懷的傳統民主派，「80後」或許正是此一可引領轉變

13.同註4

14.當然文化不僅僅是文學，還包括了台語地位的翻轉，甚至廣義來說，更觸及對歷史記憶的詮釋，只是在此文學為例。

15.莊淇銘，2005，〈品質決定版圖消長〉，《新台灣新聞週刊》，468期。

16.蕭阿勤，2012，《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

的世代。本土運動所捍衛的正是香港的「現實」。文化上，以粵語為基礎的香港流行文化早有蓬勃的發展。（周耀輝，2013）¹⁷文化上及語言上香港實具有〈本土〉的基礎。所欠缺的，或者就在於讓〈本土意識〉成為具體的政治訴求，也就是一個追尋〈本土〉的政治力量。陳雲等「城邦派」目前仍著重在論述層次，傳統的民主派則仍在主張「愛港愛國」。但政治力量的浮現或許並不遙遠。隨著香港異議者陷入更嚴苛的處境，同時港人對西環治港的疑慮加深；以本土為主張的政治團體有可能因此快速的成型。¹⁸但可能阻止本土訴求政治化的，不光是中共的打壓，亦有可能是反對陣營內部在國族意識上的分歧。認同分歧不但發生在台灣「鄉土文學」之中，也發生在黨外運動內部；並在90年代成為台灣政治的重大爭議與焦慮。只是此一爭議和焦慮的內涵，或者可更進一步地釐清。

台灣的認同爭議與新舊菁英間的鬥爭

〈本土意識〉在台灣浮現，不單純是意識形態的轉變，更關係到權力間的競逐。對抗不僅發生在

政治場域，也在文學論戰之中。90年代政治的本土化，象徵著政權基礎的在地化，此乃對中國法統的揚棄。台灣民族文學的確立，對懷有中國認同的作家而言，也正是將其拉離文學上的中心位置。

對認同對立的焦慮，或者更來自權力位置的變換。在政治上，原本「主流」的中國法統，不但遭受反對陣營的挑戰，並在李登輝掌權下變成「非主流派」，最後成為出走的新黨。文學上，原本佔據主流地位的中國文學跟外省鄉愁，在權力變換下，從獨佔的思想中心落入台灣文學眾多成份的一環。缺少中國法統的支撐，相對於台灣民族文學傳統，失根的流亡菁英，地位更顯得邊陲。其焦慮除因為文化上感到被壓迫外，並可能包含對地位喪失的不滿。

新黨候選人趙少康在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時以「中華民國保衛戰」為競選主軸，電視辯論中趙少康稱該次選舉為「中華民國對台灣共和國的選舉」；並指責陳水扁主張台獨會招致台灣毀滅。這正是舊菁英對〈本土意識〉揚升的反動。¹⁹但對認同爭議的探討中卻較少人檢視懷抱中國認同之舊菁英在其中的角色。例如，隨著2008年國民黨重

17.周耀輝，2013，〈流，動，顛覆的可能 香港流行音樂邊緣化〉，彭麗君編，《邊城對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33-258。

18.「嚴苛處境」包括了：「愛港力」等親共團體對泛民主派進行的騷擾，甚至連以中學生為主的「學民思潮」也成為被騷擾的對象；2013年8月發生的與教師林慧思相關爭議以及廉政公署向香港商業電台與陽光時務週刊蒐證等事件。「西環」在此指的便是代表北京的中聯辦。

19.趙少康的發言可見於網路：1994年台北市長參選人辯論會（2）。

奪政權，中國認同者也有奪回文化中心地位的意圖。像是擁護中國意識的學者王曉波與張亞中，及總統馬英九對歷史教育的批評與干涉；其背離台灣現實，回復中國史觀的方向，不就是在延續認同間的對抗嗎？²⁰在政治轉型下喪失中心位置的舊菁英，希望藉由重奪政權讓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文化與歷史詮釋權重回主流。並在政權交替下獲得進入體制的機會。

當然，菁英鬥爭的解釋僅是部份性的，例如部份台灣認同者對閩南元素的強調確實可能激發其他族群：客家、外省、原住民之憂慮。換句話說，台灣民族主義對特定文化元素的偏好確實有成為另一種霸權壓迫的可能。但本文僅是主張菁英集團間的對抗是一個需要被帶入的、部份性的但有意義的解釋觀點。台灣與中國意識的競爭跟政治轉型互動並行。但政治轉型就關係到了菁英位置的交替；台灣民族文學的確立也影響到舊文化菁英的地位轉變。中國意識從主流變成非主流，從思想中心「降格」為眾多元素之一。那自然可能導致懷抱中國意識的舊菁英反彈。²¹

但台灣的認同紛爭並未真正演變成暴力衝突，也未危及憲政體制的運作。菁英的發聲權加上選舉激

情的推波助瀾或許擴大了民眾對衝突的想像。同時更必須考慮到：黨國體制下，媒體長期的被控制、影響。因台灣民族主義而起的認同衝突，可能在媒體的既定立場下被誇大，進而引發過度的焦慮。

會關係到菁英集團間的衝突，是因為台灣〈本土意識〉的浮現伴隨著政治轉型的。但〈本土意識〉之確立，卻也正是因為被納入政治議程之中。如果〈本土〉僅僅是文化的、記憶的，會容易止步於意象的層次；但當追尋〈本土〉成為政治議程的一部分，便可能藉由政治上的變革而獲得確立，甚或成為政治正當性的新基礎。朝向政治議程，將〈本土〉作為具體的政治目標，或許會是確立〈本土意識〉的必要之務。

此觀點下，先前所提及的左翼和右翼兩種〈本土〉，也可看成是〈本土意識〉朝向政治化的轉變，從對既有記憶的守護、所處身現實的追尋，轉變為政治上的訴求。當然，這樣的轉變會朝向更對抗性、衝突性的方向發展，但或許，〈本土意識〉就需要在這樣地對抗與衝突中，方能更往前邁進。■

20. 參考《陽光時務》週刊，〈民主化之後的歷史詮釋：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與《自由電子報》，〈走日據回頭路 教科書掀論戰〉。

21. 菁英跟底層，例如外省老兵，本文認為不該一視同仁。底層的中國認同者，其境遇是在政治權力的宰制下被決定；也並未因舊政權取得優勢地位，其處境相當值得同情。如何平撫其因為離鄉、流亡與政治變換而來的傷痛與失落，應視為本土認同建構時的重要工作。簡單來說，就是不要讓

從「反國教運動」看香港的危與機

成名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大文豪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所寫的兩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也是最壞的時代」，用來形容今日的香港最貼切不過。

作為長期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我發覺香港自從2011年11月底以來、一國兩制急速趨向一國化，而核心價值亦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自回歸以來，最頻密和赤裸的威脅，故此形容香港正處於自回歸以來，是最壞的時代並不為過。大家不妨回想一下自前年年底發生的一連串事件：

- 1.新聞自由急劇下降：《無國界記者》2010至2012年報告，指香港新聞自由指數由2010年的34位，急跌至2011年的54位，而在2012年，又再跌至58位。記協調查發現，87%本港記者認為香港新聞自2007年以來一直下跌。
- 2.2011年11月以來，至少有六位捍衛核心價值的學者受到左派報紙無理攻擊，侵蝕香港的學術和言論自由。中聯辦亦有部長無理攻擊某位學者，自回歸後首見，而上任特首對中聯辦干預學術自由視而不見。

- 3.中聯辦亦破壞一國兩制，高度介入行政長官選舉，在特首選戰尾聲明顯為疑似共產黨地下黨員的梁振英拉票。
- 4.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特首選戰尾聲表明不鼓勵香港發展政黨政治，令人再一次懷疑中央政府承諾在2017、2020落實雙普選，只是再一次的拖延戰術。
- 5.李旺陽疑似被自殺，行政長官被記者詢問個人觀感十多次都不回應，完全不敢向中央反映港人憂慮！
- 6.梁振英贊成落實洗腦式國民教育、中聯辦亦有部長直認國民教育是洗腦；梁振英把自己負責的事情，將責任歸咎上屆政府。
- 7.在發展新界東北爭議中，行政長官在上任前在訪問說要中港融合，讓「內地居民免簽證進入邊境禁區」，現在卻否認，改口說是房屋政策，並讓政務司開腔指這種中港融合說法無中生有。
- 8.梁愛詩轟本地法官對中央與特區關係缺乏認識，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先後批評，強調梁愛詩之言有損香港司法獨立。

9.北京和中聯辦主任認為所謂普選特首要經「篩選」，違背過去對落實普選和基本法的承諾，一國兩制淪為謊言。

換言之，程翔先生對梁振英上場後四大擔心，包括兩制漸趨一國化、西環治港常態化、意識形態大陸化、治港隊伍左派化，似乎一一應驗。故此形容香港正於自回歸以來，最壞的時代、並不為過。

為何香港亦正處於自回歸以來，最好的時代？—公民社會的甦醒

1.去年的「反國教運動」吸納了一批不同階層、職業及年齡的人士參與，當中包括中學生、大學生、社工、教師、前新聞從業員、學者，以至專業人士。

2.反國教運動中核心成員，包括學民思潮、家長關注組及教協，為運動付出了超凡的努力。有人可能會質疑，反國教運動12萬人的參與不算是甚麼，但在市民的積極參與度而言，這運動帶出一巨大意義。

3.一班沒有政黨背景的中學生早在2001年年中便組成學民思潮默默開始反國教的工作，他們同時在今年整個暑假不斷有理有節、持續不懈地進行運動。最後，三位成員更以絕食打動了不少香港市民反國教。

4.家長組的二十位核心成員，每日平均只睡四小時，有些更要每日應付200封電郵，而日間又要全職工作。家長組裡亦有很多義工，不計勞苦地為反國教運動工作。

5.教協亦大力參與反國教。他們要動員教師、校長反國教和罷課，亦參與絕食、並努力推動另類公民教育課程。

6.在大聯盟中有不同民間及宗教團體的協助，全無任何政黨參與，能讓更多不同階層的市民參與，匯成一股巨大的「覺醒力量」，加上很多參與絕食的人士連續堅持了多天，打破了政黨的絕食紀錄，反映了香港市民不單愛護他們的子女，也守護港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自由及尊嚴！

在上述眾多沒有政黨背境的平民百姓者委身下、愈來愈多港人被感動、參與廣場十日的反國教：9月1日至9日共吸引多達28萬人次參與集會；亦有超過170間中學及大學的學生／校友在facebook成立了反國教的聯署群組。同時，也有超過300個學校監察組成立了。對眾多參與者，這是守護一國兩制的戰役，如果特區政府的洗腦教育成功推行，那香港的核心價值及生活方式將很快被摧毀。總括來說，反國教運動是近年公民社會保護香港核心價值最顯著的覺醒。

反國教運動的啓示？

反國教運動是一次成功的非暴力抗爭運動，顯示了非暴力抗爭對捍衛普世價值的重要性。

根據1900年至2006年之比較研究，非暴力抗爭的成功率達53%，比暴力抗爭的26%為高，原因有兩點：

第一，非暴力抗爭較易在本地及國際層面上取得合法性，和吸引更多參與抗爭，增加對政權構成的壓力，甚至削弱政權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的力量。例如個多月來的反國教運動吸引了過百間境外、非華文媒體報道，令反國教運動一下子成為了「國際新聞」，或多或少對政府的取態上會有影響。

第二，政權可輕易合理化對暴力抗爭的鎮壓，而暴力抗爭也較易被公眾理解為極端的反抗活動，較難取得公眾支持。相反，非暴力抗爭的形象較為溫和，在爭取政權讓步及談判時較易取得成果。

非暴力抗爭是自下而上非暴力、以「人民」為基礎的運動，透過社會、政治、經濟及心理手段抗爭，而不是透過暴力或威嚇。非暴力抗爭可分為策略性及原則性兩種，後者是以宗教或道德為基礎的抗爭，著名的例子有甘地及馬丁路德金的抗爭，但其實一般大多數的非暴力抗爭都不屬此類別。

非暴力抗爭可包括象徵性的抗議、罷工、經濟杯葛、政治不合作

等，以降低政權認授性及削弱它們的力量。同時，非暴力抗爭其「和平、溫和」的形象容易被人誤解為被動、軟弱、小眾活動等等。但事實上，有效及有組織的非暴力抗爭往往可以令政權的權力瓦解。透過上述的不合作抗爭及反抗活動，非暴力抗爭往往可以在抗爭中取得優勢。

非暴力的抗爭(Akerman & DuVall, 2000)它可導致癱瘓，甚至瓦解專制政權。一個獨裁政府者不能獨自治理社會，需要與被治理者／市民合作：例如反國教運動成功爭取公眾的支持、制作了推行國教科的選校地圖，和成立了監察學校的網絡，成功為原先打算開展國教科的學校製造壓力，最後令不足10間非官立學校在今年九月開展國教科。

單單是家長關注組，裡面就有經驗豐富的新聞工作者、非政府組織領袖、大律師、前學運領袖、工會成員，他們展示了無可比擬的決心。而學民思潮的成員也展示了無私的參與，他們日以繼夜的努力打動了萬千市民。教協令很多老師明白國民教育科的弊病，也成功動員他們在學校內抗爭。

成功的非暴力公民抵抗需要互相包容、團結及有耐心。周密的計劃與非暴力！即使在9月8日晚對撤離廣場有不同意見，大聯盟大致上保持團結，只用了兩個多月，便激發

了波瀾壯闊反國教運動，大大增多對政府的政治壓力！

香港討價還價的本錢

香港可以發展成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有助人民幣國際化，內地龐大的資金便可投放至海外。香港可以補充其他國內的金融中心，從事創新金融工具。香港與上海可進一步融合力量，提升中國金融的國際競爭力。香港作為財富管理中心，舒緩中國流動資金過剩的問題。香港作為中資企業走出國際市場的出口，故此香港的金融企業，不少成為中資金融巨企的收購對象，利用本港成為學習海外收購合併等複雜金融交易的訓練場。香港對中國持續的經濟價值，解釋了為什麼這麼多的非暴力群眾運動，成功迫使香港政府回歸後對運動作出局部或全面的讓步。

我們的公民社會強大嗎？

在反國教一役中，天主教及基督教教會的表現比03年七一時更加沉默，這是否代表它們正逐步被建制吸納？我們需要思考為何大學生的動員工作竟然比學民思潮的中學生緩慢？如何加強學生會或學聯對大學生的動員力？雖然今次政黨的參與很少，但預期政府將以更大力度打壓「兩制」及香港的核心價值，我們仍需要與泛民政黨合作組織大型的民主運動，推動政制改革。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全面民主的制度是保障自由、平等、法治、免除貪腐的最佳良藥。泛民伙伴應組成更強大的民主運動，才能真正保護自己和下一代免被洗腦，保障我們的核心價值。■

* 本文部份內容已在香港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簡訊發表。

總結

雙城記—台灣與香港共同的 困境與希望

周威佑
台北市議員

台灣與香港，兩個似乎截然不同的社會，細究起來，其實有著極類似的歷史發展。台灣在結束日本殖民統治後，在接續而來的中國政權統治下，由於文化與政經矛盾，逐漸發展出台灣人意識（雖然一直到二十世紀晚期，自認是台灣人的比例才成為多數，但早期的省籍矛盾，早已隱含台灣人意識的形成），並在多年的努力後，取得民主自由的成果（雖然仍有待鞏固加強）。

香港則是1997年回歸後，面對中國政府步步加強控制的意圖，以及陸客與中國資本入侵，也開始有香港本土意識的出現，所謂「戀植」現象，就是一個徵兆。並在21世紀初開始政治化，爭取政治權利。

然而華語世界最為活潑多元的社會，卻在邁入21世紀時，共同面對兩大相同的挑戰。如何妥善因應，將是台灣與香港能否繼續邁向民主、自由、公義的關鍵。

中國因素

依賴民族主義以維繫政權存在的中國，緊緊拉住台灣與香港，是其重要工作。

對台灣，從1996年的兩枚飛彈到2012年大企業主力挺92共識，影響大選的意圖昭然若揭。手法越來越細膩，就12年來看，也有一定效果。除了選舉，更透過讓利、採購、參訪、各種統戰論壇，企圖全面滲透社會各面相。

更令人心驚的是旺中案，試圖藉由掌握資訊，控制思想。

對香港，除了利用選制，控制特首及立法會選舉。洗腦工作更是絕不放鬆。國民教育雖然暫時被擋下，但洗腦仍然無所不在。

新自由主義對社會正義的侵襲

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蓬勃一時，各種社會力百家爭鳴。其後因主戰場移往政治，而稍稍沈寂。然而近來，社運又再度層出不窮。大埔事件、華光社區事件、樂生療養院事件、關廠工人抗爭…究其實，都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下，追求商品化、利益最大化。土地與房屋不再是安身立命的場所，而是追求最大利益的工具商品，人民居房權讓位給以更新、公共利益為幌子的建商利益。工人只是可輕易取代的勞動力，一旦不能為資本家創造更大利潤，馬上棄之如敝屣。甚至創

造出人力派遣、自然人承攬等非典型勞動型態。

而原本應維護公義，促進財富分配的政府，本身就是這波新自由主義的帶頭者。

香港的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少數幾家地產霸權，非僅掌握地產，幾乎所有香港人的食衣住行，莫不再他們掌握之中。

再加上前文所述，中資大舉侵入，造成社會分配惡化，香港人日益貧窮化。

中國因素與新自由主義正嚴重威脅台灣與香港的民主自由及社會基礎。而政府卻扮演推波助瀾、助紂為虐的角色。前景似乎黯沉，但我們仍看見一線曙光。

希望—公民力量的展現

香港國民教育風波，港人展現團結的力量，學生、教師、小市民，合力迫使港府暫停實施。碼頭工人罷工事件，更在各界支援下，逼使大財團低頭讓步。

而在台灣，雖然除了旺中案有暫時的戰果外，其他抗爭事件都稱不上勝利。

但過程中，我們看到學生、學者、文化人士、小市民為了與自己利益無關的事件勇敢站出。

台港兩地，表現出相當成熟的

公民社會力量。公民對不義的憤怒與挺身而出，將是希望所在。

然而，這波公民運動，顯然與政治運動切割。而政治團體也只能作壁上觀。

在追求公義社會的路上，政治團體與公民運動者彼此互動的戰略為何？二十年前，新潮流曾提出「社運政治化，政運社會化」。現下，當然無法用這麼簡單的口號，來處理雙方的戰略關係。然而，公民社會終究無法與政治永遠切割。未來，雙方如何互動合作，有賴學界及運動參與者共同摸索、發展。



訂閱新社會雙月刊

好的刊物需要大家的支持，即日起，訂閱本刊兩年只需1200元

訂閱專線：02-2356-4008 蔡泓洋

匯款帳戶：

台灣銀行群賢分行

162001005131

戶名：台灣新社會智庫協會

另可刷卡訂閱，請至本社網站 www.taiwansig.tw

徵稿啓事

歡迎各界有識之士提供對於各類公共議題的分析與主張，採長年徵稿，來稿一經採用，將給予稿費，一字1.5元（不含註解）。

投稿格式與需知：

- 1.每篇五千字為原則，以word檔繳交。
- 2.來稿請寄 taiwansigblog@gmail.com
- 3.來稿經採用後，作者需同意本智庫進行如下之用途：
 - 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料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 再授權其他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 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